

# 瞿秋白

自传

名人自传丛书  
江苏文艺出版社



# 瞿秋白自传

名人自传丛书



## 瞿秋白自传

---

作 者:瞿秋白

责任编辑:郭济访 章俊弟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6

字数:200,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

标准书号:ISBN 7-5399-1015-1/I·965

定 价:12.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瞿秋白与杨之华  
1929 年摄于苏联

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





瞿秋白与夫人、女儿合影  
杨之华与瞿独伊(瞿秋白题字)



慈母爱女

一九三九年胡夏小别





1935年6月18日，秋白就义前在长汀中山公园留影。

瞿秋白(中)与友人





目 录

1 第一章 赴俄前夕

1 一、一家星散

14 二、人生观变化

19 三、告别亲友

28 四、滞留哈尔滨

46 第二章 到俄国去

46 一、途经满洲里

53 二、在赤塔

66 三、西伯利亚掠影



## 目 录

76	四、到达莫斯科
81	五、工作开始
86	第三章 莫斯科见闻
117	第四章 归途
127	第五章 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
127	一、爱之囚奴
131	二、三则故事
132	三、秋之白华
138	四、小小的蓓蕾





## 目 录

### 141 第六章 朋友们

141 一、致胡适

143 二、致鲍罗廷

159 三、致郭质生

### 163 第七章 最后的日子

163 一、多余的话

194 二、“供词”

197 三、狱中诗词(7 首)

138327



## 目 录

199	四、致郭沫若
201	五、未成稿目录
203	附录
203	一、忆秋白
246	二、怀念父亲
255	三、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回忆与随想
285	四、宋希濂谈瞿秋白
303	后记

# 第一章 赴俄前夕



## 一、一家星散

山东济南大明湖畔，黯黯的灯光，草棚底下，一张小圆桌旁，坐着三个人，残肴剩酒还觑着他们，似乎可惜他们已经兴致索然，不再动箸光顾光顾。……其中一个老者，风尘憔悴的容貌，越显着蔼然可亲，对着一位少年说道：“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那少年答应着站起来。其时新月初上，照着湖上水云相映，萧萧的芦柳，和着草棚边乱藤蔓葛，都飕飕作响。三人都已走过来，沿着湖边，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时，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种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叫人何

## 2 / 瞿秋白自传

以为情呢？

我离中国之前，同着云弟姪弟住在北京纯白<sup>①</sup>大哥家里已经三个年头；我既决定要到俄国去，大约预备了些事物，已经大概妥当之后，就到济南拜别我父亲<sup>②</sup>。从我母亲<sup>③</sup>去世之后，一家星散，东飘西零，我兄弟三个住在北京，还有两弟一妹<sup>④</sup>住在杭州四伯父<sup>⑤</sup>跟前，父亲一人在山东。纯哥在京虽有职务，收入也很少。四伯做官几十年，清风两袖，现时中国官场，更于他不适宜，而在中国大家庭制度之下，又不得不养育全家，因此生活艰难得很。我亲近的支派家境既然如此，我们弟兄还不能独立，窘急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我父亲只能一人住在山东知己朋友家里，教书糊口。在中国这样社会之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营的本领，况且中国畸

① 纯白（1889—？），原名常，字纯白，作者四伯父世璠长子，京师大学堂法文系毕业。历任南洋方言学堂、上海南洋大学、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预备大学等校教员；当时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

② 父亲，瞿世玮（1875—1932），字稚彬、稚宾。家庭败落后出走山东投靠亲友，后寓济南，以教书为生；善绘山水，信奉道教，别号一禅、圆初、园初。

③ 母亲，金璇（1875—1916），字衡玉，江苏江阴西乡大岸村人。一九一六年二月七日（农历正月初五）吞服红头火柴后于翌日去世。

④ 两弟一妹，两弟指懋森（1906—1929），后改名景白；懋毅（1913—1944），后名铨、坚白，又名铤白；妹指轶群（1900—1981）。瞿景白曾于一九二八年赴苏联学习；瞿坚白于抗日战争中在山西牺牲。

⑤ 四伯父，瞿世璠（1866—？），原名世瑄，字薛斋，一作雪斋；世玮的长兄。在叔伯中排行四，故称四伯父。清末曾任浙江桐乡、山阴、常山、长兴、黄岩、嵊县等县知县。民国以后曾任江苏丹阳、泰兴县知事。

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纪已近半百，忧煎病迫，社会还要责备他尽什么他所能尽的责任呢？我有能力，还要求发展，四围的环境既然如此，我再追想追想他的缘故，这问题真太复杂了。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将来”里的生命，“生命”里的将来，使我不得不忍耐“现在”的隐痛，含泪暂别我的旧社会。我所以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我因此到济南辞别我亲爱不忍舍的父亲。

当那夜大明湖畔小酒馆晚膳之后，我父亲的朋友同着我父亲和我，回到他家里去。父亲和我同榻，整整谈了半夜，明天一早就别了他上火车进京。从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呢！

济南车站上，那天人不太多，待车室里只有三四个人。待车室外月台上却有好些苦力，喘息着。推车的穷人，拖男带女的背着大麻布包，破笼破箱里总露着褴褛不堪的裙子衣服。我在窗子里看着他们吸烟谈笑，听来似乎有些是逃荒出去的。——山东那年亦是灾区之一。——有的说，买车票钱短了两毛，幸而一位有良心的老爷赏给我半块钱，不然怎能到天津去找哥哥嫂嫂，难道饿死在济南破屋子里么？又有一个女人嚷着：“买票的地方挤得要死，我请巡警老爷替我买了，他却要扣我四毛钱，叫我在车上拿什么买油果子吃呢！”——“怎么回事……”忽听着有人说，火车快来了。我回头看一看，安乐椅上躺着的一位“小老爷”，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上身一件半新不旧的玄色缎马褂，脚上缎鞋头上已经破了两个小窟窿，正跷着两腿在那里看北京《顺天时报》上的

## 4 / 瞿秋白自传

总统命令呢。我当时推门走出待车室。远看着火车头里的烟烘烘的冒着，只见一条长龙似的穿林过树的从南边来了。其时是初秋的清早，北地已经天高风紧，和蔼可亲的朝日，虽然含笑安慰我们一班行色匆匆的旅客，我却觉得寒风飕飕有些冷意，看看他们一些难民，身上穿的比我少得多，倒也不觉得怎么样冷。火车来了。我从月台桥上走过，看见有一面旗帜，写着“北京学生联合会灾区调查团”，我想他们来调查灾区，——也算是社会事业的开始。——也许有我们“往民间去”的相识的同志在内。过去一看，只见几个学生，有背着照相架的，有拿着钞本簿籍的，却一个也没有相熟的。火车快开，也就不及招呼，一走上车了。

我坐的一辆车里，只五六个人。中间躺着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工头模样，一个广东女人，他的妻子，两人看来是搭浦口天津通车到天津去的。英国人和他妻子谈着广东话，我一句也不懂。停一忽儿，茶房来向他们说了几句话，意思是说，今天火车到天津了，讨几个酒钱。英国人给他一块钱。茶房嫌少，不肯接。英国人发作起来，打着很好的上海话说道：“你们惯欺外国人！你可得明白，我在中国住了三十多年，什么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必得给你两块钱？不要就算了。”我听得奇怪，——这种现象，于中英两民族交接的实况上很有些价值，因和他攀谈攀谈，原来他也是进京，就那东城三条胡同美国人建筑医院的豫王府工程处的工头之职，谈起来，他还很会说几句北京话呢。

一人坐在车里，寂寞得很，英国人又躺下睡着了。我呆呆的坐着思前想后，也很乏味，随手翻开一本陶渊明

的诗集，看了几页又放下了。觉着无聊，站起来凭窗闲望。半阴半晴的天气，烟云飞舞，一片秋原，草木着霜，已经带了些微黄，田地里禾麦疏疏朗朗，显得很枯瘠似的，想起江南的风物，究竟是地理上文化上得天赋较厚呵。火车的轮机声，打断我的思潮，车里却静悄悄地，只看着窗外凄凉的天色似乎有些雨意，还有那云山草木的“天然”在我的眼前如飞似掠不断的往后退走，心上念念不已，悲凉感慨，不知怎样觉得人生孤寂得很。猛然看见路旁经过一个小村子，隐约看见一家父子女女同在茅舍门口吃早饭呢。不由得想起我与父亲远别，重逢的时节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家道又如此，真正叫人想起我们常州诗人黄仲则的名句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这天当夜到天津，第二天就进京，行期快了。其时正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初旬光景。

生活也好似行程。青山绿水，本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疾风迅雷，清阴暖日，就是平平常常一时一节的心绪，也有几多自然现象的反映。何况自然现象比社会现象简单的多，离人生远得多。社会现象吞没了个性，好一似洪炉大冶，熔化锻炼千万钧的金锡，又好像长江大河，滚滚而下，旁流齐汇，泥沙毕集，任你鱼龙变化，也逃不出这河流域以外。这“生命的大流”虚涵万象，自然流转，其中各流各支，甚至于一波一浪，也在那里努力求突出的生活，因此各相搏击汹涌，转变万千，而他们——各个的分体，整个的总体——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转变在空间时间中生出什么价值。只是蒙昧的“动”，好像随“第三者”的指导，愈走愈远，无尽无



穷。——如此的行程已经几千万年了。

人生在这“生命的大流”里，要求个性的自觉，岂不是梦话！然而宇宙间的“活力”，那“第三者”，普遍圆满，暗地里作不动不静的造化者，人类心灵的谐和，环境的应响，证实天地间的真理。况且“他”是“活力”，不流转而流转，自然显露，不着相而着相，自然映照。他在个性之中有，社会之中亦有，非个性有，非社会有，——似乎是“第三者”而非第三者。

“生命大流”的段落，不能见的，如其能见，只有世间生死的妄执，他的流转是不断的；社会现象，仍仍相因，层层衔接，不与我们一明切的对象，人生在他中间，为他所包涵，意识的广狭不论，总在他之中，猛一看来，好像是完全汨没于他之内。——不能认识他。能认识他的，必定得暂舍个性的本位。——取第三者的地位：“生命大流”本身没有段落，可以横截他一断；社会现象不可认识，有个性的应和响；心灵的动力不可见，有环境为其征象。

在镜子里看影子，虽然不是真实的……可是真实的在那里？……

“人生都是社会现象的痕迹，社会现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楼。”社会吞没了一切，一切都随他自流自转。我如其以要求“突出生活”的意象想侵犯“社会”的城壁，要刻划社会现象的痕迹，要……，人家或者断定我是神经过敏了。

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化的（历史上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做他的基础。家族生产制，及治者

## 第一章 赴俄前夕 / 7

阶级的寇盗（帝皇）与半治者阶级的“士”之政治统治包括尽了一部“二十四史”。中国周围的野蛮民族，侵入中国文化，使中国屡次往后退，农业生产制渐渐发达，资本流通状态渐渐迁移，刚有些眉目，必然猛又遇着游牧民族的阻滞。历史的迟缓律因此更增其效力。最近一世纪，已经久入睡乡的中国，才矇矓矓矓由海外灯塔上得些微光，汽船上的汽笛唤醒他的痴梦，汽车上的轮机触痛他的心肺。旧的家族生产制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因经济基础的动摇，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

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穷”不是偶然的，虽然因家族制的维系，亲戚相维持，也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谁救得谁呢？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我的心性，在这几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

大家族制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渐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悻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

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松江的鲈鱼，西乡的菰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亦有耳鬓厮磨啾啾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虽然如此呵！惨酷的社会，好像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内的要求”驱使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决然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姊妹亲友而西去了。

小小的院落，疏疏的闲花闲草，清早带些微霜，好像一任晓风飏拂摇移，感慨有些别意，仿佛知道，这窗中人快要离他们远去万里了。北京四年枯寂的生涯，这小小的院落容我低徊俯仰，也值得留一纪念，如今眼看别离在即，旧生涯且将告一段落，我也当有以安慰安慰这院落中的旧伴呵。可是呢。……我没离故乡之前，常

## 第一章 赴俄前夕 / 9

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母亲去世，一家星散，我只身由吴而鄂，由鄂而燕。黄陂铁锁龙潭的清波皓月，也曾使我低徊留恋；以至于北京南湾子头的新柳，丝丝的纤影，几番几次拂拭我的悲怀诗思。我又何独对于这小院落中奄奄的秋花格外深情呢？“自然”向不吝嗇他自己的“美”，也未必更须对我卖弄，——我只须能尽量享用，印取他的“美”意，自慰偏估悲涩的心怀，离别便离别，一切不过“如是而已”。

我离山东回到北京之后，匆匆的整理行装，早夜疲乏，清晨起来没精打采的坐着，不知道辜负了这小院秋花的多少好意。我纯哥的家庭，融融泄泄，安闲恬静的生涯虽说不得，隐隐地森严规律的气象，点缀些花草的闲情雅意，也留我许多感想。我因远别在即，黄昏时归来就同哥嫂家常闲话，在北京整整的住了四年，虽纯哥是按“家族的旧道德”培植扶助我，我又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纯然坐在“旧”的监狱里，或者有和他反背的意见，——纯哥当初竭力反对我到俄国去，以为自趋绝地，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到现在一切都已决定，纯哥亦就不说什么，勉励我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辍。兄弟的情分，平常时很觉泛泛，如今却又有些难舍。——人生生活的剧烈变更，每每使心理现象，出于常规，向一方面特别发展。我去国未决定以前，理智强烈，已决定后，情感舒展伸长，这一时期中总觉得低徊感慨之不尽。然而走是已决定走的了。我这次“去国”的意义，差不多同“出世”一样，一切琐琐屑屑

“世间”的事，都得作一小结束，得略略从头至尾整理一番。哥嫂的谈话，在家事上也帮助我不少。

应整顿的事繁琐得很。母亲死时遗下的债务须得暂时有个交托，——破产的“土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不让说是无赖呵！——旧时诗古文词稿，虽则已经视如敝屣，父亲却要他做个纪念，须得整理出来；幼时的小伴，阔别已经好几年，远在江南，不能握别，须得写封信告辞。总之当时就知道俄国远处万里，交通梗塞，而且我想一去不知道甚时才能回来（生命于我无所重轻），暂时须得像永告诀别似的，完一番“人间的”手续。于是抽出这几天晚上整理整理。

儿时的旧伴，都已星散了，谁还管得谁？然而我写信时，使我忆及我一少寡的表姊。他现在只他一人同一遗腹子孤苦伶仃的住在母家，我姑母受儿媳的供养已是很为难，何尝能好好周顾到他呢。姑母家是地主，然而生活程度随着渐渐欧化的城市生活增高，农业生产，却因不能把他随着生活程度增高的雇工价值核计，不会处置变态中的农地生产资本，而且新由大家族经济变成个人经济，顿然现出濒于破产的现象。于是我表姊的寄生中之寄生生涯，精神苦痛不可言喻。还有一个表姊，从小没有母亲，和我一处长大的，他家亦是破产的“土的阶级”，丈夫是小学教员，儿女非常的多，非但自己创不起小家庭，还非得遵从家族经济的原则，所谓仰事俯蓄，艰难得很。我表姊感着“中国妇女的痛苦”，每每对于生活起疑问。他又何尝能解决他呢？

夜深人静，灯光黯黯的笼罩着人的愁思。晚风挟着寒意，时时到窗隙里来探刺。握着笔要写又写不下去：旧

话重提有什么意味？生活困难，心绪恶劣，要想得亲近人的慰藉，这也是人情，可是从何说起！亲人的空言虽比仇人的礼物好，究竟无益于事。况且我的亲友各有自己阶级的人生观，照实说来，又恐话不投机，徒然枉费。中国的社会生活，好像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哪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不必提起。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好像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他们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与以慰藉！……几封诀别的信总算写完了。

我记得，我过天津的时候，到亲戚家去，主人是我世交，又是我表姊丈。他们知道我有远行，开瓶白兰地酒痛饮半宵。我这位表姊，本是家乡的名美人，现在他饱经世变，家庭生活的苦痛已经如狂风骤雨扫净了春意。那天酒酣耳热，大家吃着茶，对着烟灯谈话。表姊丈指着烟盘道：“我一月赚着五六十块钱，这东西倒要去掉我六十元。你看怎么过？”表姊道：“他先前行医也还赚几个额外的钱。他却懒得什么似的，爱去不去，生意怎么能好？铁路局里面的事情，还是好容易靠着我们常州‘大好老’（这是常州话，指京里的大官说的）的面子弄着的，他也是一天去，两天不去。事情弄掉了，看怎么样！……”他女儿丰儿忽然插话对我说道：“双舅舅，双舅舅。你同我上北京去罢？去看三姨，三姨上次来我家里，和娘娘谈天，后来不知道怎么还淌眼泪来呢。……”茶已经吃完了，烟也抽了不少了。我的醉意也渐渐醒了。……那天从他们家里回客栈，不知怎么，天津

的街市也似乎格外凄凉似的。……

我记得，北京西城一小公寓，短短的土墙，纸糊的窗格，院子里乱砌着鸡冠凤仙花，一见着就觉得一种极勉强极勉强的城市生活的光景。我那天去看亲戚，进了他的屋子，什物虽收拾得整整齐齐，地方究竟太窄些。我告诉了我这表舅母快要到俄国去的话。他道：“这样亦好。你母亲一世愁穷，可惜等你学好了本事，他再也看不见了。”我道：“这也罢了！我是很爱学的。穷迫得紧，凡几乎没有饿死，学不成学得成又是一事。一点希望本只在自己。第一次从常州出门求学，亏得你当了当头借给我川资。这次出去求学，也刚巧借着了钱。究竟穷是什么事，暂且不放在心上。……”我去国的志愿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能表示出来，现在中国社会思想，截然分了两个世界，新旧的了解是不可能的。——表舅母接着问道：“你在天津看你二表姊去没有？他姑爷还吸鸦片么？”我道：“怎么不吸？”他叹道：“像我们这样丝毫没有的人家也不用说了。他们这般公子少爷，有了财产拼命浪费；——也难怪他，他父亲不会教训，和儿子是一样的货。‘有’的时候，不知道上进。现在‘没’了，看怎么样。他却还吸烟！现今还比得从前吗？……像你表舅，从小没钱求学。现在一家两口，东飘西走，一月进款三四十元，够什么！这个那个小机关上的小官员，如此景况的人成千成万。现在的世界，真不知道是什么世界！……”接着又问道：“三小姐到京了，你去看他没有？”我说我看见过了。他道：“三小姐这桩亲事，真正……小孩子时候就定亲许人家，最坏事。幸而他们夫妻还亲爱。不过姑爷中文都不大好，又不能做什么事，生计是……



将来很艰难呵。……”

我记得，我心灵里清纯洁白一点爱性，已经经过徘徊缠绵的一番锻炼。如今好像残秋垂柳，着了严霜，奄奄地没有什么生意了。枯寂的生活，别有安闲的乐趣。然而外界偶然又有感触，即使一片云影，几朵落花，也能震动我的心神。我的心神现在虽已在别一个世界，依旧是……何况，这又和旧时代的精神密切相关，是旧社会生活的遗迹，感动了我别方面的感慨，更深了我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疑问呢？……这一天，我看三妹去，他说：“我刚从南边来，你又要到北边去了！……我一个人离母家这样远，此地好像另一世界似的。满北京只有一两个熟人。西城的你的表舅母，却到我这里来过了，你近来看见他没有？他是我们家乡旧时的熟人。我总盼望他来谈谈话。……冷静得教人烦闷。家里母亲大姊不知道怎样？他（指他的新婿而言）又懒，我又不会写信，你替我写封信给你姑母和天津的二姊罢。……你几时动身到俄国去，俄国离中国有多远，在什么地方呢？……”我答道：“我大概一两礼拜后就走。你有空到纯哥那里看看，明后天我在家。……信，容易得很，我写就是了。我在天津，看见二姊，丰儿要想到北京来看你呢。呀！时光过得真快，丰儿都这样大了。我们一别，不是四五年了么？现在又得分手，人生还不是驿站似的。……”半晌大家不言语。我无意的说道：“妹婿要能在什么衙门或是银行找个事情才好，三妹，你看怎么样？”他道：“自然呢！不过我也不知道要怎样托托人情才行。我真为难，我还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现在样样事要担些斤量，怎么样好？”我答道：“不要紧，事情慢慢的找就是了，一切不

知道的，你可以去问问纯哥纯嫂。”——做新妇的时代，是中国妇女一生一世的紧要关头。——“你的小叔子，小姑娘还算是好的。”他道：“也就这样罢了。想起我们那时在环溪，乡下地方，成天的一块儿玩，什么亦不管……”我这天去看他，本想早些回家，不知不觉谈到黄昏时候。北京城南本来荒僻，我从他那里回家到东城，路却不少。出了他们大门，正是秋夜时分，龙泉寺边的深林丛树时时送出秋声，一阵一阵萧萧的大有雨意，也似催人离别。满天黑云如墨，只听得地上半枯的秋草，飕飕作响。那条街上，人差不多已经静了，只有一星两星洋车上的车灯，远远近近的晃着。远看正阳门畔三四层的高洋房，电光雪亮的耀着……

过去的留恋，心理现象情绪中的自然状态，影响于人的个性却也不少。况且旧社会一幅一幅的画呈显于吾人之前，又是我们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对象。个性的突变没有不受社会环境的反映的。可是呢，“过去的留恋”呵，你究竟和我的将来有什么印象，可以在心灵里占一不上不下的位置呢？我现在是万缘俱寂，一心另有归向了。一挥手，决然就走！

## 二、人生观变化

二十世纪的开始，是我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国史上的新纪元。中国香甜安逸的春梦渐渐惊醒过来，一看已

是日上三竿，还懒懒的朦胧双眼欠伸着不肯起来呢。从我七八岁时，中国社会已经大大的震颠动摇之后，那疾然翻复变更的倾向，已是猛不可当，非常之明显了。幼年的社会生活受这影响不小，我已不是完全中国文化的产物；更加以经济生活的揉挪，万千变化都在此中融化，我不过此中一份而已。

二十年来思想激变，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與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忘反，成绮语淫语的烂小说生涯。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后来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

人生观只在于“避世”。

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涘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饭碗问题间接的解决法。同时却又到黄陂会见表兄周均量，诗词的研究更深入一层；他能辅助我的，不但在此，政治问题也渐渐由他而入我们的谈资。然而他一方面引起我旧时研究佛学的兴趣，又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这三四个月的旅行，经济生活的要求虽丝毫没有满足，而心灵上却渐渐得一安顿的“境界”。从此别了均量又到北京，抱着入大学研究的目的。当时家庭已经破碎，别无牵挂，——直到如今；——然而东奔西走，像盲蝇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是破产的“士的阶级”社会中之社会现象呵！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

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当时一切社会生活都在我心灵之外。学俄文是为吃饭的，然而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

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最初北京社会服务会的同志：我叔叔瞿菊农，温州郑振铎，上海耿济之，湖州张昭德（后两位是我俄文馆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泡德金<sup>①</sup>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

---

① 今译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

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sup>①</sup>，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

我和菊农、振铎、济之等同志组织《新社会》旬刊。于是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我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所以我曾说：“现在大家，你说我主张过激，我说你太不彻底，都是枉然的……究竟每一件东西，既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得认个清楚；主观客观的混淆，使你一百年也不能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

---

① 山东问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等国在巴黎和会上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非法决定由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因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迫使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

此后北京青年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我们组织一月刊《人道》(Humanité)。《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人道》的产生不久，我就离中国，入俄乡，秉着刻苦的人生观，求满足我“内的要求”去了。

### 三、告别亲友

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



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谟克拉西（la démocratie）<sup>①</sup>一个字到十年后再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味。这是一方面而。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sup>②</sup>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谟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谟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掉模糊影响的弊病。经济上虽已和西欧物质文明接触了五六十年，实际上已遵殖民地化的经济原则成了一变态的经济现象，却还想抄欧洲工业革命的老文章，提倡“振兴实业利用外资”。——这是中了美国资本家新式侵略政策的骗，及听了罗塞尔<sup>③</sup>偶然的一句“中国应当振兴实业”的话，所起的一种很奇怪的“社会主义”的反动。当然又因社会主义渐落实际的运动，稍稍显露一点威权，而起一派调和的论调，崇拜“德国式”妥协的革命，或主张社会政策。——这又是一种所谓“社会主义”。两派于中国经济上最痛切的外国帝国主义，或者是忘记了，或者是简直

---

① “民主”一词的音译。

② 主张不用暴力抵抗邪恶。

③ 今译罗素，英国哲学家。

不能解决而置之不谈，却还尽在经济问题上打磨旋。学术上：二十余年和欧美文化相接，科学早已编入国立学校的教科书内，却直到如今，才有人认真聘请赛先生（陈独秀先生称科学为 Mr. Science）到古旧的东方国来。同时“中国的印度文化”再生，托尔斯泰等崇拜东方文化说盛传，欧美大战后思想破产而向东方呼吁，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居然成了中国新思潮中的问题。于是这样两相矛盾的倾向，各自站在不明了的地位上，一会儿相攻击，一会儿相调和，不论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的思潮都没有明确的意义，只见乱哄哄的报章，杂志，丛书的广告运动，——一步一步前进的现象却不能否认，——而思想紊乱摇荡不定，也无可讳言。

我和诸同志当时也是飘流震荡于这种狂涛骇浪之中。

我呢？以整顿思想方法入手，真诚的去“人我见”以至于“法我见”<sup>①</sup>，当时已经略略领会得唯实的入生观及宇宙观。我成就了我世间的“唯物主义”。决然想探一探险，求实际的结论，在某一范围内的真实智识，——这不是为我的，——智识和思想不是私有权所能限制的。况且我幼时社会生活的环境，使我不期然而然成一“斯笃矣派”（Stoiciste）<sup>②</sup>，日常生活刻苦惯的，饮食起居一切都只求简单节欲。这虽或是我个人畸形的发展，却成就了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

---

① 佛教名词，佛教认为这是万恶之本。

② 今译斯多葛派，主张摒弃人生享乐。

责任。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这是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晚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我刚从北京饭店优林（Urin，远东共和国代表）处签了护照回来，和当日送我的几位同志——耿济之，瞿菊农，郑振铎，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说的话。

十月十六日一早到北京东车站，我纯哥及几位亲戚兄弟送我，还有几位同志，都来和我作最后的诀别。天气很好，清风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议的情感，触目都成异象。……握手言别，亲友送我，各人对我的感想怎样，

我不知道：我对于各人自有一种奇感。……“我三妹，他新嫁到北京，处一奇异危险的环境，将来怎么样？我最亲密最新的知己，郭叔奇，还陷在俄文馆的思想监狱里？——我去后他们不更孤寂了么？……”断断续续的思潮，转展不已。一声汽笛，忽然吹断了我和中国社会的万种“尘缘”。从此远别了！

天津重过。又到我二表姊处去告别。张昭德及江苏第五中学同学吴炳文，张太来<sup>①</sup>三位同志都在天津，晚间抵足长谈，作我中国社会生活最后的回忆。天津的“欧化的都市文明”：电车汽车的吵闹声，旅馆里酒馆里新官僚挥拳麻雀声，时时引入我们的谈资，留我对于中国社会生活最后的印象。……

十八日早，接到振铎，菊农，济之送别的信和诗：

## 追寄秋白宗武颂华

民国九年十月十六日同至京奉车站送秋白、颂华、宗武赴俄，归时饮于茶楼，怅然有感，书此追寄三兄。

济之，振铎。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你们走了——  
走向红光里去了！  
新世界的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

---

① 即张太雷。

但是……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松柏依旧青着，  
 秋花依旧笑着，  
 燕都景色，几时再得重游？

冰雪之区——经过，  
 “自由”之国——到了。  
 别离——几时？  
 相隔——万里！  
 鱼雁呀！  
 你们能把我们心事带着去么？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九，十，十六，晚十时。

## 追寄颂华宗武二兄暨秋白侄

菊 农

回头一望：悲惨惨的生活，乌沉沉的社会，  
 ——你们却走了！

## 第一章 赴俄前夕 / 25

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只是盼望你们多回几次头，  
看看在这黑甜乡酣睡的同人，究竟怎样。

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  
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

太戈尔道：“变易是生活的本质。”  
柏格森说，宇宙万物都是创造，——  
时时刻刻的创造。

你们回来的时候，  
希望你们改变，创造。

我们虽和你们小别，  
只是我信：  
我们仍然在宇宙的大调和，  
普遍的精神生活中，  
和谐——合一……

我没有什么牵挂，  
不知，你们有牵挂也不？

我因覆信，并附以诗，引我许多自然和乐的感想。他日归来相见，这也是一种纪念。信和诗如下：

“Humanity” 鉴：

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魆魆地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我们配受欢迎吗？诸位想想看！我们却只是决心要随“自然”前进。——不创造自创造！不和一自和一！

你们送我们的诗已经接到了，谢谢！……

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题号里。

流血的惨剧，歌舞的盛会，我们都将含笑雍容的去参预。你们以为如何？……附诗。

秋白。一九二〇，十，十八。

## 去国答《人道》

秋 白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变易？  
只不过做邮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几回频转轴轳车。  
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

天津倚装作。

当日覆信寄出之后，晚上就别了炳文、太来、昭德，上京奉车。同行的有俞颂华、李宗武。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往俄国去的路通不通。“中华民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同着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恰巧也是这时候“启节”，我们因和他们结伴同行。预备先到哈尔滨再看光景。

其时通俄国的道路：一条是恰克图，一条是满洲里。走恰克图须乘张库汽车。直皖战争后，小徐<sup>1</sup>办的汽车已经分赃分掉了。其余商办的也没有开。至于满洲里方面，谢美诺夫<sup>2</sup>与远东革命军正在酣战，我们却不知道，优林的秘书曾告诉我，如其能和总领事同行，专车可以由哈直达赤塔。我们信了他的话，因和领事结伴同走。

当天在天津上车，已是晚上十一二点钟光景。我同宗武和颂华说：“现在离中国了，明天到满洲，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赤都’（莫斯科）呢？……我们从今须暂别中国社会，暂离中国思想界了。今天我覆菊农的诗，你们看见没有？却可留着为今年今月今日中国思想界一部分的陈迹……”车开了，人亦慢慢的睡静了。瞿秋白渐渐的离中国——出山海关去了。……

---

1. 即徐树铮，北洋皖系军阀。

2. 今译谢苗诺夫，俄国白卫军头目之一。



## 四、滞留哈尔滨

十九日晨醒过来，火车刚走近山海关。远望一角海岸，白沙青浪映着朝日，云烟缭绕，好似拥出一片亚洲大陆的朝气。傍晚时到奉天，车站上一片嘈杂的声音。行李搬出车子之后，却看不见一个中国脚夫。对面望着大和饭店雪亮的电光，传出些丁丁当当的刀叉声，好不热闹。我们等了半天，才来了一个日本人，好容易找着了脚夫，把行李搬到站里。宗武寄在行李车的一件行李却又失了。我赶紧又同了他到外面去找。等到找着，回到大和吃饭，其时颂华已经吃完，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匆匆忙忙吃了些面包，赶去结好行李，来一位日本西崽一手包办，料理我们上了南满车。——一路车上职员完全是日本人。此行幸亏颂华懂得日本话，不然又得多许多麻烦。——上车之后已经很疲乏。倒头便睡了。

我现在已入满洲，出中国；仿佛记得中学地理教科书上写着，这满洲三省还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一出山海关到了奉天站，——他那繁华壮丽的气象，与北京天津不相上下，——却已经另一世界似的，好像自己已经到了日本国境以内呢？……也许奉天现在已经割给日本了！然而原住奉天的许多中国劳动人民，想必一时还没有来得及死尽，怎么奉天站连中国脚夫都很少很少呢？原来日本铁道车站上的中国苦力，他们劳作也受“日本的”节制的。帝国主义的况味，原来是这样！

二十日一早到长春车站。走出车站一看，已经萧然

天地变色，确似严冬气象了。车站前一片大旷场，四围寒林萧瑟，晓霜犹凝，飕飕的西北风吹着落叶扫地作响，告诉我们“已经到了北国寒乡了”。天色阴沉沉的竟有雪意。车站门外停着好几辆俄国式马车，马夫也有俄国人，头上已戴油腻不堪的皮帽；风吹他帽上丝丝的毛乱动，时时掩拂他的长眉毛，越显得那俄国式的面貌愁惨。我们先又到大和饭店吃了点心。回到车站上，要换车上哈尔滨去。从长春以北就是中东铁路——其时形式上已经收归中国管理。车上一切职员却还大半是俄国人——西伯利亚的那种所谓中流社会，或是真正的“俄国的乡下人”(Russky mujik)。车站虽然很大，比着日本的奉天车站气象大不相同。污秽杂乱，还不及江苏横林洛社的小小车站整齐。

我们一到车站，有一俄国人要替我们买票，不知怎样又多算了几块钱去，好容易弄清楚，买好票上车。中东铁路的车身非常宽大，可是三等车简陋得很。我先走进三等车一看，横七竖八，俄国人也有拖男带女，背着大麻包袋的；满地纸烟头痰沫；还有一股臭味。后来走进二等车——那天只有两辆——里面简直没有人坐，我们一进去，就有一俄国管车的来开了两间车房。——我当时一看，二等车原底子装修得很讲究，而且是单间的，我以为三等车和二等车差得太远了。然而进去坐下一细瞧，椅子上灰尘足有半寸厚，窗子，窗帘，小桌子，没一处不是破敝败落的。车子开动了，车里摇晃颠簸得很厉害，两天行旅已觉得疲乏，一晃就睡着了。

将到哈尔滨时，车上又来了一位警察，谈起来才知道，其时中东铁路警察，总算是换了中国人；日本护路

警察却还强和中国警察同驻路旁，双方不时起些小冲突，好不麻烦。他又说他是驻哈尔滨的，此次出差到沿路小站走了一趟，又赔了些钱。他说起哈尔滨生活程度怎样高，一个月的薪水也不够浇裹<sup>①</sup>，后来我问他哈尔滨离车站近的有什么客栈。他就说了一个福顺栈，并说那栈不错。

车到哈尔滨站，已是晚上八九点光景。趁了一乘马车就往福顺栈来。一出车站，寒风凛冽，竟已是严冬气候。到了客栈一看，糟不可言。其中有两种房间，一种是一大敞门，上上下下横排着许多炕，来往小客商都住在那里，——所以一走进客栈，就闻得一种臭不可当的“北边人”气味。还有一种是单间的，一间可住四个人、三个人不等，每天五角钱宿费。房里就只四张铺一张板桌，凳子都没有，窗子是不能开的，空气坏极。我们要住下，就只能包了他一间房，每天二块钱。颂华当时看了又贵又不好，主张换地方；然而时候已是不早，只能住了，明天再想法搬到别处去。我当夜又到车站取行李。（哈尔滨车站已纯是俄国式，三等待车室里，横七竖八的行李，满地泥水，头二等待车室里还供着希腊教的神像。）晚上一句钟，才把各事料理清楚，睡下。可怜，可笑，“我们”这样“文明化的”中国人，一入真正的中国生活，就着实觉得受不了；而且半欧化的俄国文明也使我们骇怪：“原来‘西洋人’也有这样的。”

我们初到哈尔滨，本预备至多只住一礼拜。这一礼拜中必须打听好，前途怎样进行。因此我就主张暂住五

---

<sup>①</sup> 意为衣食。

六天光景的事情，就是福顺栈也可以将就。颂华那时却还想搬。不过一时找不着房子，只得罢了。于是将就找着两张板凳，房间里的闲人，却想法子请他们出去，决定包下一间，就此住下。黯黯的一盏电灯，密不通风的大窗子，一张桌子两张凳，四张板铺——我和宗武、颂华各占一张，一张放行李，满屋子，桌子上凳子上床上，堆着报纸杂志笔墨纸砚，脸盆，牙刷，高高低低像乱山似的——这就是我们哈尔滨寓所的一幅景象。天天早晚还得出去吃饭，买东西，打听消息。

从天津到哈尔滨，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哈尔滨简直一大半是俄国化的生活了。

初到哈尔滨的时候，还只听见一种谣言，说谢美诺夫横梗在满洲里赤塔之间，火车不通，只有专车能经过。我连日买俄文报看，起先消息还不清楚，后来过了不多几日，谢军和赤塔民军剧烈冲突的消息盛传，赤塔满洲里中间桥梁也已经毁坏了。天天去看陈总领事，他也迟迟无行意。于是才知道没有快走的希望。目的地还没达到，中途又生阻梗，实在很烦闷。三人之中不时发生退回北京的提议。哈尔滨生活程度异常之高，一间房二块钱一天，一顿饭——很坏很坏的——一元几角钱，我们三人一天至少五六元化费。看看天气又冷，天天坐在层冰严结的水晶宫里——窗子上的冰，一天一天厚起来，难得一天天气好，化得开的，——也是无聊的很。然而我们抱着坚决的意志，本当百折不回，商量又商量，决计静候时局，再定行止。

幸而不久就得到赤军占领赤塔的消息，听说远东共

和国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满洲里方面战事虽还正在胜负未分之际，于我们却已有一些希望。因此大家也渐渐定心了。可是天天打听消息，延宕又延宕，一瞬已是十一月中旬。我们在哈尔滨居然住了这许多时——一直到再动身北进足有五十多天，——也正出始料之外。然而哈尔滨一游，恰可当“游俄”的绪言，我且略记当时的感想。

哈尔滨久已是俄国人的商埠，中国和俄国的商业显然分出两个区域。道里道外市面大不相同。道外是中国人的，道里是俄国人的。我们到哈尔滨时，俄商埠已经归中国官厅管理。道里也已设中国警察局。其余一切市政，俄国援向例组织市政会参与行政的。欧战后俄国商业一天凋零一天，市面差不多移到道外去了。日本人趁此机会努力经营，道里的市面几乎被他占了一半。俄国市面，从革命后新旧党争，常常纷扰，俄卢布纸币（帝国时代的）跌落得不成样子，日本金票骤起夺他的市面。以前哈尔滨商场向以俄卢布为单位，现在卢布跌落，日本金票几有取而代之之势，幸而中国银行（哈尔滨）钞票有信用，居然变成中国银元的单位，哈尔滨中交银行且发辅币票，新铜元，概为十进制度，很整齐不紊乱。所以当时中国人的经济势力还算站得住。然而其时中东铁路正在所谓国际管理与移归中国争论不决的时候，中东铁路关系哈尔滨甚大。——俄国人已完全失其经济上的威权，况且劳农及远东两政府屡次声明要归还中国，事实上俄国人在哈的经济权已经早就打破了一大半，中东路权的转移就足以证明，——可是日本人却趁此机会想

取得中东路，日本人若得中东，哈尔滨就快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我们从奉天到哈尔滨沿路触目惊心，都是日本人侵略政策的痕迹。日本连年经略西伯利亚，干涉俄国内政，扰乱珲春治安，其志不小，竭力想吞并满蒙西伯利亚，这一问题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解决呵。我们常和哈尔滨人谈起，凡当地红胡子出没的所在，差不多总有日本人的踪迹。

哈尔滨市面上居然也有日本警察。俄国势力倒了——旧俄帝国已死——日本却又来了。我们有时街上闲走，常常听说中国人欺侮俄国落伍兵士警察，日本警察就来干涉。哈尔滨有日本商品陈列所，日本报馆、杂志，对于哈尔滨市政，调查得比中国人俄国人都清楚。我们还到过一日本客栈，颂华和那客栈主人谈话，我在旁看着：那客栈主人——老妇的脸上，一丝一丝皱纹里却寻不出什么帝国主义的光线出来。妓馆饭馆，日本人开的也尽有，日人的经商确是精明，而且待顾客很和气，只有颂华有一次去看一日本新闻记者，和他谈起中东路问题，他却大显其狡猾的形容语气，——俄国人说：这些都是世界资产阶级的仆御，诚然不错。我们每天在小馆子吃饭，饭馆主人和我们也熟了，我因问他“为什么哈尔滨饭食这样贵？”他说：“呵！不用说。哈尔滨什么都贵。日本货便宜些。我们吃的米都是东京米。呵！贵得很！怎么比得我们山东。更不必说你们南边了。……”原来南满横梗在中间。中国货物经过该路，化的运费非常之大，所以竞争不过日货。于是日货就充满哈尔滨了。中国人所得苟延残喘的一点经济势力未必见得保得住呵！

况且中国人的商业全靠几家火磨（面粉厂），当地的出产如豆，麦，油等，自从俄国断了通商关系之后，销路日隘，往南运去又非得经日本的南满铁路不可。如若中国不赶紧和远东恢复通商，结一经济同盟，其势决敌不过日本的帝国主义的。

中国人在哈尔滨经商的大半是奉天人山东人，多数是小商人。湖北人、宁波人也有，湖北人剃头的居多，宁波人是做西装裁缝或皮鞋的小手工艺。那地的中国人生活，上等人是半俄国化的，——很有些俄国洋行的西崽出身立致巨富的，现在还住着几层高的洋房，娶的俄国媳妇，其余就是北京去的官僚，奉天黑龙江去的武夫。下等人大半是纯粹北方式的生活。中国苦力大半是铁路工人，也有些组织，住的地方叫三十六棚。其余工人，佣工者大概生活还不十分艰难。其地工价非常之高——一半是俄国工会的功劳。我曾到邮政局去调查，据说每月中国山东直隶等省小工寄回去的钱，总数总在一万元以上。——也足见那工人生活勤俭能储蓄了。那地方南边人非常之少。那天我们同到一小饭馆吃饭，忽然听着苏州话，问起来，才知道只有这一家。灰色的中国人生活到哈尔滨更变成黑色的了。哈尔滨生活尤其有沉默静止的特征。全哈中国学校不过三四处，报馆更其大笑话。其中只有《国际协报》好些，我曾见他的主笔张复生，谈起哈尔滨的文化来，据他说，哈尔滨总共识字的人就不多；当真，全哈书铺，买不出一本整本的《庄子》，新书新杂志是少到极点了。上等人中只有市侩富僚，俄国化的商铺伙计。上上下下都能讲几句“洋泾浜”的俄国话——哈尔滨人叫做毛子话。然而他们下等社会静止的生

活却依旧漠然不动，即使稍受同化，却又是俄国式乡下人的污糟生活。这种地方住着未免烦闷呵。

俄国人在哈尔滨的经营历年也不少。到现在道里及秦家岗一带差不多都是俄国人的生活。商铺也还有不少。俄革命后亡命者的白党、资本家将军都聚集在此地。成天在街上只看见俄国人，那些亡命的资产阶级却还是高楼大厦的住着，吃得饱饱的肚皮，和日本人鬼鬼祟祟串些新鲜把戏。各派俄国社会党在哈尔滨联络一中东路工党联合会，多数党少数党社会革命党都在一起，而以中东路工人联合会及哈尔滨城市工人联合会为实力上的后盾。哈尔滨的劳动运动，以这一联合会为中心点。他为俄国工人，青年，以及中国工人举办好些事业——教育卫生等。中俄两国民族的接近，确比日本人及其他欧洲人鞭辟入里得多。中国苦力心目中的俄国人决不是上海黄包车夫心目中的“洋鬼子”。下级人民互相间的融洽比高谈华法、华美文化协会的有些意思——他们大家本不懂得“文化”这样抽象的名词，然而却有中俄文化融会的实效。——不过并不是什么文明进步的意义罢了。

哈尔滨道里的俄国化生活使人想到上海天津等欧化景象，彼此截然不同。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哈尔滨盘据着中东路的要津，已经根深蒂固，如今一旦动摇，他们就起恐慌，阴谋诡计百出。革命后各处的俄国亡命客又都聚集在哈尔滨。于是哈尔滨，就变成俄国新旧党的纠葛地。新党（各派社会党）自有组织，努力于工人运动，和中国劳工结合。旧党分子也非常复杂，旧党机关报如《俄声》（Russky Golos）及谢美诺夫派报馆《光明》（Sviet）专和新党机关报《前进》（Vperiod）反对，差不



多天天打笔墨官司。《前进报》总经理国尔察郭夫斯基(Gorthakovsky)，我们见过好几次，谈及中东路问题及工人运动，他常发很恳挚的言论，——已见那年《晨报》通信，现在时过境迁也不再及，——他为人非常蔼然可亲。常常发一种疑问：“俄国劳动人民对于中国国民未尝有丝毫的恶意，白党在哈尔滨勾结日本人暗杀新党首领，——国氏本是中东路工党联合会的会长，也曾遇过两次险——不但扰乱治安，而且他们一旦得势，全满洲都成日本的殖民地，我们同是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何以中国政府不知道果断实行而还是这样优容旧党，养痍遗患呢？”我们自己也不懂得，始终不能答复他。却有一次，我为好奇心所激发，以新闻记者名义去访《光明报》主笔。《光明报》是谢美诺夫的机关报；其时我听见谢美诺夫和赤塔军队打仗已连败数次，退到离满洲里不远的地方，而同时又有日本驻哈总司令赴满洲里的消息，我要知道谢军的实力，究竟如何，日本的接济能否维持他。所以去见《光明报》主笔探探他的口气，——或者间接能知道我们的行期：假使谢军确实预备退出满洲里，我们就可以动身了。他听我问到“谢将军”，他说：“呀，谢将军是真正的俄国民主主义者，可恨社会党，过激党胡闹。现在日谢同盟仍旧很巩固，不过满洲里形势异常……他们已另定有计划，换一方面或竟换一地点进行。可是‘谢美诺夫民主国’，如其成立之后，希望中国了解远东问题的重要，能和‘新俄’及日本结三国同盟，抵御美国的侵略……中东路，只有‘俄国’日本中国有过问之权，岂容欧美人插嘴……”我当时就知道他所说另一地点，或者是海参崴，也就不以为意。他说到“三国同

盟”的时候，笑嘻嘻脸，放出油光闪闪的狸猫眼睛，不断的看着我……谈话非常之客气，真正资产阶级的招牌挂得起呵！现在谢军差不多一败涂地，也不过一场春梦罢了。

哈尔滨的大概情形，我在哈时所做的几封《晨报》通信也曾略略叙及。这是要专门调查研究的。我此地不过随便写几句感想，零乱无序，也无从整理了。

在哈等待出行的时期，非常烦闷心焦。每日出去访俄国朋友，调查调查俄国的工人组织，并且搜集些俄文书报，以为研究劳农政治的材料。寓所里齷齪污秽得很，坐不住，也常常出去散步。——似乎生活很不适意。然而眼前横着一种希望，也便耐心等候。初次和俄国党人接触，得着的教训，也就不少呵。

哈尔滨这个地方，中国本部人初到的时候，总不免有种种奇异的感想。俄国旧日的经营西伯利亚一直到北满一带，生生开辟出来的荒地，历年以来，虽渐渐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化，一方面孕育劳动运动，始终经济生活还是保存落后民族的特性。如此“非现代的”经济生活里，如西伯利亚，如哈尔滨，怎样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这是一个疑问。再则，我就经济现象想来，最容易显现出生产关系的，除非是“交易单位”（各地的货币制度交易汇兑方法）。而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往往使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另成一种特异性。经济生活的研究，我们就最粗浅的现象观察，观察当地的“财政资本”流通的状态（即银行经济在市面上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感受资本主义的痛

楚。——何况在殖民地的特异经济中呢，自然尤其显得帝国主义的功能。我就旅哈身受的经验想起：从天津到奉天，北京天津的中交票不能用了，要换日本朝鲜银行钞票，从长春到哈尔滨，中东路未收归中国管理之前，还不得不换俄国卢布买车票，现在虽可用中国银元，然而天津钞票已不大行，非得哈尔滨钞票或日本钞票不可。同样差不多在一范围内的经济生活，何以必须经三重“国家”的麻烦呢？人类经济生活，生产消费各得其当，便完了；像这样“殖民地的”剥削政策下之经济，依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当怎么样整顿呢？——这是第二个疑问。这两个疑问，虽然不是我现在所能解决，然而却引起我心灵中的变化；我预想社会改造既在俄国实现，事实上他们——俄共产党——必定有确切实际生活的方法。——抽象的“真”“美”“善”的社会理想，决不能像飞将军似的从天而降。——因此我个人的哲学概念，推广这种实例；由主观立论，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由客观立论，更确定我的“世间的唯物主义”。劳工神圣，理想的天国，不在于智识阶级的笔下，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进。心灵的安慰，物质与精神的调和，——宇宙动率的相映相激——全赖于人类的“实际内力”。“实际内力”能应付经济生活的“要求”及“必需”，方真是个人，民族，人类进化的动机。

我“回向”实际生活。我且就在哈尔滨的感想，所处的环境随笔记一记。那经济学问题，哲学问题，暂且搁下，留在此做我心理变迁史中的一鳞一爪的痕迹。

黯黯的天色，满地积雪，映着黄昏时候的淡云，一层一层春蚕剥茧似的退去，慢慢透出明亮严肃的寒光来；噉噉喳喳私语的短树，林里穿过尖利残酷的寒风；一片空旷的冬原，衰草都淹没在白雪里，处处偶然露出些头角，随着风摇动，刷着雪丝作响；上下相照，淡云和积雪，像是密密诉说衷肠，怨叹生活的枯寂，哈尔滨秦家岗南头，俄国人住家多数在那里，热闹的市面已经过去了。我走去看一俄国朋友并访他的妹子马露西霞(Raigorodsky Marucya)，才走到这段地面。向来厌恶哈尔滨小城市生活的繁猥，到此也稍有安慰了。“呀！你们来了。”他们赶紧招呼预备茶点，大家坐下，就谈起来。他们知道我要到俄国去，随便替我说些俄国文化上的趣事，怎样不和西欧相同，怎样宗教的势力很大等等。——马露西霞是一托尔斯泰派。——谈到苏维埃政府，他们也不知道详细情形，莫斯科生活如何，他们也很想去看一看，可是苏维埃俄国穷困不堪，大家是知道的，所以要回籍须得政府的许可，因此他们却不比外国人，能容易入境。我因他谈及俄国文化，就随便问问他，住在中国许多年，对于中国文化有怎样的感想。他们都说：“我们没到过中国。你们以为哈尔滨是中国么？俄国侨民的生活却完全是俄国式的。——和中国文化接触的机会很少。就是在俄国商务中学念过点中国史。东方古国的文化非常之有趣。也很想到北京上海等处去走一走。……”我和俄国人的交际虽因俄语程度太坏，不十分广，却也认识十几个人——有是党人，有非党人的。我们请他们吃过一次中国饭，他们羡慕得不了；——原来住在中国地方，一直没真确知道中国生活、中国文化。他们

心目中的中国人只有一般苦力，小商人呵。当天晚上七八点钟回寓，走出他们家门，街上已经很冷落。天气很冷，走了好一段路，才看见一辆马车。我叫了他一声，只听得回答道：“Kudai?”<sup>①</sup>我才知道是一个俄国车夫，随即和他说了地方，坐上车去，相离不到一里半地，却要五角大洋。读者如其是中国内地人，不要以为是上海汉口的马车，这是破旧不堪的俄国式马车，却要得如此之贵，——中国车夫要得便宜些。我因随口问问这一车夫家计怎样，据他说哈尔滨样样东西都贵，所以车费不得不昂，一天却也可以赚得五六元钱，——俄国车夫大半只知道要日本金票，不要中国洋钱，我这里是和他折算的。他也没甚功夫去到俄国工会所设的俱乐部、音乐会。一路谈着，忘其所以，抬头一看，却走到秦家岗南头去了。——和我们的寓所背道而驰。其时云影翻开，露出冷冰冰亮晶晶的一轮明月，四围还拥着寒雾，好像美人出浴披着轻纱软帔似的；马路旁寒林矗立，一排一排的武装着银铠银甲，万树枝头都放出寒浸浸的珠光剑气；——贪看着寒月雪影，竟忘告诉车夫，走错了路。愈走愈远，——错误偶然与人以奇遇：领略一回天然的美，可是寒意浸浸，鼻息都将冻绝，虽则沉寂的寒夜，静悄悄已没一点半点风意，宇宙的静美包涵在此“琉璃天盒”里，满满的盛住没起丝毫震荡，然而大气快成冰水，“干冷”的况味，也不容易受。我才唤醒车夫，叫他拨转马车，赶回寓所。他却还咕噜着说：“……中国人……中国人今天怎么忽然不知道哈尔滨街道的俄国名字？……”

---

<sup>①</sup> 意为“哪里去？”

叫我跑这许多冤枉路。”我心上想，你在中国地面赶马车，却不知道中国街道的中国名字，等到到了福顺栈，才说：“唔，原来是这个地方，为何不早说清楚！”那又怎么说呢？

哈尔滨道里及秦家岗两部分，完全是俄国化的，街道都有俄国名字，中国人只叫第几道街，第几道街而已。俄国人住在这里，像自己家里一样。可惜年来俄国商务，道里市面，不大繁盛了。却是，俄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和日本人勾结，日本人商界实业界努力搏取哈尔滨的经济势力；劳动阶级一方面，组织运动却有一步一步兴旺起来的趋势，和赤塔新党暗中互通消息。那一天我从前进报馆出来到七道街江苏小饭馆吃了饭，沿着俄国人所谓中国大街（Kitaiskaya ulitsa）回家，已是傍晚时分。走过一家俄国报馆，看见许多中国卖报的，领着报，争先恐后的跑到中国大街去抢生意做，——抢着跑着，口里乱喘，脚下跌滑，也顾不得，逢着路人，喘吁吁叫着：“买《Novostijizni》<sup>①</sup> 呵！买《Vperiod》呵！买《Zarya》<sup>②</sup> 《Russky Golos》呵！”——为的是生活竞争。沿大街两旁，俄国人，有相偎相倚坐在路旁椅子上的；有手搀一面低低私语指手划脚，一面走着的；有在铺子里买着东西，携着一大包裹出来的；雪亮的街灯，电灯光底下，男男女女一对一对穿花蛱蝶似的来来往往，衣香鬓影，紫狐披肩，蓝绸领结，映着大商铺窗帘里放出的电光，还想努力显一显西欧化的“俄国资产阶级”文明。

---

① 即《生活日报》。

② 即《曙光报》。

还有一阵一阵俄国青年学生和女郎散步的踪迹；我走着，看见大街对面，乱乱落落俄国人影的背后，雪亮的电光，从窗子里映出来，照着很清楚两个金字在玻璃上：“朝日”，却是俄文，细看窗子里面，有日本女郎的影子，窗口露着一端一端的日本绸布呢。中国大街尽头，一转弯就是一日本的哈尔滨日本商品陈列所，我们走过时却不见门口有电灯，已经关门了，然而我记得陈列所里商品很丰富，除农业品平常不足论外，工业品却应有尽有，形式上看来和“西洋”货无毫厘差别。过了这陈列所，离我们寓所不远，却走过我们天天吃饭的小饭馆，饭馆主人是山东人，看见我们就问：“为什么今天不进去坐坐呢？”我们和他说已经吃过了。正谈着的时候，忽然听着背后有人哼着：“Milocti……Milocti”（请赏……）回头一看，却是一俄国乞丐。饭馆主人给他两个冷馒头，我也给他一角钱钞票（在哈尔滨难得用着铜元，身上竟不大找得着）。他画着十字尽说：“谢谢，谢谢，上帝佑你……上帝呵！中国人比俄国人还好多着呢……”咕噜着去了。饭馆主人说道：“给不得他们，天天来歪缠，昨天还有两个毛子，不知什么地方偷来一丈多黑绸，要卖给我们；少他的呢！……毛子真不好打发。先生们，呵，知道不知道，在这儿俄罗斯毛子穷人多得很。先生们想，要是俄国穷党（北方人俗称‘布尔塞维克’的名字）一来，这般人都得抖起来罢？……”我笑一笑，也没回答他，就顺路走回寓所了。

蔚蓝的天色，白云似堆锦一般拥着，冷悄悄江风，映着清澄的寒浪。松花江畔的景色，着实叫人留恋。那天我同着俄文专修馆的同学特地去游一游，趁着小船从道

里到道外。在江中远看着中东铁路的铁桥，后面还崇起几处四五层的洋房，远远衬着疏林枯树带些积雪，映着晴日，亮晶晶光灿灿露出些“满洲”的珠光剑气。在船上谈起俄文馆同学，原来在哈尔滨我们同学很多，审判厅，俄白党报馆，中东铁路，戊通公司在在都有。——不但哈尔滨，从奉天至满洲里以及中东路小站都有我们同学。他们的教育程度是“如此”，他们的生活也比上海洋行买办式的英文学生甚至于北京天津研究英法文的“大学生”寒俭得多。然而大家是知道的，满洲三省文化程度几等于零，他们还要算此地的明星呢。我这次到松花江畔，本是顺便找我的俄文馆同学，——一个船长，可惜他没有在那里。所以趁此乘小船逛一逛，到道外上岸——沿着中国地界的茅屋土舍间污秽不洁的小路转回寓所。俄国的哈尔滨，俄国的殖民地，——可怜的很，——已经大不如天津上海，马路上到处堆着尿粪。——在中国人眼光里还只见他辉煌壮丽的大商铺。再一到中国“北方”人生活里，更加污糟不堪。道外这种远僻街巷，沿松花江边，几间土屋，围着洋铁皮木板乱七八糟钉成的短墙，养着几只泥猪；这就是中国人的写生。文化不是天赋的，中国民族应当如何努力；并欧洲人所笑的野蛮的俄罗斯人都不如。经济生活，生产方法不变，一方面既不能有文化的要求，以进于概括而论的文明；另一方面更不能有阶级的觉悟，担负再造文物的重责。东方古文化国的文化何时才能重兴？所谓“改造”，根本的意义，通筹统计原在于“为全人类文化而奋斗”。如此黑暗的民族，不是须经更深切的资本主义化，就得行“新式的”无产阶级化。在满洲三省尤其重要。且不谈那总解



决的大问题，就是目下急切的零星解决，满洲的文化运动，也就紧急必需“往民间去”的先锋队。可惜在此地的智识阶级只有一般中了“北方式”官僚教育毒的俄文馆派。只好任那松花江里帝国主义的血浪，殖民政策的汗波，激扬震荡，挟着红胡子似的腥秽的风暴，丘八爷似的严酷的冰雪，飞吼怒号罢了。

哈尔滨旅馆生活一瞬已有一月多了，天气一天一天冷起来，街上的积雪，树梢的寒意，和着冷酷陈死的中国社会空气，令人烦闷。北地严寒，渐渐的显他的威武。可是我心苗里却含着蓬蓬勃勃的春意：冒险好奇的旅行允许我满足不可遏抑的智识欲，可爱的将来暗示我无穷的希望。宇宙的意志永久引导人突进，动的世界无时不赖这一点“求安”的生机。你如其以“不得知而不安”就自然倾向于“知”。天气的温度降低，他的密度失了均势，以压力不平而不安，汽质就自然倾向于凝结。社会组织失了根据地，自然就动摇，借着怪物的“社会声浪”，鸣他心意的不平。自“不知”动而至“知”。自汽动而至冰。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动而至社会主义，至“新式的”现代的无产阶级化。全宇宙不过只这一“求安而动”的过程。安与不安的感觉，又只在前“五识”及第七识<sup>①</sup>上显现，以为行为最后的动机。第六识（意识）的动机是粗象而且虚伪谬误的。而社会的意识（社会的第六识）尤其常常陷于伪造幻象错觉。动的过程只在直觉直感于“实际”时显其我执（第七末那识）的功能。我旅俄的意

---

① 佛教用语。

义，实是我直感的反射动作。第六识的分别，计较成败所影响于行为的极少。

凄凄的寒月，冷冷的寒风，映着晶晶的寒雪，澈影我的心神，——照见我就是“斯笃矣”主义（Stoicisune）也只是求精神生活安宁，甚至于还是求物质生活安俭的倾向而已。我自念我的内力，实际所有的才能，在当时实无一利于社会，同时于我个人的生活意趣，有极不安宁的状态。所以因求安宁而愿蹈危险。“至于冒险而去，成败究竟如何？”并不是不应当问，而是不必问，或简直是不问。意识万能，本是迷信；何必起计较分别。至于极粗的心理现象“意志”，更不足论。所以我冒险而旅俄，并非是什么“意志坚强”，也不是计较利害有所为——为社会——而行；仅只是本于为我的好奇心而起适应生活，适应实际精神生活的冲动。生活不安的程度愈高，反应冲动的力量亦愈大。既无益于抽象的中国社会文化，又无味于具体的枯燥生活。当然，除出那一部分薄弱的意识作用：有无利益于社会，而心理上突然呈一种猛进的状态。“宁死亦当一行”。——如其还有“社会”“文化”观念，求为人而劳动，那只是第七识的我执所驱策。每天工作完，同着颂华散步，荒地上凄凄的月色，雪影稍微放他“自然”的动机，往往就谈及这些兴味浓郁的问题。哈尔滨寓所狭隘不堪，我却常常说到莫斯科，有这样一间屋，三个人住住也就可以了。那时听说莫斯科食粮缺乏，燃料不足，又常常说笑话：“颂华，我们去了，不但冻饿，还有别种危险，兴兴然而去看‘新奇’，也许不幸奄然而就死。……”颂华道：“你为什么说这种不祥的话，扫兴得很！……”

## 第二章 到俄国去



### 一、途经满洲里

十二月初得到确实消息，谢美诺夫的兵已败退，日本人出来调和，护送谢氏到沿海滨省，满洲里方面总算肃清了。我们行期，好容易有一点希望。一鼓作气从北京到哈尔滨，忽然中途停顿了这五十多天，锐气恐怕有所消磨。得着这种消息，勃勃的生气又振作起来。去看了陈广平，知道他的专车已经办妥，行期也定在十二月七日离哈尔滨。

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苏维埃俄国，是二十世纪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究竟如何情形，虽有许多传说，许多宣传，又听见他们国内经四年欧战三年内乱，总不知详细，只是向着自由门去，不免起种种

想象。此去且要先经新造的民主主义的远东共和国，——为苏维埃俄国之缓冲地，行民主主义制度而执政党是共产党——布尔塞维克；亦是研究的兴趣盎然。快走了！快走了！快到目的地了！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可以有研究的机会了！而还没有研究。请先得共产党一点空气（atmosphere），回转去说一说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纪念的盛况。

十一月七日（彼得城发生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日子（俄国向用希腊历，比西历迟十三天，十一月七日乃俄历十月二十五日，所以谓之“十月革命”）。我当时还在行止未定，得一俄国友人的介绍去参观他们的庆祝会。会场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劳工大学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中国警察厅的许可，召集大会。会场里人拥挤得不了，走不进去。我们就同会长商量，到演说坛上坐下。看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International），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演说的庆贺苏维埃政府，俄罗斯共产党，第三国际（III International），世界革命。末后又得赤塔远东新政府亦在这一日宣告正式成立的消息，还有从莫斯科刚到的一个共产党报告，大家更激昂慷慨，欢呼万岁。最有意思的是：一少数党代表宣言中东路一带少数党以至于赤塔，趁此不参与多数党反对的策略，在远东方面两党可共同协济。其时有一社会革命党宣言的意思，“大致也相仿佛”，可是他指摘多数党许多谬误，甚至于说他专制残酷。

坛下就陡然起“嘶……嘶……”的斥骂声……。大会完之后我们就到俄国友人——一多数党——家里去晚宴。屋子里放着盛筵，电灯上包着红绸，满屋都是红光，红光里是马克思、列宁、杜洛次基的肖像。吃饭的时候，大家痛饮欢呼。席中有许多俄国女郎，靠我坐的身上香气浓郁，都凑近来问中国，北京，上海的风俗人情，絮絮不已。忽然席间来了一位刚从莫斯科到此的共产党，又站着演说：“我们在此地固然还有今夕一乐，莫斯科人民都吃黑面包，还不够呢。……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重任，竭力设法……大家须想一想俄国的劳动人民呵。……”我因问和我谈话的女郎是不是共产党，他回说不是，然而对于共产党表同情的。他却问：“你是共产党不是？中国政党有多少，有像我们共产党这样大的没有？”我说中国政党的情形，又说：“中国社会党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只有像你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时的许多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会。”他道：“中国政党原来这样，难道只有张作霖一个人管政事么？……”酒阑兴尽，站起身要回寓，颂华却因不懂俄国话，和一个刚来的人谈英文，那人听说罗素已到北京，想赶去听讲，却很倾向于基尔德社会主义<sup>①</sup>呢。我叫着颂华回去。十月革命的庆贺算完，要待到莫斯科过第二次十月革命纪念了。

启程的日期已到，陈广平却又迟延。他说从哈尔滨到莫斯科虽是专车，恐怕劳农政府要车费，一个人约摸要三四百块钱，我们没法，三人共给他一千元，又因莫斯科食粮缺乏，托他买了一百元面。——那一千块钱，后

① 即行会社会主义。

来到了莫斯科四五个月之后，陈广平说：“哈满运面费二百二十六元，我虽没付出，外交部一定要在公费内扣算的，还有，‘什么要多少钱，什么要多少钱，’我算来该还你们四百五十几元。……颂华已经拿去五十五元。这里有苏维埃钱四百零七万卢布（其时一万七八千苏维埃钱才能兑一块中国钱），请你们收了，写张收条罢。……”这一千元的公案是这样完结的。我们赴俄，知道那时俄国禁止商业，沿站什么也没有买的，自己备了火酒炉，陈广平又答应我们共同吃饭。后来算帐，他却要了我们买的面十铺德（中国秤合有三百斤面），算三个人在车上一个半月的伙食。带的面居然大有用处。我们后来在莫斯科的食用消费都靠他。这都是后话。

十二月八日才搬到专车上住下。又等两天方才动身。那几天料理一切，交旅费，买食粮，委琐不堪的事情使人烦恼。这才尝着现实社会生活的滋味。所以说：世故，人情，经验。原来是不懂得世故人情，没有经验，就该受骗。懂世故人情，有经验的人都受过“骗的教育”。我却后悔不曾多受几年东方古文化国的社会教育，再到“泰西”去。

十二月十日开车，又离哈尔滨往北去了。

同车一共六个人，我们同伴三个，莫斯科领事馆三个。在车上没有事就随便谈话。这次旅俄“和领事同行”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因此略知中俄外交以前的经过，中国在俄的外交界向来的态度，在俄京外交团里的地位，在俄国华侨里的口碑，别一方面，截然两个世界两个社会的人聚在一块，精神上的接触，发生种种的痛感，绝不投机的谈话，费了无限的宝贵光阴，双方各

自隐匿了真面目，委蛇周旋也夺去我不少精力。

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中国公使刘镜人和协约国外交代表取一致行动，留在彼得城没有什么作为。其时华侨的事情，一半却还是华侨联合会办的。华侨联合会会长那时就是现在的副领事刘守清。守清自己说，他留学彼得城莫斯科前后好几年。中国公使馆在俄京外交团向来有一种特别态度。人家在外交上总有跳舞会等的交际，中国公使不但习于沉静的生活，而且以节省交际费起见，常处于隔离的状态。守清当留学生的时候，有事情就到使馆抗议，公使见着留学生作向例的惧态——守清自己说的，很可一笑呵。战时俄国华侨困苦，北京曾经募捐十万元接济，其时还是黎元洪总统时代，老黎亦捐了不少钱。捐款到刘镜人手里，听说吞没了一个大大半，至今没有下落。可怜中国的穷苦侨民，一点儿没有受着国内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之些许恩惠。十月革命一起，公使团退出彼京，别国公使多少总料理自己侨民归国，或是自己带着走。中国公使自己得了一辆专车，赶紧偷着就跑，生恐侨民和他“纠缠”；有些留学生得信早的，挤上了同走，公使却想向他们讨车费，禁不起一番抗议，也就罢了。那时战事紧急，枪林弹雨里刘公使固然得逃了一条性命，贫困的侨工十数万人——除了华侨会救出一些之外——至今转侧困苦，饥寒冻饿呵。谈及这一次总领事的赴莫，原是两年前华侨会举刘守清为代表到京请愿的结果。此去的任职，第一就是遣送华侨归国。我听说陈总领事以前在刘镜人公使馆前后七年。谈起来才知道，他非但对于俄国文化丝毫不了解，外交政治上的大势也不知道，连几句普通的俄国话也就有限得

很——简直一句都说不完全。中国本和苏维埃俄国还没有条约的关系，领事到后，还不知行使什么样的职权呢。

我们离哈尔滨往西北进，沿途经过齐齐哈尔等站，穿行黑龙江全省向满洲里进发。途中和领事等谈话外，就和颂华商量调查俄罗斯的方法。新闻记者的任职，照实说来，我是无能力的；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可怜中国现代的文化，这种调查考察一国文化，一种新制度，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却令我这学识浅薄，教育不成熟的青年担负，——这是人才的饥荒。我与颂华说，请他负通信事务指导的责任，我当竭力帮助，——成败不问，尽力而已。我个人呢，定了一勉力为有系统的理论事实双方研究的目的。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车已离哈，从此渐入佳境，也就渐渐感觉责任的斤量。

闲着无聊，望着车窗一片雪色，往往几十里内绝无人烟，令人感慨。西伯利亚直贯满洲的铁道，欧亚大陆的血脉，几十年才垦出这点荒地。地力的开发，还存着莫大的富源，何以中国自己闹人满之患，却等别人来经营呢。盲目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消费分配，一件都不能有计划的。满哈道上沿站多少都有存积的粮食，原来自从西伯利亚和中国的商务关系断绝，交易就停滞。世界经济整个的身体里，血脉忽然不流通，自然就成臃肿的病状。沿站一堆一堆禾麦，盖着积雪，愁惨惨对着凄凉的天色，好一似病人四肢困顿——南边遏于“南满铁道的手铐”，北边锁着“谢美诺夫的铁镣”——血气壅滞，颜色死灰，奄奄就毙了。车行飞掠，听着狂吼的北风，震颤冰天雪窖的严壁，“红色恐怖”和东方太阳国的财神



——资本主义——起剧烈的搏战，掀天动地呢。

十二月十三日晚到满洲里站，那天正是中国边防处派驻俄军事代表张斯馨中将回国，亦到满洲里站。我们见张斯馨，据他说，中俄外交本是极有希望的，可惜中国政府畏葸，没有确定的计划方针：“俄莫斯科政府，很愿意放弃一切帝国时代所侵略的权利，和中国开始友谊的谈判，恢复通商。……政府不给我以全权，我的事情也是办得有头无尾。俄政府招待外国代表向来是非常之优待的，——我亦在优待之列。不意‘段督办’一倒，中央政府特电伦敦，说我不是正式代表，劳农政府几乎当我是间谍，……一切开始的交涉都成泡影……”中国侨民在俄国的确很困苦。可是，中国人对于法纪，“政府”的抵抗力，好一似生物学里所谓“抗毒素”，是中国人天性中的特质。劳农政府在军事时代采严厉的集权制，正在禁止投机商业(speculation)，中国奸商却还趁机作恶，竟有卖鸦片的；或者呢，简直入共产党，以便倚势妄为；穷极无聊的困兽，也有去当红军的——在南俄最多——施其残忍杀掠。就是张斯馨的随员中也有因为投机商业而被捕入狱的。这都是张斯馨的随员，其中有我俄文馆的老同学，随便谈及的，也有以后在俄国华侨中听见的。如此严厉的政制之下，中国人仍有取巧作弊的本领，真是天赋。“社会力强制的非正道的抑遏天性的制裁，所得几千年的遗毒，就成为个性横溢于邪道的本能呵。”

和张斯馨中将同回国的，还有一位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长刘绍周。他是在俄留学生最出色的一个人才。他曾经对我们说许多华侨的事情；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欧俄经过三年大战四年内乱，经济状况破坏得不了。那时

却正是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期的关键。蓝格尔<sup>①</sup>已经败退，东纳（Don）<sup>②</sup>煤区已入赤军之手，从此波兰战事亦已停止，可以努力于经济改造了。当时——据刘君说——已比一九一九年冬天，人民生活要好得多。国内三种人：一，兵及工人，国家所最注意的；二，农民，是当时俄国中最富有的；三，智识阶级，也有很苦的，也有受优待的。至于一九一九年冬天刘君还吃过两个月马食料呢。苏维埃俄国现在学校不收费，儿童公育。可是国家穷困，经费不足，一时也不能普遍，成绩不能十分好。……

自从到哈尔滨一个半月，先得共产党的空气，现在到了满洲里能遇着刘君绍周，得知劳农政府的事实上的经济状况。可惜于研究学问的过程中，不得不受实际社会生活的影响，耗我精力呵。

## 二、在赤塔

车到满洲里又停下，张斯摩的专车已往南去，陈广平的专车却欲进不进。张斯摩在莫斯科奉政府撤回命令时就报告劳农政府，另有总领事赴莫，劳农政府只说一声“中国既派代表来，俄国亦要派代表去。”欢迎是一定欢迎的，可是中国总是由伦敦转电，劳农政府不得正式

---

① 今译弗蓝格尔，原沙皇俄国将军。

② 今译顿河。

通知。何从预备，又况远东共和国呢，——他更不知情由了。所以在满洲里还要等待赤塔政府回电，才能前进。再则呢，满洲里方面初经战事，张斯廖回国的车是战后第一次自赤塔至满洲里的车。我们的车，却是战后第一次自满洲里至赤塔的车。途中桥梁毁坏，还有危险呢。

在满洲里停顿四天。天气寒冷，纷纷的大雪，我们偶然上站闲步；买些东西，其贵不可思议，俄国理发处，一人要一块钱。站外荒荒落落，街道也是俄国式的。以前此地也算中俄交界第一商埠，几经战事，凋敝不堪。我们曾到邮政局访一俄文馆的同学，他住的地方非常寒俭，一张木桌几本《列国志》而已。走进一家山东馆子。“你老来呀！请坐请坐！”吃一些极无味的菜，三人总共化了四块钱。那堂倌絮絮叨叨说，那地俄国人怎样多，谢美诺夫的兵怎样蛮横，穷党来了，又不知道怎么样？“现在倒又忽然平静了！”……我们那天吃完回车，因不认得路，雇一辆俄国马车，走几步路就到，却要五角大洋。

十二月十六日得到确实消息，方才前进，经中俄边境，出满洲，到俄属的西伯利亚了。那天晚上又是大风雪，沿途战争中所毁铁道，都只暂时在冰上架了临时铁轨。因此车行非常之慢，车身簸荡，厉声作响，好像替冤死于“白祸”的俄国劳动人民，哀诉于东亚初临的贵客。黑夜里望着窗外，乌洞洞暗沉沉，微微远见惨白的雪影映着，约摸知道是一片荒原。偶然一阵厉风，刮着火车烟筒里的烟，飞舞起来，掠过窗外，突然闪过万丈红光，滚滚的往东去。……十七日早晨还只到沃洛汶站（Olviannaya Station），车又停住了。前面看得见一顶铁桥已经齐腰折毁，桥下压着破火车。——谢美诺夫的成

续。我们的车只能在河里冰面上搭的铁轨上走。慢慢的，慢慢的，挨着过去，只听着“轧只”“轧只”的冰响，突然一震，砣然一响……“车要出轨了！……车下冰碎了！”好容易看着没有事，走过了。离此不远，又有一村，山色四围；金顶的教堂，还努力放他“中世纪”的光彩呢。十八日到赤塔，——远东共和国的新都城。从此又须费许多手续，致电莫斯科得覆电，再转北京政府，领事专车才能前进。我们三人亦须向远东外交部请签护照。赤塔离中国很近，是中国“消极的殖民地”——和南边的南洋群岛一样的性质，所以中国人非常之多，中俄两国劳动人民密接的文化关系，很有趣味。

赤塔车站前，就是一片空场。我们到后仍住在车上等消息，天天上去调查调查，天气却非常之冷，每走到空场中间，——离车站不过五十步——大瞥上就已满身结霜。我有肺弱的病，每每觉着呼吸困难，温度也确已到列氏寒暑表零点下四十余度。我们调查，首先注意赤塔的社会生活。

荒落落的赤塔车站尽头，停着一辆火车，顶上五色的中国国旗，趁着寒风招飏，熹微的晨光，映着旗上的霜影，放出不自然的奇彩，要显一显他是新产生的西伯利亚之小主人——远东共和国——之第一位来宾。四围山色如屏障，拥着全赤塔都城，居高临下，合抱而来，直到车站。山顶苍翠的松杉，隐在积雪之下，遥遥的含笑望着五色旗，时时放出清澈无比的“绿意”。车站上许多人忙忙碌碌的来往。身上穿的都是破敝不堪的重裘，满身油腻。待车室的门一开，便放出许多热汽。闲步走过

待车室，必定闻着“俄国乡下人的臭味”。出车站空场上，远远就看见东零西落的房屋，战争时烧毁的建筑，残石剩础，凄然的哀诉资本主义的破产呢。脚下冰滑，——经冬满天满地都是冰雪，不到春末不消的。由此东去就近市场，远远听着嘈杂的人声了。

歪斜不整，污秽杂乱的街道，曲曲斜斜折入一个市集，屋角檐梢时时看得见五色的中国国旗。乱杂的人声里，只听得“东腔西调”的中国式的俄国话。严冬的清早，满市腾着“人雾”，街左一间小铺面，低低的屋檐下贴着淡红色的纸联，上面写着歪斜不整的中国招牌。原来是一家中国茶馆，门窗开处冒出一阵阵的烟雾浊气。油腻褴褛大羊皮袍的俄国“苦力”，满嘴嚼着白沫，两手抹着胡须，时时从他家门走出走进。市场进口又有一中国理发馆。我进去剃了一个头。和那理发师谈起来，他们亦是湖北人。他们说：“以前赤塔市面好得多呢，三番两次的打仗，闹得不成样子。我们要走也走不掉。穷党来了，安静了些。可是中国那班山东奉天的红胡子暗中捣乱。前天这里晚上还听得枪声，一个中国人被抢了几十元钱。他……”我道：“听说穷党政府要没收商货，中国人的怎么样？”他们道：“知道他呢！说是只说，每家商货只要登记起来。中国领事还要抗议‘办公事’哩。……俄国人自己不敢做生意，还托着中国人的名儿。”又一个中国人，亦是来剃头的，插嘴道：“那陈老三可不是这样发财的么！……”进了市场，——只是一片旷场，横七竖八的小摊子。中国小买卖很多。俄国人的货物都是旧鞋旧袜。还有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背着一两件旧衣服兜卖的。我看见有苹果，顺便问一声，回道：“二十毛钱！”

(俄国小银元，值中币一元。新政府还没发新币。)我道是一斤，他说：“二十毛钱一个呵!”我就不敢买了。

赤塔上乌金斯克(Werhne Udinsk)一带，从一九一七年革命以来，常常闹乱子，有钱的人——资产阶级——都已逃走了。军事时代中，经济上向例是起恐慌的，何况几次三番的这样乱呢。我们到时，正值乱事刚刚平静，还没恢复，黄昏时分静悄悄的街上，只偶然见一盏两盏电灯，寒气侵入，脚下尽是冰雪，飕飕的风声，越显得市面的萧条。我们同到赤塔一戏院去看戏。这里却又是资产阶级的遗产，完全的文明化，不过规模小些罢了。休息室里雪亮的电灯，门口站着守卫的红兵。男男女女围着室内散步簪花，一样有穿得很讲究的。我随便和同伴赤塔副领事葆毅——俄文馆的同学——谈起资产阶级在革命后所受影响，他道：“也不过如此。”——忽然他的思想一变，对我说道：“我劝你不要到莫斯科去……”却不回答我的问题。他同着的一个俄国女郎说道：“可怕得很！可怕得很！莫斯科去么？……”女郎披着紫狐披肩耸耸肩，慌慌张张的。……看完戏出来，那女郎又对我说，他家有一所房子，现在一大半充公了，自己只留四五间住的，其余尽让新来官员住，还有工人，……弄得一塌糊涂。我笑一笑也没回答。他又说：“这是赤塔布尔塞维克初来的光景，以后还不知怎样。莫斯科更不必说了。”资产阶级的心理，生来如此。

可是赤塔这个地方本不是工业区域，而是西伯利亚农业国的市镇而已。所以那地方土著的资产阶级很少，大多数只是“农业的”小资产阶级，外来的如中国人等，也是私人商业经济，小买卖小手艺等等。我在哈尔滨认得

一俄国人，他在我临动身时给我一封介绍信，并托我带东西到赤塔亲戚处去。我因此在这家人家见着西伯利亚居民生活之一斑。

赤塔北郭已在山腰。松林寂寂，垂着银幕，铺着银毡，山气清新，丝毫城市文明的浊气，都已洗濯净净。我找着这家人家，走进栅门，就是一大院落，院子里拴着牛马，旁边放着牛奶桶。房屋都是纯粹俄国式的“木屋”，又精致又朴实。到了里面，也有小小一间客厅，收拾得很干净。女主人看见我们是带信给他的，殷勤招待，还懂得几句法文，见我们俄国话说得不太熟，夹着俄法文问长问短：“……哈尔滨生活怎样？我们亲戚都好吗？”我们也随便和他谈谈赤塔的生活等。他说：“呵！赤塔么？生活比哈尔滨还要贵呢。糖也没有，茶也没有，几时你们中国才能运茶到我们这里来呢？以前这里茶也是很便宜的，面是本地出产，不用说了。现在面包贵得不成样子。离中国这样近，一斤茶都买不着。真正奇怪！你们还不知道呢，赤塔市面上钱没有。谢美诺夫在这里的时候，发了许多纸币，现在一个钱也不值，简直就是废纸。我这里还有一百几十万卢布呢。”说着就拿出一大包纸币给我们看，还送我们几张五百卢布一百卢布的。说着话，他的小孩子醒了，我们看他喂小孩子牛奶，——糖也没有，只用小匙子舀着一瓶预储糖水给那孩子。小孩子却尽噪着要吃糖呢。说着话已到傍晚，主人回来了，又说了许多感谢我们的话。请我们吃饭，那黑面包却还可口，我和宗武说：“到莫斯科要是有这样的面包吃，也就不差了。”当晚他家又来了一位亲戚，是伊尔库次克（Irkutsk）派来购买食粮的。那客人不断的骂布尔塞维

克，他本来是智识阶级。我们当晚回车，因不认得路，同那客人一路同走，又顺便问问他伊尔库次克的情形。据他说，那地方情形比赤塔坏得百倍。“唉！什么共产主义！布尔塞维克只会杀人。还有什么……”淡淡的月光拂着云影，映着寒雪，照见他智识阶级式的武断的头脑，——蓬松的头发胡须，油腻的颈项下，拖着破烂的领结，拥着乌黑的皮领，还点头摆脑咕噜着：“他们自己吃好的穿好的，还说是共产党……呢？”

赤塔新政府成立，多数党得握政权而宣言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一方面固然是缓和外交的冲突，对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为缓冲地，别一方面也是恰合于西伯利亚实际的经济生活——小资产阶级的农业国。于是通商问题所首先接触到的中国侨工会，却枉然费了一番惊惶；中国商人以为多数党一握权政，就要没收他们的货物，——那时恰巧又是赤塔政府行第一步整顿经济的计划，——令私人工商企业家呈报存货数目。固然不差，中国俄国两民族在赤塔有实际生活上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阶级性”也相仿佛，都不是工业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即有也很少很少。然而国家经济的总计划，——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共产党民主主义政府在相当范围内所当采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不得不侵及小资产阶级一部分的所谓“营业自由权”。我因这问题问及中国在赤塔的侨民问题，曾问过赤塔华侨联合会会长，看他的回答，就可见在西伯利亚华侨的生活，又可见小资产阶级适应实际经济生活要求的政治能力之限度了：

“赤塔有一华侨旅俄东部西伯利亚总联合会。在后贝



加尔省共有分会十二处，侨商总共有七万人，赤塔当地有四千多人。那时华侨的商务，屡经战争，已很凋敝；到满洲里的交通断绝已久，侨商所有货物，都是旧存的。如其再有半年，交通不能恢复，赤塔以及各地华人商铺都得倒闭。至于中国侨商，在此地的自己颇能维持秩序——据他这样说。以前捷克斯拉夫，谢美诺夫，日本人一直到现在的大多数党政府，无论那一种当权的人来，都和华侨会联络，信任他们。华侨会向来能自己组织巡防队之类的商团武装起来抵御红胡子。现在——就是我们在赤塔的时候——有些红胡子却冒充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有时竟相信他们，他们也就倚势妄为，处处和华侨会为难。然而无论如何，华侨会必定竭力维持‘国人’的利益。我们华侨会费尽心血，却还要听许多闲话，也真难说了……”——这却是的确的。我就听见许多穷苦的华侨，货物被赤塔政府依官价征收去了，官价一时发不出来，华侨会，赤塔中国领事又不肯认真帮他们办交涉，因此怨骂华侨会和领事。华侨会本身的组织本是代表“有”的阶级之利益的，“有”得愈多，愈能被选为会上的职员，——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功能，也无足怪。所以当此赤塔政府下令调查呈报商货的时候，华侨会又和领事馆联合竭谋抗议，保护“他”一阶级的利益。华侨在赤塔很有经济上的势力，和当地的俄国人民利益相容，很倾向于共同对于新政府表示他的政治上外交上的能效呵。

到赤塔后，又是迟滞不进。领事往北京，莫斯科两方面所发电报，等来等去不得覆音。时时听欧俄危苦的

传言。车子一时没有前进的希望。于是我们三人中又发生改变计划的问题。在哈尔滨时亦因迟迟不行，想留哈研究俄文和共产主义，开春再定计划。到此听说赤塔亦可以找一私家(Pension)寄住，于是又发生这一计划。想在赤塔住下，研究远东共和国的政体及共产主义，俄文俄语也可以有练习的机会，这是我和宗武两人的办法。至于颂华呢，他不习俄文，就想回国。此行沿途都有阻滞，也真焦闷。幸而后来机会好，不然，目的地恐怕就此走不到了。

在此等待期间，除为社会生活调查之外，也曾访问远东政府的要人谈话。最初我们在远东电信通信社遇见一波兰兵官，他稍懂得几句英文。彼此谈起来也很有趣。有一天我们在远东电信通信社谈着，和通信社里几位记者说起中东路，他们说，我们最好见一见交通总长。波兰人欣欣然的说道：“我介绍你们去……”

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Chatoff)的办公室，空堂堂的一间屋子，疏疏朗朗排着几张椅子。波兰人不脱帽子大氅，拖着泥腿的烂靴，一闯一闯的就进去了。他坐下，就伸手拿沙都夫桌子上的烟，说声：“Mojeno?”(可以么?)就抽起来了。我和颂华两人就和沙都夫谈话。沙氏能说英国话，盛气凌人的说：“请发问罢!”我们申述来意并说关于中东路问题，哈尔滨工党联合会会长也屡次和我们谈及，我们表同情于革命的俄国劳动人民，总算还能代表他们正当的利益，在中国舆论界上说几句话，此来经过赤塔，——还要到莫斯科去呢，——愿意知道知道远东新政府对于中国中东路的政策。他听说着，“总长”的气焰渐渐低下去，才和和气气的和颂华说：“中东

路，赤塔政府决定主张以条约的形式归还中国，中俄有密切的邦交，必须协力抵抗日本的帝国主义，中东路一旦落于日人之手，大非远东各小弱国之福……。”我们辞别出来，第二天又由波兰人介绍见食粮部总长葛洛史孟(Grosman)。葛氏很直率，有诚意，和我们解释新政府在食粮上的社会政策：“俄国认中国为全世界最亲密的友邦，愿意和中国为同盟国，——远东共和国尤甚，——竭诚希望和中国通商，不过俄国因为久受封锁，货物甚少，容易发生投机商业，所以不得不以食粮等营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凡是商人都必须呈报存货的数量，并受政府监督卖价，中国商人如能遵守这两条件，尽可自由营业。就是日本，亦可以和他通商，只要他抛弃侵略政策。商业之必须受政府监督，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远东国体本是民主共和国。不过投机商人私藏货物，市面上缺乏的时候，再高价出售，贫苦的劳动人民，就要受饿……”葛氏一面和我们谈话，一面办公事，忙碌得不堪。我们同着波兰人出来，波兰人扬扬得意说道：“你看！我们这里非常之自由平等，‘我要见总长就见总长’，可不是么！……”

当时远东共和国新成立，国民议宪大会方在召集，暂时只算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克腊斯诺史赤夸夫(Krasnochtchekoff)兼国务总理。我们到赤塔已两次求见，他正有病，不能会客。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方是新年，忽有外交部部员传信给我们，说总理请见。当天晚上，我们到他家里——就在外交部。融融的灯光，映着丝罗的帷幕，穿过客厅，转入卧室，迎面来一晚装轻盈的少妇，——克氏的夫人，说着很纯熟的英语，和我

们说，克氏有病，请勿过于多谈，恐怕他劳神。我们进卧室之后，见克氏躺在卧榻，很魁梧的体干，刚直的面貌，不像俄国人，却大有美国人的风度。我们问他的问题，早已交给他秘书。他虽觉精神不十分振作，却一一回答我们的问题，丝毫不赘：——最主要的意思是：“远东政府，虽有共产党在内，然依本国经济组织，决采共和民主政体，不日召集国会——‘国民立法大会’——着手于新国家之建设事业，远东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是一协约的同盟国，一切自主，唯外交得与莫斯科政府协商。对于中国，竭诚希望缔结密切的友谊的条约……”其余无关紧要，已有颂华的通信，此地再多谈，也无意味。克氏谈吐非常之诚恳，说到意思重要的地方，虽言语喘急，还尽以英俄文重复再四解释。时候已是九十点钟，我们道谢告辞出来。秘书对我们说，他们的国民立法大会，是采普选制的，凡十八岁以上的男女，不论财产的多寡，都有选举权，这次选举，共产党很有把握。……

“社会生活切近的感受，再比之于‘外交式’的考察，使我得一结论：如其仅仅为政治外交上的交涉，大关节目的考察，或是有了‘抽象名词爱’的社会调查家，那么，就是重要人物谈话，参观，访问也就足够足够了，——况且这是‘新闻记者’的责任；假使除此之外，还想为实质社会生活的了解，要了解人类文化意义之切实隐掩的深处，以至于人生的价值，个人与社会间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结构，那就不如以一无资格的‘人’，浸入于所要考察的社会里，一方面又得于考察时，提出自己的观点，置之于可能的最高限度的客观地位上，然后所得才能满足自己的希望，——宁可比较的不完全些，

不广泛些。”——所以我决定从此多留意于我自己冥求人生问题答案的目的，至于“新闻记者”的责任，只能在可能的——我的精力限度以内略略尽一些罢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赤塔后，一晃又是十多天，虽则我们一方面为社会生活的调查，一方面做新闻记者“官样的”事务，足以安慰我的“失业苦”，然而我们同领事同行，同住在一车上，谈及中俄外交，所聆诸位领事的清教，又是“纯粹的中国式答案”：一面说得太抽象的，无着落的结论——“贫”“廉”，“爱国”“卖国”，这公使是“好人”“坏人”；一面又说得太具体的，无原则的事实——“俄国人不请吃饭，看不起他，”“俄国不信他的话，什么什么事不和他表同意。”不能回答我，中国外交界方面在某一时期，处什么地位，取什么态度。（譬如说：克伦斯基政府时，中国公使是中立，还是承认？）亦不能回答我，中国外交方面对俄革命有什么具体的意见，留俄华侨当如何处置。（譬如说：陈领事去莫，将行使何种职务，负何等外交上的责任？）亦许他们掩藏，而实在他们自己也不懂。同时，日常一处起居，无谓的应酬话：“我在北京那天打麻雀输多少多少……”等，——这是我所谓中国式的实际社会生活，——因为彼此渐渐亲狎，也就得费许多宝贵的光阴去听他。可是就中却知道了中国外交界几件逸事——笑话！

陈广平领事在哈尔滨时，预先付印留俄华侨的护照。那一天护照印好了，印刷局的人送来，陈某赶紧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把他收起来，锁好，又打开，打开又锁上。到了晚上，陈某又把箱子打开，翻看护照，忽然拿着一张，一掀一掀的给刘守清看，说

道：“到了莫斯科，这就是钞票呵！……”护照费的意义原来如此。我现在想象，他说这话时的笑容，还俨然如在目前呢。

那时的赤塔管尚平领事，以前在伊尔库次克领馆里，因为和馆员分护照费不均匀，相打起来，因此撤差。现在在赤塔和商会（华侨会）倒还合得拢。反正赤塔亦没有别国领事，尽他一人，和远东搅罢。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和我谈话，灰白色的头发，皮笑肉不笑的脸，打着无锡调的官话，和我这常州人谈话呢：“赤塔这样乱，幸而好，侨商一毫没受损失……幸而好，……哈哈！”唉！官僚！官僚！

这种绝对两个世界的人，——无经验的青年和陈死人的官僚，——相处在一起，日日谈些面是心非的话，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很大，却还可以借此一窥中国旧生活的内幕。赤塔的生涯也便如此。寒风凛冽，西伯利亚的色彩已鲜明了；“民主共和的”中国的代表，亦决定日期起程前去，叩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俄国的大门了。一九二〇年完了；一九二一年开始了。赤塔车站上鲜明的中国国旗，时时映照“民主共产”的远东之穷苦国民的颜色，他们寒颤颤拥着泥烂敝裘，挽着筐子篮子，对着“银烛”高烧的中国专车，闻着“朱门”的酒肉臭呢。“中国人过年了。”在这时却还要些点缀，赤塔领事馆和莫斯科领事循例道贺。这还不算。“中国的”消遣品——麻雀牌，牌九之类——非得请出来“以光佳节”不可！于是我更落于精神的监狱里：一面不得不应酬应酬他们，一面心上挂念着种种须整理的材料。

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我们许多书籍杂志，我在他们

赌博的余暇中，勉强翻阅翻阅。所得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如第三国际之杂志《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史》等，披阅一过，才稍稍知道俄共产党的理论。新年过了，一月四日，启程的诸事停妥，又开车西进。一切停滞的计划都打消，安心向目的地进行罢。哈尔滨得空气，满洲里得事实，赤塔得理论，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

### 三、西伯利亚掠影

阴沉的天色，几万里西伯利亚的广原，蒙着沉寂冷酷的雪影，寒意浸浸，天柱地轴都将冻绝。“冷酷”“严肃”的天然隐隐限制生活之迫促，虽令人失冥幻想象的乌托邦乐及优游余暇的清福，却能消灭“抽象名词爱”的妄想的所谓智识劳动的奢侈毒。宇宙的本质结晶于假设的现实世界，——生活的意义只有两端：在此现实世界内的世间生活，与超此现实世界上的出世间生活。如其无能力超脱一切，就只能限制于“现实”之内，第六识（意识）的理解所不能及之境界，却为最浅薄最普通的“现实感觉”所了然不误的。显现生活的情感（空气 atmosphere），虽不与人以切实的了解，却也不生意识上的错觉。传达思想的文辞（理论），表示情况的名物（事实），却都只能与人以笼统抽象的概念，不见现实生活是绝对不能明白了解的，而且常常淆乱人的思断。人类表示思想，传达事物的言语文字本来只能在某一限度内抽

出一相对合于“现实”的概念，因此思想的本身也受这“惰性化”的影响，只凭主观概念中的理解去思索论断现实生活。——于是往往使现实生活堕于抽象的恶化。“当使现实了然显现，以立真理之世间的一方面，必须令理论的文辞，事实的名物服从于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因得自此映现的情感之助，而能驾驭得住文辞中的理论及事实之抽象性。”身离赤塔，不日入“赤国”，我实行责任之期已近，自然当立此原则。从此于理论之研究，事实之探访外，当切实领略社会心理反映的空气，感受社会组织显现的现实生活，应我心理之内的要求，更将于后二者多求出世间的营养。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寒风猎猎，万里积雪，臭肉干糠，猪狗饲料，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现在已到门庭，请举步入室登堂罢。

寒气浸浸的车舱里，拥着厚被，躺在车椅上，闭眼静听，澎湃的轮机声，怒号的风雪声，好一似千军万马奔腾猛进，显现宇宙活力的壮勇，心灵中起无限的想象，无限的震荡；一东方古文化国的稚儿，进西欧新旧文化，希腊希伯来文化，剧斗刚到短兵相接军机迫切的战场里去了：炸爆洪声，震天动地，枪林弹雨，硫烟迷闷的新环境，立刻便震惊了“东方稚儿”安恬静寂的“伪梦”。——新文化的参谋处，一面要定攻击西欧旧文化之战略，一面要行扑灭东欧半封建文化遗毒的抗拒战斗力之计划。正是军书旁午千钧一发的时机，何况战略的玄妙在于敌人反抗力之利用，新建筑的构成在于安顿基础



之苦功，请看他所负责任的重大——全人类新文化的建设！他所为工作的艰苦——数十重“文化落后障碍物”的排除！无怪搏斗所用的力量如此之重，战争过程活现得如此之剧烈。“东方稚儿”！你只待春梦初醒，冷眼相觑，那战线渐渐展开，炮弹远度之所及，不由得你不卷入漩涡呵！

四日离赤塔，当晚到上乌金斯克。睡梦之中，听见上乌金斯克华侨商会会员上车来见总领事，诉说那地方红胡子哄着俄国多数党反对商会，派兵搜查，诬蔑商会会长，剥去上下衣勒索，要求总领事办理。他们絮絮叨叨咕噜着，那实实在在在中国北方人的笨声音诉说个不了。——这件事后来不知道怎样结果。五日深夜到色楞河边，远东及苏维埃俄交界的地方。到此一带真是黑暗阴幽的所在。现在在政治地理上是民主的远东国与苏维埃的俄国交界之地；文化上是东西杂色的俄国积极殖民地文化，与北方中原的中国消极殖民地文化融会之处。经连年战乱，刚刚平定，奄奄一息，正如久病之后，勉强得一点生机，元气亏耗，病根还没有全去，未来的命运恰在当地劳动人民之手呵。“查票了！护照，护照！”寒梦惊醒，黯黯的烛影，寂寂的风声，车已停住，听着窗外轻轻的一阵一阵雪花簌簌的飞转。人声嘈杂，车上的人都检护照。我出来把护照验过，深夜寒甚，又复睡下。听着隔舱人声，似乎查票的没有走。朦胧睡梦中，只偶然听到断断续续的谈话：“这是什么？有 Cognac（白兰地）！”——听着一人答道：“有便怎么样！这是外交人员的特权……你想……我不……”这确像是中国人说俄国话的声音。接着极粗笨的俄国人声音，声浪很重，可是

语音模糊：“……你们中国……没有；我怎么没见上面来电……本来不能放……”——“怎么样？”寂然半晌，语声不可辨。忽听又一个俄人的声音：“我们打电到伊尔库次克……走罢！……那边自有办法。……”天色渐渐明亮，车又开了。

六日清早醒来，已到美索瓦站（Mezovaya）。极望一片雪色，浩无边际，道旁疏疏落落几株槎杈的古树带着雪影，绝好一幅王石谷<sup>①</sup>的《江干七树图》。车进站后停下，就有三个中国人上来求见总领事，说他们许多苦状。美索瓦是苏维埃俄东方边境第一站，到此当换车头，原有车头要退回远东，所以车停足有四五点钟。因此那三个中国人要求总领事接见当地全体侨工。总领事极力安慰，说“不好太费事”。我们顺便和那三人谈谈。美索瓦有中国侨工二百多人，大概都是做苦工的。他们说着，颜色凄然：“……不能回去，有什么法想呢！……一个月我们现在得了三十斤黑面包，只够半个月吃。大家都得做活，不做活的呢，更坏！‘登’上大狱。要到别处去也很难……”

车停在站南头等着开发。我们在车里吃饭，旁边走过去好几辆运兵的车，一个一个，穿着褴褛不堪的兵衣，顶着油腻污秽的皮帽，都伸长着颈项看中国专车里的白米饭，牛肉，白菜呢。过了一会，一辆车停住在我们车窗前面，就有几个兵向我们车窗里做手势要香烟吃，我们给了他们几支，千谢万谢着去了。

我们的车原是因为误了趟，远东交通总长沙都夫特

---

① 清初画家。

派一单车头送过来的。车手得到了美索瓦站站长另派车头引车西去的消息，他就上车来道别，回赤塔去，要几支烟。他说：“可怕可怕……生活真难呵！我一个月薪水七百元苏维埃卢布，买一盒洋火倒要二百元。……”

“赤色”的火车头来带着我们的车进苏维埃的新俄了。七日一清早，朦胧睡梦初醒，猛看见窗外一色苍白，天地冻绝，已到贝加尔湖边。蜿蜒转折的长车沿着湖边经四十多个山洞，拂掠雪枝，映漾冰影，如飞似掠的震颤西伯利亚原人生活中之静止宇宙，显一显“文明”的威权。远望对岸依稀凄迷，不辨是山是云，只见寒浸浸的云气一片凄清颜色，低徊起伏，又似屹然不动，冷然无尽。近湖边的冰浪，好似嶙岩奇石突兀相向，——不知几时的怒风，引着“自由”的波涛勃然兴起，倏然一阵严肃冷酷的寒意，使他就此冻住，兴风作浪的恶技已穷，——却还保持他残狠刚愎倔强的丑态。离湖边稍远，剩着一片一片水晶的地毡，澈映天地，这已是平铺推展的浪纹，随着自然的波动，正要遂他的“远志”，求最后的安顿，不意不仁的天然束缚他的开展，强结成这静止的美意，偶然为他人放灿烂突现的光彩。凄清的寒水，映漾着墨云细雪，时时起无聊畏缩的波动，还混着僵硬琐碎的冰花，他阵阵的绉痕，现于冷酷凄凉的面，对着四围僵死冻绝的乡亲，努力表示那伟大广博的“大”湖所仅存的一点生意：“呵！不仁的‘寒’神震怒，荡漾狂澜几乎全成僵绝的死鬼，所剩我这‘中心’一毫活泼的动机，在此静候春风；和煦的暖意，不知甚时才肯惠临？……”

## 第二章 到俄国去 / 71

七日下午三时车到伊尔库次克，站长命令教把中国专车摘下来，停在车站尽头。随即上来了几个人，口称得到边境来电，中国专车带有秘密文件，须得扣留检验，扰扰半天，查不出什么东西来，刘守清又骂了他们一顿，才算偃旗息鼓的下去了。那副领事刘守清气狠狠坐下说道：“他们现在那里来这许多犹太人，真个缠得很！这还不是那天要白兰地没要着的小子弄的鬼么？今天一闹又闹晚了。明天非得去找当地的外交当局不可。……”我听了才想起那天晚上听见的谈话，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在内呢。车离车站足有四分之一里远，我只听得他们来来往往的上车站打电话。到晚上十二点钟才听说，电话打通了，那边认错，答应好好接待。一有通车，就可以挂车前进，只待明天当面再谈一谈罢了。……大家的疑虑才烟消云散。

冷清清漫天的雪色，镇着死神似的沉寂，清早的严寒，掩没了点微的晨光，云影滞凝，死也不愿开展，反令人觉着死沉沉的暮气。只有那疏疏密密的枯枝，时时战颤，忍着百般痛心切骨的苦恼，静待遥远未来的春意呢；偶然残酷的北风拂拭簌簌的雪响，好似力尽声嘶，耐不住疼痛，突然漏出一些畏怯的呻吟。车站外长河已经冰冻着一半，架着木板的码头，满盖着冰雪。从此桥渡河进伊尔库次克城，——走尽桥端，上“苏维埃渡船”，一只小小的火轮，也已征收公用，不费渡钱，可是不但桥上冰滑，再三再四几乎滑下冰里，就是船上也是污泥痰秽，烟气迷闷。站出船头，宁任寒战风侵，也比闷闷的站在舱里好些。回看阴阴凄凉的天色，近车站高岗上的树影，还远远的含笑点头致意呢。我同刘守清渡

河，经此二十分钟就到“彼岸”。刘君想找西伯利亚外交委员，我也得去验一验我们来俄的种种文件，——得知道知道他们招待的态度。上岸之后，只见荒凉的街市，一片雪影，足迹都非常之少，可怜的店铺掩着双扉，从外面看去，好像都是没人住的。沿着道旁慢慢的走，偶然遇着行人，问一问街道，大概都不能清楚回答，走得精疲力尽，想找一辆马车，也找不着。转过三四个弯，远远一条长街只看见三四个人，蹒跚着，缩头缩颈歪斜着走；却有一辆冰橇停在路旁，我们赶紧去问一问，要的价钱贵得可怕，不能坐，又往前走。好不容易问着一人同到外交委员家里。我们一进院子，看见一女郎穿得很整齐华丽（那一天是希腊教耶稣降生节），自己捧着木柴拿斧子在那里劈呢，院子东角上两间小屋前站着两个人，远远的看不清楚。忽然听着中国话的声音，抬头一看，那两人已经走近，原来是中国人。我们正在谈话，听得那女郎高声叫道：“华西里（中国人的俄国名字），唉！帮一帮我，Radi Boga！（意为‘看上帝面上’——俄国俗语）”那中国人就去帮他劈柴；还剩一个，拚命的拖我们到他屋子里去，他媳妇也是俄国人，出来见我们，彼此问长问短。他们同外交委员住一院子里；外交委员住“上房”，他们住“下房”。那天外交委员不在家，只得留话便走出来，同着那中国人，找到留伊的副领事薛君处。

现在已经进了饿乡了。饿乡的滋味却还没尝着。可是，在伊尔库次克，赤军刚刚占领不到半年，兵燹之后，余烬还没全熄，一切建设都还在草草初创，或者一毫都没动手呢。那地经济状况，在那时为全国最窘急的地方。我们在薛君处第一次吃看“苏维埃的黑面包”，其苦其酸，

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的，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可是那天席间还有些鸡鱼。据他们说，布尔塞维克来了之后，商业一概禁止，这是乡下有熟人偷买上来的。我们因问起工人职员（官吏）的生活，据说口粮分好几等：从每月十五斤（俄一斤抵中国一斤之四分之三）到每月四十五斤黑面包。薪水最多的不过八千卢布，依那时卢布的行市只抵到中国的八角钱。吃完了饭之后，觉着身体轻松了好些，冷风里跑了三四个钟头，得在软椅上躺着，又饱又暖，听着桌上“自暖壶”细细的私语，随意谈话，听来都感新奇的奇闻，这也是饥寒之国的一瞬间的乐趣。薛君所住的房屋，还有一工程师及一中国医生；电灯房费都很便宜，房子是后来简直完全免费了。他们介绍我见那工程师，走进屋子，只见烟沉沉的依稀映着一老瘦的人面。旁边还坐着他几个亲戚——女人，工程师恭恭敬敬的请我们坐，我心上想：今天第一天进赤色的苏维埃俄国的城市——饿乡，怎样不知他们主张“饿”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观，因问工程师是不是共产党。工程师放下烟斗，破壳的喉咙里发出嘲笑的声音，而又带着愁惨的声调，说道：“我？共产党！咦！……”旁边有人插嘴，指着一女郎道：“他是共产党。”我就回身问他共产党的党纲；并看他脸上涂指抹粉的，很可笑的形容。那女郎愣着，只是笑，勉强说着一两个字，又顿着不说，似乎害羞不好意思。……工程师抢着说：“党纲好极了！好极了！可惜梦想，幻想；枪，监狱，监狱……”老工程师在铁道局办事，屡次怠工，唾骂布尔塞维克，下狱三四次，依旧如此，劳农政府没有技师，也只能听他。他又说：“乡下人的鸡鱼鸭肉一概都行集权制，

74

4

中国人有二千多，新尼各拉叶斯克有四五百，做工还好，不做工的很苦，也只得偷做些生意。华工会发的护照勉强可以保护工人，可是非钱不行。我听着有无限的感触：极目荒凉，黯黯的夕阳，投着散乱的人影，寒气浸浸，回头一看，已经满身都是霜了。

在伊尔库次克时外交委员答应打电到沃木斯克可以领些食物，到此交涉好久才出官价二千多卢布买了面包牛肉鸡子等。可是当天（十六日）晚上，车停在车站尽头，我们货车上的锁被人扭断，偷去面十铺德，陈广平咆哮大怒，噪了半天，也就无法可想了。

十天以来我的生活一发无味枯燥。西伯利亚快过完了。生活上的感想，只觉得全宇宙盖满了阴沉沉的肃气。我主观的人格抑郁到极处，应当豁然醒悟：请看恬静可爱的“俄国乡下人”百年来奋斗争取自由……到现在不容他口口声声否认，不得不承认外围的社会力。梦想！幻想！离社会求个性，个性在什么地方呢！

社会是整个的具体的，假使了解他，或者还嫌“社会”一字，抽象的名词为多事呢。西伯利亚中世纪的社会，半封建的经济组织，离共产主义有多远！俄国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力竟渐渐的侵犯蚕食他。我只见实际生活：俄皇政治，欧洲大战，国内战争，在宇宙的大海内涌起巨波，震荡西伯利亚的小舟。社会革命，俄国的社会革命，不是社会思想的狂澜，而是社会心理，——实际生活“心”的一方面，——及经济生活，——实际生活物的一方面，——和合而映成的蜃楼。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



“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西伯利亚旅行的教训，才使人知道大谬不然。

“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是极粗的现象。”西伯利亚的人民在严厉的教师之下，自然的学习呵。

主观的我在客观的物之中，何容你呖语连篇的求解放呢。

## 四、到达莫斯科

十天以来，伊尔库次克暮霭沉沉中的晚钟，沃木斯克追赃查贼时的骂呖，沿途褴褛瑟缩的人影，车行风掠雪碾的厉声，中古神教威权的想象，现代国际公法的痴念，远东泰西西伯利亚人文的混合，帝国主义狂暴之下的呻吟，人类文化热病之中的喘息，——一切一切融和会杂复映而成我的心灵之印象。亲亲热热抱着这一印象来到“现代的文明的”欧洲之遥远荒僻，“现代性”(contemporanéité)色彩还很淡很淡的边境，——十八日离沃木斯克，二十日到都明站(Tiumen)，欧亚的交界。当晚到嘉德琳堡(Catherinburg)，那地矿产非常之丰富，宽洪大量的“天然”，含笑看着：人类因“家事”扰攘，蜗角牛斗，还竟没闲暇去聘请他(“天然”)以奏天下太平的盛乐呢。依稀恍惚的幻想，伴着震荡飞掠的旅梦，掩

## 第二章 到俄国去 / 77

没在寒衾里，二十一日清早醒来已在乌拉岭（Ural）上郭同站（Kordon）。白雪四山掩抑那丰富的“天然”，不见无产阶级实业家的轮椎，却只见诗人呼啸清新的美意。

长林迴密，随着高低转折的峰峦，蜿蜒漫衍，努力显现伟大雄厚的气概；闪烁晶光的雪影映射着寒厉勇猛的初日，黯云掩抑徘徊时，却又不时微微的露出凄黯的神态；松杉的苍翠披着银铠晶甲的圣衣，固然明明轩昂有骄声，表示他克己能耐忍受强暴的涵量，倏然忽起狂吼的怒风，号召四山的响应，万树枝头都起暴动，簌簌的雪花不由的纷纷堕落，虽则越显得寒厉的“冬之残酷”，然而散见零星的翠色，好似美人的眉飞目舞，已确然见温情蜜意的“春之和畅”之先声。一干一枝拥着寒雪，只觉得冷凄凄的外围掩抑他的个性，渴望和润的幻想虽充满了他的内力，究不敌漫天盖地宇宙的伟力。等到万树长林，震荡巨波泛滥的风暴，才能群起蜂涌，摇曳飞动。其时虽得不着内力充分的发展，——本是盲然蠢动，何尝立刻得饮春风中的甘露，却也如巨潮澎湃，豁然不可复当，暗示天意的回转。何况他们占东半球大陆的领袖地位，据高临下，安镇乌拉岭崇峻的峰头，为大地之脊，上接飞舞的长云，下临寒澌的小流，暗示全世纪以宇宙伟大的动力呢。

长蛇蜿蜒的火车在乌拉岭上缓缓的游行，山色清新时时投入车窗，成飞掠转折翠白相间的画影。顺山麓西下的时候经一小站。在山凹密林的中间，当窗突然显现可爱的俄国乡村。琐居复凑的木屋，盖着一片白雪，中间矗立希腊教堂的塔影，铜顶的光彩闪烁不定，和四围万树的雪枝相语，只有午钟初动，传响山壑时，突然打

断他们密密相诉的情话。车窗外有一老人，掘着铁轨中的死雪，模糊的须影里露着忠诚朴实的面貌，披着破旧油腻皮氅，把着铁铲，勤勤恳恳的一铲一铲抛那雪块。笑嘻嘻手搀手飞跑来了两个小孩，约摸七八岁。老人似乎和他们说着几句话，一个小孩就拿起雪铲帮着铲雪，那一个两手捧着雪块搬运；大约有十几分钟，铲雪的放下铲子，从破口袋里掏出来一块黑面包，捧雪的忙忙的抛下雪块赶来要着半块面包；两个小孩相对着吃，笑嘻嘻的似乎谈什么事情；忽然捧雪的捡起一块雪掷去，掷在那铲雪的肩上，两个又扭在一块，相打起来；一个翻倒在地，一个往前就逃，翻倒的站起来就追；那时老人举起铲子，只看见他蓬松胡须的嘴唇乱动，似乎说着一大篇话似的，小孩子却头也不回。我正看得出神，忽然“嘟”的一声汽笛，车已动了，那老人和小孩都渐渐不能看见了，只有那老人体力工作时和蔼沉静怡然自乐的笑容和小孩子活泼天真的神态，还在我心里留一印象。

二十二日晚下乌拉岭西麓。经小站，有一俄国村妇携着一筐鸡子要换食盐，——我们带的盐却很少——只得出三万苏维埃卢布买了他一百枚。问他为什么不愿意要钱，他说：“这样的布尔塞维克的钱有什么用处，反正什么也买不着，只有外国人带点‘product’<sup>1)</sup>来就换些用用。盐呢，糖呢，布呢，少得很呵，那……那花花绿绿的纸票，干什么！我们自己也是拿东西换东西，‘上面’还不准呢。”从此往西，每站都稍须有些东西买，只算是偷做的生意。伊尔库次克到乌拉岭，沿路火车站上

---

1) 意为产品。

是绝对没有小买卖。到此才见物物交换的原人经济。此后共产党改变经济政策，三年来喘息方定，才着手于经济改造，经济组织因工商业的恢复，或者渐渐的进步到现代的文明，建筑起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这已是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的话。）那时呢，还只见一般可怜的“偷做生意者”呵。二十三日晨，经维阿德嘉（Viatka），二十四日到复洛葛达（Vologda）。愈往西愈近俄国的工业区，已出中世纪而进现代，所以西来渐渐觉着有生意，车站上往来的行人也穿着得比较好些，整齐些，不像东西伯利亚的穷窘形状了。简单的物质文明的进步观念，原来在人类文化上有很大的意义的。“克己复礼”爱人如己的废除私有制，唯心的社会主义，究竟只侥幸他身家好，受祖父几世的教育文化，铸成这样社会主义家的慈善心肠，那知就这点教育文化也是唯物的经济组织中剥削劳动而得来的呢。只有这一带新俄罗斯居民，因经济组织的落后，虽政权入了共产党之手，何尝就能全无私有观念的人呢。不仅如此，这一区（欧俄东部）入苏维埃版图，还在十月革命一年及一年半之后。风起潮涌的自由战激励他们驱逐地主，打破封建遗毒的偶像。等到农民得胜，初赖共产党的指挥操纵，分到了土地，小资产阶级心理发现，屡次为白党利用扰攘多时。实际生活的教训和社会心理的内力如此之显著呵。唯心的“社会主义试验家”，也只好干笑罢了。

复洛葛达离彼得城六百余俄里（一俄里抵中国二里），是北线（Sieverney ligne）的腰站，从此折往南四百七十俄里就到莫斯科。

车轮雷辘，鼓动热烈的声浪，血气奋张，含着不定

的希望，舞手蹈足似的前往，经俄国大河复尔嘉（Volga）<sup>①</sup>的上流，铁桥两面，望去已经隐约看得见两两三三的工厂的烟筒。二十五日早起，忙着整理什物，四十多天的火车生活快完了。天色清明，严肃的寒风，裹着拥锦的白云越发谨飭，宇宙含笑融容，都和煦我的心灵，使勿太沉寂。满目雪色长林，欣欣然迎我这万里羁客。苍苍的暮霭，渐渐地漫天掩地的下罩，东方故国送别的情意，涌出一丸冷月安慰我的回望。轮机轧轧，作谐和的震动，烟汽蓬勃喷涌，扑地成白云缭绕；夹着木柴火烬的飞舞，星星在长林墨影冻堤白雪上显现灿烂勇武的“红光”，飞掠的车龙更抛拂他们成万条宛转的金翼。沿铁道两旁，行近莫斯科郊外的地方，夹着两排疏疏密密的雪树，车行拂掠着万条枝影前进，偶尔掠过林木的缺处，就突然放出晶光雪亮的寒月，寒芒直射，扑入车窗，如此闪闪飞舞突进，渐近莫斯科。已经遥遥看见城中电光明处，黑影中约略还辨得出喘息稀微的工厂烟汽。几分钟后已到莫斯科雅洛斯拉夫站（Yaroslavsky Wokzal）。那时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晚十一时光景，太阴历的庚申年十二月十七。寒月当空，嘈杂的人声中，知道已到“饿乡”了。

赤国的都城也就是四世纪前俄罗斯莫斯科时代皇朝的旧宫。处于欧洲无产阶级“心海”的涛巅，涌着俄罗斯劳动者心血热浪，颠危震荡于资本主义风颶之中的孤岛已经三年有余了。“赤都”第一夕的心影，留一深切的印象，东方稚儿渐渐自觉他的内力，于人类文化交流之

---

① 今译伏尔加河。

中求一灯塔的动机已开，饿乡之“饿”如其不轧窒他的机括，前途大约就可以见平风静浪的海镜，只待于百忙之中，将就先镇定了原人时代海运的帆篷舵索，稳稳的去探奇险。

社会革命怒潮中的赤都只是俄劳动者社会心理的结晶。社会结构的幼稚，或者可以说现代人类文化的程度不过如此，群众心理的表现，大部分还只能如婴儿饥渴求饮的感觉。三年以来，奔腾澎湃的热浪在古旧黑暗的俄国内，劳动者的“生活突现”，就只在勇往直前强力怒发的攻击，具体的实现成就这一“现代的莫斯科”。他们心波的起伏就是新俄社会进化的史事，他们心海的涵量就是新俄社会组织的法式。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心理变迁再变迁，前进再前进，遥远的未来如果能允许俄国劳动者以胜利，也得先立条约：以他们在“实际生活学校”中的成绩作预支“胜利基金”的信用（credit）。

赤色的旗帜之下——新莫斯科——只能见很稀很少的唯心派社会主义试验法的痕迹。社会进化史是社会心理变迁的记录，就是只显露情感感觉流动的“阴影”；他不是社会思想，社会学说的学案，并无理性分别计较试验的公式图表，本来群众心理还非如个人心理之有理性意识（第六识）作用的表现。

## 五、工作开始

白雪的沉影下，盖着六层的大楼，一面遥对克莱摩

(Kremlin) 皇宫<sup>1</sup> 的殿阙，一面俯接帝国大剧院院顶上雄伟的铜马，这是旧时莫斯科最大的旅馆，现时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四层楼上，一间办公室，窗帘华丽而破旧，稀微的雪影时时投射进来；和软的沙发，华美的桌椅时时偶然沾着年久的尘埃，欣欣然的欢迎远客；打字机声滴滴嗒嗒不停，套鞋沾着泥雪在光滑可爱的地板上时时作响；办事员都裹在破旧的皮大氅里手不停挥的签字画押，忙忙碌碌往来送稿；兴兴勃勃热闹的景象中，只有大病初愈的暖汽管，好一似血脉尚未流通，时时偷着放出冰凉的冷气，微微的暗笑呢。这就是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司长杨松(yason) 的办公处。杨松微微含笑对着远来的新客道：“我们这里怎么样！……可是很冷呵、你瞧我穿着皮大氅办公呢。……中国的劳动人民自然是对我们表很亲密的厚意，可惜协约国封锁以来，谣言四布，他们未必得知此地的实情，或多误会。诸位到此，正可为正直的中国人民一开耳目，为中俄互相了解的先声。我们能不竭诚欢迎吗！不过我们处于极窘急的经济状况，一切招待有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原谅。……”

到莫斯科的第三天就得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给的“膳票”，并且派一人同往外交委员会的公共食堂。饭菜恶劣，比较起来，在现时的俄国还算是上上等的，有些牛油，白糖。同吃饭的大半都是外交委员会的职员。我看他们吃完之后各自包着面包油糖回去，因问一同同行的人。他说俄国现在什么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每人除办

1 今译克里姆林宫。

事而得口粮外，没处找东西吃用，所以如此。“譬如你们这种‘双喜’烟，我已经一年多没抽到这样好的烟了。……你们通信，可不要写俄国的坏处呀……哼哼……”他忽然低声的问道：“你们有鸦片烟吗？”……“怎么！竟没有！……我听说此地的中国人常常有抽的……”公共食堂是以前的旅馆，外交委员会职员大半都住在里面，却是很方便的。过不到几天（二月二日）外交委员会就派汽车送我们到一公寓。这公寓亦是旧时的旅馆“Knyaji Dvor”<sup>1</sup>。我们三人占了两间屋子。桌椅床铺电灯都很完全，草草收拾整理停妥，房间汽炉烧得暖暖的，吃饭在公寓里有饭堂。饱食暖居，凭窗闲望，金灿灿辉煌的大教堂基督寺的铜顶投影入目，四围琐琐的小树林，盖着寒雪，静沉沉的稳睡呢。这种物质生活的条件，虽然饮食营养太坏，亦满可以安心工作了。我想一切方便，都赖旧时旅馆的结构处置，公共居住公共消费，也可见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打得一好基础呵。可惜三四个月之后，劳农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食粮停发，饮食的方便，在我们公寓里，因此就消灭了。——这是后话。

东方稚儿已到饿乡了。回看东方的同胞在此究竟“如何”。我们到莫斯科十天之后，就刚值全俄华工大会。会中从俄国各地到的代表约有近二百人。所代表的人数尽在欧俄的总有四万多。他们有从法国德国欧战时逃回国没成而流落此地的，有向来在俄经商作工的。现在呢，工作的物质生活条件很窘，往往迫得营私舞弊。一百多代表中“识字知书”的很少，可是穿着倒还不错，——

1 即“贵族宫”



真可佩服的中国人的“天才”！然而他们听说我们来了，异常之高兴欢迎。长久不听见中国国内的消息，他们也正如渴得饮。我们随便谈谈国内的学潮，却也只激出几句爱国的论调。陈领事不敢出席，——不知因为什么，——各代表都不满意。会议中的要案，因为当时还禁止经商，大家都想回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回国问题”。——结果都推在领事身上。至于其余的组织问题，乱七八糟，不用说自然是中国式的组织！大会之中我因此得认识些中国侨工，后来也常往来。只可怜饿乡里的同胞未必认所居地为饿乡呵。

饿乡！饿乡！你还是磨炼我的心志，还是亏蚀我的精力呢？工作开始了，看着罢。

我们的工作条件是不很困难的。杨松介绍我们许多地方，可以搜集材料，访问要人。第一就见着俄罗斯共产党机关报《正道》(Pravda)<sup>①</sup>的主笔美史赤略夸夫(Mechtcheryakoff)。他指示我们参观的手续，一切种种，从他开始。同时东方司还派一翻译郭质生，他懂中国话，生长在中国，所以有中国名字，虽然他不能译得很好，我们也另有英文翻译，亦是外交委员会派来的，自己又可以说几句俄文，本来用不着他，然而后来我同郭质生竟成了终生的知己，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革命中的奇闻逸事，实际生活中的革命过程。因此我们正式的考察调查从那天见美史赤略夸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调查也从那天见郭质生起。

---

① 今译《真理报》。

雄伟壮丽的建筑，静悄悄的画室，女郎三五携着纸笔聚在一处一处大幅画帧之下。——这是德理觉夸夫斯嘉画馆(Trityakovsk aygallereya)，我们在莫斯科第一次游览之处。那地方名画如山积，山水林树，置身其中，几疑世外。兵火革命之中，还闪着这一颗俄罗斯文化的明星。铁道毁坏，书报稀少，一切文明受不幸的摧折，于此环境之中，回忆那德理觉夸夫斯嘉(Pavel Mihailovith Trityakovsk ay, 1832—1898, 这画馆的首创者)的石像，还安安逸逸陈列在他死时病榻之处，正可想起“文化”的真价值。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社会之文化是社会精灵的结晶，社会之进化是社会心理的波动。感觉中的实际生活教训，几几乎与吾人以研究社会哲学的新方法。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 第三章 莫斯科见闻



### 一

克洛扑德金夫人前日来莫斯科，他学生纪务立，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职员，介绍我去见。夫人老态龙钟，听见远东的新闻记者都来吊克氏，非常之感动，表示许多欢忭的意思，——我并且送他一袋白面。纪务立当时问夫人什么时候回德美脱洛夫村<sup>①</sup>，他说明天就走，可是这一次身体不大舒服，恐怕不能步行到车站，况且还有许多东西，因叫纪务立一早去送他。夫人回答时还笑着说：“今天最高经济苏维埃会长一定要派自己的汽车来，我不肯要他们布尔塞维克的汽车，——汽车夫却说，这不是

---

① 今译季米特洛夫村。

他们布党的，这是我个人敬仰克氏，所以自愿来的。我回他说，他亦辛苦，感谢不胜。他才走了。”见了克氏夫人出来，纪务立对我说，这是真正的俄国贵族，王爵夫人而有这种克己复礼的精神。可是克氏的本性却非俄国的不务实际的智识阶级，他的主义亦不是俄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他的死后，墓前吊词中，竟有无政府党讥诮克氏太迷信科学了。

我回忆，我们到莫斯科开始工作时，第一件事就是克洛扑德金逝世。二月二日我们迁居于外交委员会公寓后，每天报载克氏的温度，派专车送医生到克氏那里去。等到九日已经听说克洛扑德金去世了。十二日我们到灵前参观，十三日一早去送殡，宗武忙忙的收拾照像器具，我们同着去。远远的就看见人山人海，各种旗帜招贴着。沿路有人发一张《克氏日报》，上面还载着许多吊文传志，并且还有克氏死后无政府团体通告全欧全俄全世界的无线电稿，列宁批准暂释在狱无政府党参预殡礼的命令。当日送殡的除种种色色无政府团体外，还有学生会，工人水手等联合会，艺术学会等；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少数派都有旗帜。最后是俄罗斯共产党，共产国际，还有赤军拿着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赤色国旗。无政府主义者手持旗帜，写着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其余各团体也都张着“克氏不朽”的旗。人山人海拥挤之中，我远望着克氏的灵柩抬出来，面色还蔼然含笑似的，——宗武正拿着照相机照呢，——猛听得震天动地的高呼“万岁”声。一时人丛中更挤得厉害，乱杂之中我只听得四方八面嘈杂的谈话和巡官的号令：“请诸位保持秩序，不要往上挤，……”“克氏科学上的功绩，道

德上的廉洁，真可不朽，虽然他不是……”“无政府主义大家殡礼，为什么要军队警察来参预？不用他们……”“唉，挤死了！”“哼……无政府主义，本来就是无秩序……”我好不容易挣扎着走出人丛，站在一旁，远远的见克氏的灵柩拥着黑魑魑一片人影，无数旗帜慢慢的往南去了。

林德 (Lind) 女士，克氏的亲戚，曾经和我谈及克氏临死时的逸话。克氏病重的时候，温度非常之高，乱梦热吃，每每不能安寝，生平非常之喜欢音乐，所以每每对林德女士说：“唉！我又看见许多埃及中国字的花花绿绿影子，似乎只想着书，要去看这些不懂得的字！请你弹琴解闷罢，省得我又乱梦颠倒。……”林德女士有一次拿一叫人钟到克氏床前去，克氏笑着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向来不发命令，用不着叫人钟，呵呵呵！……”

俄国无政府主义从十八世纪末年就和自由主义同时发生，至十九世纪七十年时代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即极盛。然而无政府主义的俄国性，东方文化性，在俄国社会思想朴实的农民之中比较的发展，俄国式的智识阶级尤其欢喜空谈的无政府主义。至于巴枯宁，克洛扑德金的科学的无政府主义，反而不为俄人所喜，而且比较的带有现代的国际的性质。克氏殡礼后一日，我曾遇一无政府主义者黑河 (Heiho)，他说现时克氏既死，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还有三派呢。

## 二

清霜薄日的早晨，冻得凝凝的云色，映着半新不旧的赤旗，时时招拂，荡漾着四周霜枝玉树间的晨光，——这就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会。门前穿着重裘的看门的让我们进去；沿着扶梯上去，墙壁上处处画有宣传图画，经过一个小客厅，里面却挂着“无产阶级文化之华”等标题，一个赫尔岑的铜像。招待员伊凡诺凡女士殷勤的请我们进去参观，送我们许多书报杂志。我们要求见委员长路纳察尔斯基。秘书文葛洛夫说，路氏明天就上彼得城，恐怕没有工夫见了。我们再四请文氏打电话到克莱摩宫去问，谁知一问居然立刻说：“请。”

我当日就同颂华、宗武准备好入宫券，同进克莱摩；经过两重卫卒，到宫里，巍然高大的城墙，古旧壮丽的建筑，令人神爽。宫城内地方廓大，有许多机关，人民委员大半都住在里面，我们问了一回，才有人指给我们：“那绿房子里，就是路纳察尔斯基住的。”我们进去。灰尘积滞扶拂，电灯有些破毁的，空空的一大间，疏疏朗朗排着几张极华美的锦椅，有一人迎面进来说：“等一等。”等了好半天，静悄悄的，似乎一个人也没有，那间屋子又不像是招待室，正在骇怪，东角的门一闪，露出一个人面，相片上看见过的路氏，招手请进。我们进办公室一看，排着好好的几张桌子，除路氏外，一个人影

都不见。路氏招待我们坐下之后，我们就拿出问题请教：最近教育上的设施和东方文化的意趣。路氏是一演说的艺术家，谈吐非常的风雅，又简截了当，总谈不过十分钟，而所答已很完满不漏。他面色灰白，似乎不大健康，所穿衣服非常朴素。他的谈话大约如下：“革命后我们即日促学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然而初行非常困难，因为教员教授之非共产党者——立宪民主党，甚至于还有更右于立宪民主党的——都以怠工反对政府；好容易设了种种方法，现在这种怠工总算消灭了。何况兵燹之后，物质条件也窘迫到极点呢。可是最近几年来学术上的发明也还不少，比如：X 光线，化学原子锂的成分，医学上癌病治疗法等。因此欧美各国对于俄国革命后学术文化上的进步，非常之引为有趣而大家想来研究。荷兰科学院曾经派过学生来。我们亦派学生到欧美留学，国内处于破坏状态，纸张印机都很缺乏，所以又设法在德国开了一俄文书籍印刷局。我们在文化上能尽力的地方都已尽到了，然而不敢自满，——实在战争与革命的破坏力非常之大，创造新文化也不是轻易的事，还得努力做去。至于我们共产党对于东方文化的意趣，倒是一个很有趣味的<sup>问题</sup>。第一，因为俄跨欧亚，和东方古文化素有接触，第二，革命之前俄境内各民族也是被压迫的，对于‘东方’极有同情。况且苏维埃俄国，不像其他欧美各国妄自尊大，蔑视东方，我们是对于东方民族极端平等看待，对于他的文化尤其有兴趣。现在极注意于促进两民族的互相了解，采用他的文化，已经设一东方学院。东方文化之‘古’，‘美’，‘伟大’，‘崇高’，诗文哲学，兴味浓郁。不过对于他的宗教性，我

们认为是已过去的东西，应当自然消灭的。”说完时，我看见有一女人捧着一小盘黑面包进来，还有好几个职员模样的坐在那边一张桌子旁等着，因此起身告辞，路氏握手道歉说：“可惜现在有一委员会要开会，我不能多谈了……”

过了两星期，教育人民委员会又派了汽车来，我们到好几处幼稚院、劳动学校去参观，规模虽然小，精神却很好，只是物质生活太苦些。今天到一林间学校，离莫斯科有二三十里，那地方空气清新，房舍清洁，专为有遗传病的儿童而设的，一切设备非常完美。小学生活泼之至，听见中国新闻记者来，大家唱歌跳舞的欢迎，拥着问话；有一学生，居然学会了写“中国瞿秋白”五字呢。

### 三

莫斯科生活开始，我们求学考察还正兴致勃勃，然而因物质生活的困苦，竟奄奄有些小恙。病中无聊，同寓一日本人新白介绍几个女友来谈，勉强解闷。一冬以来，足有四五个月，天天是凄清惨淡的天色，一片白漫漫的青影，到底使人烦闷，现在春天已经快来了，这四五月的“俄国生活”也当渐渐转出生意呵！莫斯科城市生活，经革命兵燹之后却很凄清，商铺都封闭着……病中无事，因与俄国友人闲谈，略略得知莫斯科城市生活，



并及全俄布尔塞维克革命后草创的设施。

欧洲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要算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革命，马克思亲与其事。公社大概的组织就是城市工人共同组织一消费社，分配一切需要品。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每一城市作为一共产社。又一友人告我，俄国现在无物不集中，消费者都以团体为单位，个人名义很难领到需用物品。全国集权行得很厉害。譬如莫斯科公社——市政工会之类，每月为莫斯科居民运取食粮，消费者凭劳动券领取，劳动券以工作高下为标准分好几等，每等可得若干，十日以前在《消费公报》登载。其余一切用品都有相当的机关。友人还说这种集中制在军事时代很有用处：没有一人没有一天能浪费物品或偷闲情息的，固然有许多弊病，然而这本是列宁所谓“军事的共产主义”，这是军事的共产社制度，在“国内战争”期内，他的必要，却有一定的程度。至于乡村间呢，贫苦农民多分得土地，生活还像私有者。

日本人新白是一飞行家，年纪正轻，风流倜傥，屡次想回国，都没成功，现在莫斯科飞行学院及参谋部学院东方部做事，所领口粮还不错。他说莫斯科生活很苦，参谋部学院有一英国妇人——英法文教员，家里失窃，穷得可怜呢，丈夫在战线，还因交通不便，虽停战亦不能北返。

## 四

教育人民委员会的职员刘白文纳女士送来好些书籍杂志，路纳察尔斯基的著作等，偶然有些白面包，我们请他喝茶，他吃了一个面包，又拿一个，很不好意思的说道：“我们两三年没有吃着这样的面包了，我想带一个回去给我母亲，他一定高兴得不了，……”我们赶紧答应，并且又送他两个，他很感谢。随后刘白文纳女士谈及家庭生活，颂华因问：“共产主义的家庭怎样？”他笑着说：“郭冷苔女士著书说家庭生活社会化——我们却还想不到这一层。”他走时又再三致谢，并因听说李宗武能唱中国戏，约着日子同到无产文化（Proletcult）的音乐会去。

无产阶级文化部——简称无产文化——是教育人民委员会所设的，一切图画音乐诗文戏剧的新作家都加入，凡有创作就大家详论研究。常开音乐或诗文晚会，有时自编戏剧以为工人娱乐。我们去时会员极端欢迎，宗武所唱汪调的《马前泼水》居然收入留声机。他们亦收着几张广东戏片。又给我们看一新式的意大利钢琴，可以不按自鸣，谱子从琴背插入，机括开时音调佳妙无比。说所奏乃日本女郎思夫之曲。音乐会会长问，日本调我们能懂不能，并且详详细细和我们讲那曲子的内容。——意大利一贵族游日本，娶了一日本女子，后来又在美国，竟忘日女，曲中所奏——大部分是日女怨泣之词。会长并

说，旧文化的音乐人才，革命中未免凋零，新的还很幼稚，然而假使物质生活不这样困苦，我们的工作还可以强几倍呢……

俄友纪务立介绍托尔斯泰孙女苏菲亚来谈。托氏派在各地曾有一“真自由之结合”，每星期六开会演讲，并有一杂志，现在为政府所禁——因为他们反对征兵太厉害。苏菲亚说，现有以前托氏在莫斯科的住宅——托氏死在其中——改为陈列馆，因约我们去参观并到他家里叙谈。

托尔斯泰陈列馆离我们寓所不远。馆中非常清洁整齐。苏菲亚指示讲解各种图画照相，并有一小画，为托氏亲笔所绘，画中有一小马一大人。苏菲亚说，这是他小时，祖父赏他的玩物。到托氏家后，苏菲亚母亲很亲热的接待我们，并送给我们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为《老子》的俄文节译本。

各种社会公共机关，——据苏菲亚母亲说——凡不是共产主义的，只要不带政治上的危险性质，如托尔斯泰陈列馆等，都不受什么妨碍，有时亦能稍得辅助。

## 五

夜深了。虽是俄国诗人的“五月天气”，晚寒还暗袭

行人的衣袂。莫城<sup>①</sup>稠密的街市，一时也稍沉寂，隐隐约约渐听着四处教堂的圣钟殷鸣——陡破夜神的深寂。巷口街梢，三三五五的人影渐现，一时多似一时。教堂钟声愈久愈多，愈晚愈洪，圣诗的歌声摇曳沉抑，萦绕天际。等到夜间一二时，教堂的圣阶前已聚着黑默默一大堆人，星星点点耀炫着信教徒手中的圣烛，画像的高门下排着神甫入庙的仪式，年老龙钟褴褛疲弱的乞丐双手拱着等候基督教徒的慈悲——复活节的夜祭开始了。我们挤在基督救主庙里，人山人海，至少也有两三万，一切仪式也不能十分看得清楚。好容易挤得出来，回寓已经四点多钟，很疲乏。莫斯科城却为一千五百余教堂的钟声——般洪沉递——的震动飞颤。“异教徒”的清梦也受骚扰。

复活节是俄国旧历中最大的一佳节，家家户户都相庆贺，今年恰巧和国际的五一节同在一日。俄俗凡逢复活节的一星期，每家设着盛筵，种种食物，鲜美丰盛。儿童得受“复活鸡卵”——鸡卵染着种种彩色，并有玉琢木雕的，友朋亲戚往来宴请，人人相见，都以接吻相庆，即使未嫁的女郎在这几天亦可以和男友交吻。革命后战祸相寻，政府行集权制及劳动券，已经两三年没有大大的过这佳节，食物菜膳不容易取得。今年第一年行新经济政策，开放商业，民间值此佳节，突现活泼泼的气象。

五月一日的清晨，暖欣欣的朝阳，温和的春风，路上行人却很寂寞。——昨天晚上礼拜归去太晚了，市场

---

① 即莫斯科。

又因佳节而停闭。只有莫斯科的中心——红场<sup>①</sup>附近，设着演坛，无产文化行农民跳舞种种新艺术庆贺五一节。全城电车通挂红彩，游行全城，演说五一节工人运动的复活。我们路过一场，许多教育人民委员会所办幼稚院的儿童穿着新衣呼号“万岁”，场的另一端，又有嘉里宁<sup>②</sup>演说呢。

我们趁两重佳节的兴致，顺路一访女友。——可是没有接吻，因为东方人的羞态……

——啊呀，恭喜恭喜，今天在我们这里吃过节饭。

——你们正忙着做菜呢！我来帮你。肉是市场上买的，新鲜么？

——昨天买的。现在劳动券废了，东西容易有新鲜的。呀！——我们忘了问你，你们中国有复活节么？

我因此略略解释中国人的宗教观念，风俗，和对于基督教的关系，他们听得非常之有趣。

回忆二三月间，我到俄人家里，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面包是常餐便饭唯一的食品，中国茶是请客的佳味。现在丰富得多了，可是非得有钱不可，市场物价因投机商业之故很不稳。然而大概而论，大多数劳动人民也受许多方便利益——工厂工资大增，废劳动券而令得购买于市场的可能。——无大工业，或大工业破毁的国家里，那集权制的分配本不适宜；共产方法另有途径，集中的制度暂受技术上的困厄，——仅能为“军事的共产主义”时期暂时的奋斗方法。

---

① 即红场。

② 今译加里宁。

假使俄国的市侩见布尔塞维克的让步，远东初醒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于此证实马克思所谓社会关系中“经济现象”的现实力。假使莫斯科市民淡于五一节而热于复活祭，更见着经济落后国家的守旧性，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

## 六

清风朗日的春早，莫斯科天色已经非常和快，昼时而且很热了。游春士女都到郊外树林草地，一畅郁积。莫愁园畔，莫斯科河边，绿林荫下沐浴畅怀。青青的灌林，悠悠的池水，士女三五，携手并肩，尽着情话呢。我们同着俄友纪务立，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嘉德琳·亚尔奏莫维次女士（前俄最高法院院长的女儿）同着步出郊外，清风拂拭，全宇宙都在怀抱中了。纪务立却不十分高兴，对我们说道：“你看嘉德琳女士、以前的贵族，那倨傲之态还依然存在，不大愿意理我似的……”我说：“也不见得，你心上不舒服，因为他待你没有你所要的亲热样子罢了，怎说不理呢？他不是刚才还和路旁的农家女问话的么？……”

从莫愁园回来的时候，天色还早，稍微有些风，灰尘蓬勃；路上有一扫街夫，不用水洒，拚命乱扫，尘土腾得更高。纪务立问他为什么不用水洒。

——请你问列宁去！他们没有给水，教这样扫的，又怎么办。

回寓很疲乏，吃完饭在饭厅闲坐。饭厅的女仆坐在自暖壶旁斟茶给我们吃。静悄悄的看着窗帘颀拂，随意谈着。

一女仆说他的兄弟在乡间耕地，今年春天收成或者还好，雨水若是不足那可没希望了。食粮年年政府收尽，乡间生活，也没有城里人说得这样好。我告诉他，今年实行课税法，不致于尽收食粮，很可以多下些种了。他说他兄弟不敢信政府公报上的政策，还不肯多种，恐怕枉费力呢。

公寓门首：阶沿上坐着两三个人，夕阳红艳，照着他们神圣的劳工颜面。晚风清利，令人回想日间莫斯科河里的沐浴。闲着在门首散步，只听得工人谈说得很高兴。

——唔，老兄弟，你知道“劳动义务”也改“劳动税”了。省得他们胡来，还是我们做得来工！

——你们新定薪水有多少？我们现在听说快得十倍的薪水呢。

——自然，一天一斤面包，一顿中饭，还不好？要什么钱！

——别慌，咱们国家工厂口粮还得发呢，钱亦加多，还有我们制的东西，也可以领……

## 七

克莱摩宫十三世纪的宫墙，七百年前的教堂——朴素古旧，建筑奇特，当时必是国家中央最大的圣地，而今比着后代西欧式的新殿宇，已竟很低很狭了，累世纪的圣像画壁——人面衣饰，各画之间还留着古艺术的“条件性”，好——似中国的关帝像，希伯来君士但丁文化的遗迹还显然；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苏维埃的办公室，都在新殿宇内：巨大的跳舞厅，光滑雪亮的地板，金碧辉煌的壁柱，意大利名艺术家的雕刻，有一部分宫殿，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皇起居，还另设陈列馆人员指导游览，西欧化后俄国的文明已算会集希腊日耳曼的精髓糟粕；现今则安德莱厅赤色光辉四射，全宇宙映耀，各国劳动者代表的演辞，声音震及环球，——第三次大会的共产国际；今日之克莱摩宫真做得人类文化三阶段的驳杂光怪的象征。

第三次大会第一天，杜洛次基提案《世界经济现象》，指呈当时经济恐慌稍缓，渐有改善，劳动运动由进攻一转而为防守——资本家反乘机进取，然而这不打紧，共产国际可藉此深入群众，正是历练巩固革命力的好机会。丰采奕奕的杜氏，演说辞以流利的德语，延长到三小时余，……后来讨论时，法国共产党有许多疑问，争辩很久。我们新闻记者中有不十分懂的，因约着布加利



亚<sup>①</sup>代表同去问杜氏。杜氏见中国新闻记者很欣喜，因竭力和我们解释，说话时眉宇昂爽，流利倜傥。他说，经济状况窘迫——就是“恐慌”到时，并不一定是革命的时机，有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派之激于意气，冒昧暴发，反丧群众的元力；经济状况改善时，工人资本家冲突渐入“经济要求”的狭轨里，然而即此可鉴“社会党人”和群众的密接训练程度增高……”法国同志就是不赞成我这一层意思……”他说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手里一枝短铅笔，因他指划舞弄，突然失手飞去，大家都哄然笑起来了。……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大会快完，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次才第一次与我以一深切的感想呵。

---

① 今译保加利亚。

## 八

阴晴不定的天色，凄凄的丝雨，心神都为之忧黯……污滑的莫斯科街道，乱砌的石块，扰扰行人都因之现出跛相。街梢巷尾小孩子叫唤卖烟的声音，杂货铺口鱼肉的咸味，无不在行人心理上起一二分作用。

钟表铺前新挂起半新不旧的招牌，也像暗暗的经受愁惨的况味。我走进铺门，只见一老者坐在账台旁，戴着近光眼镜，凄迷着双眼，在那里修表呢。旁坐一中年妇人接着我的表嘻嘻的说道：

——呵，你们来开“大会”的，预备回去宣传无产主义么？

我笑着回答他不是的。他还不信呢。后来又说：“不错不错，中国也用不着宣传，——在中国的资本家都是英国人，和我们从前一样，德国人在此占‘老爷’的地位，咱们大家都当小工！现在又兴租借地了，和你们中国差不离。”我说，你们有苏维埃政府呢。他默然一晌，笑一笑，就不言语了。……

我回寓来觉着更不舒服。前几天医生说我左肺有病，回国为是。昨天不是又吐血么？七月间病卧了一个月，奄奄的生气垂尽，一切一切都渐渐在我心神里磨灭……还我的个性，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精力来！唉！北地风寒积雪的气候，黑面烂肉的营养，究竟不是一片“热诚”所支持得住的。

万里……万里……温情的抚慰，离故乡如此之远，那能享受。习俗气候天色，与故乡差异如此之大，在国内时想象之中都不能假设的，漫天白色，延长五月之久，雪影凄迷，气压高度令人呼吸都不如意。冰……雪……风暴……那有江南春光明媚，秋花争艳的心灵之怡养。

可是呢，南国文物丰饶也不久（其实是已经）要成完全的殖民地，英国“老爷”来了……想起今晨表铺主人的话，也许有几分真理。……

梦呓模糊，焦热烦闷，恍恍忽忽仅有南国的梦影，灿黄的菜花，清澄的池水……桃花……

唉！心神不定，归梦无聊。病深了！病深么？

## 九

中秋来了，陶怡情性的佳节到欧洲一变而成伤怀感慨的因由，——也许是我心理的病状。偶然和俄国人谈起“中秋”的意义，他们却引为奇趣，说这团圞的象征，大有诗意，怂恿我们借他们地方一为庆祝。女主人赶着做点心，欣欣的嬉笑，也强勉一解烦闷。

——恭喜恭喜，点心做好了，你们瞧一瞧。中国过这节通常吃什么？

——月饼。特为要圆的，才像“团圞”呢。

——呀！为什么不早说，我亦做圆的，那多有趣！

中国的一个中秋节也能在莫斯科过，意兴萧条中，未始不是一件乐事。后来谈到我的病，嘉德琳女士竭力劝

我回国，——我亦知道，夜夜虚汗咳嗽吐血，难怪心绪不能好。可是回去罢，又怎么办呢？……

座中忽来一新客，我们的谈话中断了。客从苦尔斯克(Kursk)<sup>①</sup>来，向来是办食粮事务的。谈起来，据说：“苦尔斯克(莫斯科南)农民对于新经济政策中的食粮课税法很满意，——今年办征收顺手得多，有的人家麦粮不够的，就教他们用马铃薯到市场上去换了麦粉交纳租税，他们也很赞成，再没以前倔强的态度了。农民兵士本来大多数是无意识的群众，向来不知道问‘为什么’，只要‘会’办事，政策妥当，原没什么难处。”

夜深散宴归来，又过质生处一谈，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太困苦，还“不如归去”，或者有“可为”。……病体支离，要做的，应当做的，也都不能做。况且心理的病状，情感易动，感慨低徊，抛一滴无意的热泪；家园，故乡，人生的意趣，将来的责任都拼在泪花里，映着灯光，陆离万象，化作一“宇宙外的宇宙”了。

今天我写信与俞颂华，归计暂决，我们三人同来，未及一年，都已四散，——颂华五月就上柏林去了，我现在决计要归国，宗武还留此地，——三人此行的成绩，千辛万苦，报酬又何如呢？致颂华信中有几句话，聊且记下：

……我一个病人，为精力所限，为才力所限，为学识所限，在这八个月内的成绩如此而已！……是成是败？以我这样学识浅薄，精神疲敝的人，来做

---

① 今译库尔斯克。

开天辟地研究俄罗斯文化（在我以前俄国留学生有一篇好的文章出来过没有）的事业，勉强有这一些成绩，能否算得最高限度？……

……总上三种原因：（一）求学问题，（二）通信问题，（三）经费问题，再加我现时的病状，不能不决定回去了。现在我已着手进行，可是旅途困难，行李笨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走得成功呢。……

## 十

西伯利亚行旅现时非常困难，而我带的书籍太多，又不能走了，——总要等一“便”的机会才好。

病亦似乎轻了好些，最好能进医院，……肺病是要“养”的。可是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

工作？我现在的工作纯粹是非体力劳动，片面的智力劳动更使健康受损，性情怪僻，再加之智识劳动所必须的“精神娱乐”，我也看得非常之淡，自然没有生趣了。

前天购书时偶然遇见德尔纳斯嘉女士，他约我赴他的家庭音乐晚会，聊一散心畅怀！

音乐会中到客亦有二十多人，大家肆谈种种问题，从家常琐事到文学哲学。有一女郎和我大谈其中国诗，——他本来是研究文学和科学的，他说无论如何听不出中国诗中的韵；我给他说，中国文的单音，如其照

欧文押韵法，势必至于字字相同，所以“韵”，在中国文中只是“两字母音相同”，而子音难得相符。他们又都说中国读诗声如犹太教的祈祷词呢。

披霞娜声忽动，大家聚在厅里来。有一人奏携琴，一人奏繁华令（西洋胡琴）相和。风雷疾转，泉漏铿锵，固然已经怡神心会，最动人处却在抑扬迢递间写得人心弦上的言语。一中年妇人且吭喉高歌。……我总觉得欧洲音乐，比较的能传达人的情感于外；我虽中国人，听中国乐却没听外国乐的易于感动怡悦。乐竟，大家聚着几位少年人，——老年的吃完晚饭，都已告辞归去，——于是假作演剧。一直到早上六时才散。

欧洲人的精神娱乐，高尚雅致，而且不一定是上等人间，……智力劳动之暇尤其必须，——比打麻雀总好些！一笑。

哼！智力劳动，智力劳动，——一天一小块黑面包，还要娱乐……

今天一中国工人林扬清请我们吃饭；他是皮包匠，每天在工厂里做工八小时，一月得钱二百多万呢。

小小的两间屋子，女主人围着厨裙出来相见，问道：——诸位说俄国话不说？请坐，请坐。

过不一忽儿，厨房里拿出牛肉汤，面条，我们道了谢，吃着，因说起工厂情形。据林扬清说，工人生活就是如此，也不算得坏了。每天工作完，归来有俄国妻子谈谈心，有时上戏院。当时还有好几位林扬清的同伴，热热闹闹谈天。

我看来暗暗的想，他们——非智力的劳动者，——即使有困难苦痛，大概永没有我这一种……“烦闷”呵。

## 十

前几天我得着北京来信，——是昀弟的手笔，还是今年三月间发的，音问梗塞直到现在方来。他写着中国家庭里都还“好”。唉！我读这封信，又有何等感想！一家骨肉，同过一生活，共患难艰辛，然而不得不离别，离别之情反使他的友谊深爱更沉入心渊，感切肺腑。况且我已经有六个月不得故乡只字。于今也和“久待的期望一旦满足”相似，令人感动涕泣，热泪沾襟了。

然而，……虽则是如杜少陵所言“家书抵万金”<sup>①</sup>，这一封信，真可宝贵；他始终又引起我另一方面的愁感，暗示我，令我回想旧时未决的问题；故梦重温未免伤怀呵。问题，问题！好几年前就萦绕我的脑际：为什么要“家”？我的“家”为了什么而存在的？——他早已失去一切必要的形式，仅存一精神上的系连罢了！

唉！他写着“家里好”。这句话有什么意思？昀白，昀白，你或者是不愿意徒乱我心意罢了。我可知道，我全都知道：你们在家，仍旧是像几年前，——那时我们家庭的形式还勉强保存着，——那种困苦的情景呵。

我不能信，我真不能信……

中国曾有所谓“士”的阶级，和欧洲的智识阶级相仿佛而意义大不相同。在过去时代，中国的“士”在社

---

① 杜少陵即杜甫，此句引自他的《春望》。

会上享有特权，实是孔教徒的阶级，所谓“治人之君子”，纯粹是智力的工作者，绝对不能为体力劳动，“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现在呢，因为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加以外国资本的剥削，士的阶级，受此影响，不但物质生活上就是精神生活上也特显破产状况。士的阶级就在从前，也并没正式的享经济特权，他能剥削平民仅只因为他是治人之君子，是官吏；现在呢，小官僚已半文不值了，剥削方法换了，不做野蛮的强盗（督军），就得做文明的猾贼（洋行买办）；士的阶级已非“官吏”所能消纳，迫而走入雇佣劳动队里；那以前一些社会特权（尊荣）的副产物——经济地位，就此消失。并且，因孔教之衰落，士的阶级并社会的事业也都消失，自己渐渐的破坏中国式的上等社会之礼俗，同时为新生的欧化的资产阶级所挤，已入于旧时代“古物陈列馆”中。士的阶级于现今已成社会中历史的遗物了。

我的家庭，就是士的阶级，他也自然和大家均摊可怜的命运而绝对的破产了。

我的母亲为穷所驱，出此宇宙。只有他的慈爱，永永留在我心灵中，——是他给我的唯一遗产。父亲一生经过万千痛苦，而今因“不合时宜”，在外省当一小学教员，亦不能和自己的子女团娶。兄弟姊妹呢，有的在南，有的在北，劳燕分飞，寄人篱下，——我又只身来此“饿乡”。这就是我的家庭。这就是所谓“家里还好”！

问题，问题！永不能解决的，假使我始终是“不会”生活，——不会做盗贼。况且这是共同的命运，让他如此，又怎么样呢？

总有那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了，那时我



们做我们所能做的！总有那一天呵……

## 十二

秋白的“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不能为现代“文明”所恶化；固然西欧文化的影响，如潮水一般，冲破中国的“万里长城”而侵入中国生活，然而……然而这一青年的生活自幼混洽世界史上几种文化的色彩，他已经不能确切的证明自己纯粹的“中国性”，而“自我”的修养当有明确的罗针。况且谁也不保存自己个性抽象的真纯，——环境（亦许就是所谓“社会”）没有不生影响的。

然而个性问题有渊深的内性：有人既发展自我的个性，又能排除一切妨碍他的，主观的，困难环境而进取，屈伸自如，从容自在；或者呢，有人要发展自己的个性，狂暴忿怒面红耳赤的与障碍相斗，以致于失全力于防御斗争中，至于进取的创造力，则反等于零；或者呢，有人不知发展他的个性，整个儿的为“社会”所吞没，绝无表示个性的才能。——这是三种范畴。具体而论，人处于各种民族不同的文化相交流或相冲突之时，在此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或能为此过程尽力，同时实现自我的个性，即此增进人类的文化；或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竟或暴露其“无知”，仅知如蝇之附臭，汨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三者之中，

能取其那一种？

如此，则我的职任很明了。“我将成什么？”盼望“我”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

“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

“我”的意义：我对社会为个性，民族对世界为个性。

无“我”无社会，无动的我更无社会。无民族性无世界，无动的民族性，更无世界。无社会与世界，无交融洽作的，集体而又完整的社会与世界，更无所谓“我”，无所谓民族，无所谓文化。

## 十三

……我大概没有那动人的“心”！那足以得女子之“心”；而仅仅赖一“智”的威权，又不稳固，又无益……不论你生存多久，你只永久

寻你自己“心”的暗示，不要尽服从自己的或别人的“智”。你可相信，生活的范围愈简愈狭也就愈好。……

——《鲁定》屠格涅夫

圣人不患苦难，而患疾病。

——《墨子》

病魔，病魔！自七月以来，物质生活渐渐的减少，——优待食粮因新政而改付值办法；智力工作更无限制的增加。干时，我更起居无时——不是游息的“无时”而是劳作的“无时”，饮食不节——不是太多的“不节”，而是太少的“不节”。疾病的根底一天一天埋得深了。“我难道记忆力，论断力都失了么？……让我想一想看。”病卧几天，移我入此高山疗养院。

静静的寝室，窗儿总是半罅着；清早冷浴；饮食有定量定时；在院中雪下强睡；量药称水有人专值；晚间偶坐厅中笑语，医生演讲病源，病状，医术；有时还请人歌唱演剧奏琴，作娱乐；——有一定的规则。谁也不能违背。“此间是军国主义式的统治，医生独裁制……”科学的威权最高无上。我对于这一切最初绝无感想，——不会感想；念念“用智”，“出院后某天当做某事……”如此一秒钟都不能停息。

四五天来——我是十二月十五日进院的，精神才渐渐的清晰，回忆复活；低徊感慨缠绵悱恻之情，故乡之思隐约能现。……噢！

唉！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情性的动，无限量，无限量。然而我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亦坚固得很，“总应当”脚踏实地，好好的去实练明察，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理智的力，强行裁制。我很知道，个性的生活在社会中，好比鱼在水里，时时要求相适应。这我早就知道！二十余年来的维新的中国，刚从“无社会”状态出来，朦胧双眼，——向没有见着自己的肢体肤发，不用说心肝肺脏了，他酣睡中的存在，比消灭还残酷。如何不亟亟要求现实精神呢。然而“刚从无社会状态出来……”可知是开天辟地草创的事业。此中的工作者，刚一动手，必先觉着孤独无助：工具破败，不堪适用，一切技术上的设备，东完西缺，总而言之，这是中国“并非社会压迫个性而为社会不助个性”之特别现象。自然而然，那特异伟力超越轨范的需要也就紧迫。两派潮流的交汇，湍洶相激，成此旋涡——多余的人。

假使有人在此中能兼有并存两派而努力进取，中国文化上未始不受万一的功劳。然而“我”，——是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内的不协调”，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斲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伤感，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应当同于庸众。“你究竟能做什么，不如同于庸众的好，”理智的结论如此；情性的倾向却很远大，又怎样呢？心与智不调，请寻一桃源，避此秦火。……“然而，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

噫！心智不调。无谓的浪漫，抽象的现实，陷我于深渊；当寻流动的浪漫，现实的现实。不要存心智相异的“不正见”<sup>1)</sup>，我本来不但如今病；六七年来，不过现实的生活了，心灵的病久已深入，现在精神的休养中，似乎觉得：流动者都现实，现实者都流动。疗养院静沉的深夜，一切一切过去渐渐由此回复我心灵的旧怀里；江南环溪的风月，北京南湾子头的丝柳。噢！现实生活在此。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一畅……亦就是一次痛痛快快的亲切感受我的现实生活。

## 十四

一九二一年已经完了。高山疗养院庆祝新年。医生，职员，病人，——须发蓬松的老者，俄国式短衫里的壮年，新妆微艳的女郎少妇，都会集于王爵邸宅中的客厅里，钢琴节奏，跳舞，捉迷藏。——中国恐怕仅有小儿童才有这般的兴致。可是此地亦有小孩子来了，一群一群女役的，职员的，医生的儿女，都来趁热闹呢。

厅中竖着一棵大杉树，上插小烛，融融火光，满室都含温情的暖意。俄俗每值新年至圣诞时（依俄旧历则为自圣诞至新年），必定家家燃“杉烛”，杉上又挂小牛，小马，飞艇，镰刀，千里镜，种种纸制玩具（战前资产阶级有用铜制甚至于银制者），做送小儿童的礼物，——

---

1) 佛经中用语，指不正当的主张。

好一似中国的“押岁盘”。小孩子今天更欣欣然的围着那厅中的“杉烛”舞蹈歌唱呢。

你们中国也兴燃杉烛么？

我答道：“不。”

女医生和我说：

这杉烛本来是北欧异教徒的习俗。每到这一天——新年，是冬季的中间，最短的一天，北欧寒带，这一天简直不见日影，所以整天的燃着杉烛。你们中国过年有怎样的娱乐礼俗呢？说来一定非常之有趣的。

我随便告诉他们些中国风俗，都引为奇趣。……

“温情乐意的人生，在亲亲切切的生活里，中国社会生活中少见如此，——必定只在家庭。”然而欧洲有现实的社会，社会就和家庭（中国）有同样的价值。赤俄革命后的社会生活，更进一层，混以前相异的社会为一，女役，——在中国不过“老妈子”罢了！——和医学博士携手同歌呢。那里想得到中国家庭外的社会生活，只是麻雀牌的桌子，烧酒壶的壶底呢？——家庭内的亲切高尚优美的生活，娱乐，也就少见得很。

然而我不得不回想父母膝前的旧梦，——我曾有温情乐意陶养我的心性。现在离别六年了，今年更到万里外莫斯科的病院里！离别，离别！

## 十五

“军国主义”之下已一月多了，高山疗养院的生活恬

静规约，——有时也有精神的疲乏。况且和外界绝对隔离，几同封锁，天天看着灰色的天，白茫茫的雪，怎得不盼望清风朗日，——畅胸襟呢？莫斯科忽然移近东亚——远东大会<sup>1</sup>召集，用得着我这“东方稚儿”，于是出高山——陡然呼吸一舒，好一似长夏清早，登高山而望晓霞。

灰色的短夜，星汉徐移，“沉闷”如飞云一般渐渐吹散，放出些早凉，凝凝的细露，淡淡的晓色，长林丰草间偶然一阵一阵清风，“夜”的威权慢慢地只剩得勉强支持的姿态。小鸟欣欣的相语，蛰虫朦朦的相投，一望远东，紫赤光焰，愈转愈明，炎炎的云苗，莽然由天际直射，烘烘烈烈，光轮轰旋，——呀！晓霞，晓霞！

此时此际，未见烈日，——也许墨云骤掩，光明倏转凄黯，不然也只遥看先兆，离光华尚远；然而可以确信，神明的太阳，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不久不久，光现宇宙，满于万壑。欣欣之情，震烈之感，不期而自祝晓霞。

寒凛的北国、死寂的严冬，忽然想象烈夏的风光，何等快事！这是回念，这也是预想。可以回念，年年的夏日清早之飞赤，也可以预想，明年后年，暑日初晨之远东——那不都有“晓霞”么？

.....

革命怒潮的先声，那正是“天地青”的时候，革命赤日的遥光，那正是“晓霞”的散彩。群众的伟力，愈抵拒愈激厉；不如欢笑相迎。回念，回念，……预想，预

.....

1 指远东劳苦人民大会，1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

想。

一月二十九日，秋白生日，我生的晓霞在此么？

## 十六

.....

帝国国会里，恢宏壮丽的建筑，百年前贵族院的遗制，伟大的议事厅，——今日的彼得城苏维埃议场内，那困厄无赖的“奴隶”——韩国人，游牧愚昧的“野蛮民族”——蒙古人，盗匪统治下的“不安分青年”——中国人，帝国主义工厂机器下的碎骨，“不爱国者”——日本人，个个都站到昔日提议东清铁路权利的议坛上去。在彼得城工人女工劳动者欢呼鼓掌之中，发惊人的洪声，遥震万里外的四千余年古国的“万里长城”，隐隐的似闻回响。

满厅沉黯的灯光，赤色四射，东方人的语声，欢呼万岁，鼓掌喝采声，《国际歌》的乐声.....

彼得城在莫斯科西北六百余里（俄里），已经到得寒带，夏日往往有所谓“白夜”，整天不黑，冬天温度低到极点。我到此地，——其实出疗养院不久，忽然不得已而步行二里，呀，气压的重，寒气浸浸，彼得城的街市于我几等于水晶宫。幸而遇着一女友扶我徐行；——冷冷清清，满街差不多不见人影，——虽则新经济政策之下，也偶然见一家两家咖啡馆，始终因政治中心的南迁，



通商事业刚开始，此地暂时只得冷静些，……一处两处略见铜像，高庙。

勉强行至国际旅馆，血痰又现。如此睡在屋中四五天，从此没再见细认彼得之城。

二月七日模糊梦寐中，有人把我运到莫斯科。

从此又入高山，——恬静规约的生活。

## 第四章 归 途



(1923年1月25日)

俄罗斯的万世之谜如今不用猜了。秋白两年以来在四年欧战三年内乱后的俄国，所见所闻似乎平常得很，反不像归国之后七八天中听见的“国内新闻”那样可骇：——上海是外国狗吃中国人，汉口是英领残杀华工，内阁里有包办收买猪仔议员的阁员，国会里有唆使警察擅殴请愿公民的议长。……我亲爱的“礼教之邦”的中国同胞呵，你们在国内比我多见这样的礼教两年，比我知道得多，也就不容我多嘴了。我且替你们谈一谈“洪水猛兽的过激派的俄国”。

第一先要声明，我两年来的通信已经将观察所得随时公开诸国人，无论如何总应当知道：——俄国是一个人的国，也许是“人食狗彘”的国，可决不像狗彘食人的中国。这就是我所谓“平常得很”，有的是人情天理中的事！

欧战四年内乱三年的俄罗斯，实在经过了不少惊天

动地的变更，古今未有的困苦，俄国的劳动人民千辛万苦支持下来。——然而资本家包办的“世界新闻托辣斯”说了不少的风凉话，固然混淆视听，——中国的读者社会又是犯的什么罪！——然而近两年，各方面的疑幕渐渐揭除，再加区区的通信，中国人至少已经应当知道俄国万千所经的困厄以及他的职志。现在俄国正在“复活”，两三年前到过莫斯科的人，如今不认得他了。难道没有“内存的潜力”，这种事是可能的么？如今且不用说什么无产阶级的历史的使命，苏维埃俄国将来的前途，且不用说什么主义，什么理论。——中国受历史的封锁，对于欧洲政治经济的历变既无很明确的观念，要明白十月革命的意义，实不是一篇两篇文章可以了事的。且就极平常的事物极琐屑的谈话记载记载，也可以略见俄国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

# 一

我动身前一月正是莫斯科市苏维埃改选的时候。那天我却忙得不了，有事走回家，路上遇见一群示威运动的工人，欢呼着“劳农政府万岁！”送新选代表到莫斯科苏维埃去，拥拥挤挤，我等不及，挤入他们队中，想穿过去抢先走；谁知道他们唱着《国际歌》，步伐很慢，竟把我挤住，我也只得暂时列入队里随着步伐走。只听我身旁一女郎对旁边一人说道：“你这次听见一个新闻么？——国立第二印刷工厂都选了共产党了！”那人道：

“我已经知道。本来少数党在他厂里不过有一点历史的渊源，那有真实的信用。前两年我就和我妹子说的，——你不是认识我的妹子么？你知道他的脾气，——他总不信，以为少数党有什么妙法，能教西欧资本国不反对我们，现在他一般同事——第二厂的工人职员才知道了，明白了，——共产党始终是真正为全体工人阶级奋斗的政党，这一次少数党的候补人名单当然再也通不过的。……”《国际歌》声又起，我正忙着，看见应该转弯的路已到，赶紧出队，和他们分路，也就不能往后听了。

其时正是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年共产国际三大会将近开会之时，所以过不了几天，莫斯科苏维埃替各国代表饯行。我以新闻记者的资格列席，席间遇着一莫斯科苏维埃的议员，某工厂的工人。他对我说：“呵，你原来是中国新闻记者，你们报上列宁死过了几回了！哈哈。”我说，中国造谣机关的机器还太简陋，自己还不配制造此种世界新闻的谣言，大概中国市场外货奔盈，“舶来货的谣言”自然不少，不过我的报还算是有些左的，大约决不让此等谣言随便乱载。他道：“不错不错，你既来此地，自然不至于此。我听说中国青年曾经抵制日货。你们贵报大约更进一步抵制这类的英美货了。”说着大家哄然大笑。大家看见我这一稍有常识的中国人——是俄国境内希世之珍，——又能说几句俄国话，谈得来，都拥着来问长问短，弄得我头昏眼眩。——有的问：“现在海参崴已得，从赤塔经满洲里直达崑崙的铁路，你想中国政府肯不肯和我们协作共同发展商业呢？”有的问：“照孔夫子的学理，蒙古活佛的统治政体应当永久保存罢？”有的说：“中国究竟是封建制度还是共和国？”有的

说：“孙逸仙的革命是怎么样‘革’法的？”乱七八糟的问题，最难答复的是：“北京政府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府？”忽然有一位似曾相识的女郎跑来，才为我解围。女郎道：“你怎么三四个月不见面，岂有此理！他们拥着你又一定问许多痴话，女人脚哪，鸦片哪。”我连忙道：“没有，没有，你放心。”我们携手走着谈话，走过一张桌子，忽然听见大家嚷起来，“呵，中国人来了，把他举起来。”女郎夹住我不让他们抢去，说：“刚吃酒，不要让他们颠簸。”始终夺不过，我竟被他们举起，几乎抛上天！我对女郎说：“你们这种欧洲式的欢迎礼，我实在不赞成。”他道：“还不是热闹热闹，谁像你们中国人拘拘谨谨，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看今天热闹不热闹！从前这所屋里，那里容得‘我们’来热闹；——不用说像今天这样的盛会（Banquet），就是平平常常的音乐会也不能来听，——票子卖得那样贵！还要穿什么晚礼服！人家才有说行新经济政策就已经没有社会主义了。我总不要听。这些宴会不宴会，还是小事，只看苏维埃里议事，对于商人及企业家加税减税，整顿实业交通，都是随着工人代表的意。政权总在我们工人阶级手里。——自然有些‘初出茅庐’的办事人无经验，会有错误，甚至于荒谬，——人人负责。那能一跳便入天堂！你瞧，你再到我们家去，现在我领的工厂里的口粮工资，已经比三四个月前大不同了……”听得大厅里歌声已起。钢琴响起来了。我们就走去听戏。

## 二

两年前的莫斯科再也不是现在的样子。当我初到时，俄国真正异常穷窘，所发的火柴，俗话说：“先要放他五分的臭气，随后才会有光呢。”等我决定要走的时候，情形却大不同了。

临走前一星期，我还不能决定：——回国的川资已经来了，此后若要继续留学，经费或者不愁，——不必一定要国内接济；可是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决定回国一次。匆匆走别几处大学教授，东方语言学馆的同事，还要买些零碎东西。街上电车现在已经开行得很多，也有一二辆新造的，比不得那时零落破败的样子了。平常闭门读书时居多，——东方人的根性始终脱不掉，——所以不大注意。那两天却常常在街上，总看见许多大商铺；大半国立的市立的工人协作社的，比较更堂皇些。——这也是近半年来的现象，我记得商业初开时，私人的营业反较盛，有时货物都较贱，现在大概而论已适得其反了。街上走路的人穿着也整齐得好多。我心上常想，不过两年！虽然现在俄国大工业（煤铁石油等）还很困难，而小工业（纺织火柴等）已经大大恢复，农业经过旱灾也有复生气象，真有些神妙。中国之括弧内的“革命”，其实可说丝毫没有

“破坏”，算是世界第一的“改良主义的民族”，十二年来反而弄成现今这步田地。

那天，我想应当去辞别那位在棉织工厂办事的女郎，不然他又得骂我。趁着电车去，路过市场，顺便下来买些东西。市场上的小商人：贩卖农工业品，——都是现时国家或协作社能力还不足时的分配机关。市场上的货物，实在很贵。当时我买完东西，再去看那女郎，他们已经散工。厂里却还有些人，其中有我熟识的两个小孩子，一个有十七八岁，一个十四五岁。他们告诉我维腊（那女郎的名字）已经走了。我就想回家。他们说俱乐部快要开始演戏，不让我走。我说：“你们的戏有什么看头，领教过了。况且这样大的大革命，却没有把俄国恶习革掉，——说七时开幕往往弄到八时半。”小孩答道：“没有的事，戏院子里向来极准的，就是我们这里，现在也是‘我们’‘共莎莫勒’<sup>①</sup>办，比他们成年人总振作些。虽没有戏院子里好，自己做有自己做的趣味。况且到戏院子里去的票子，只一两个月才轮到我们一次……”我站起身要走，另一小孩子说：“那是你买的什么，给我瞧瞧。”又说道：“你不看戏，坐下给我们讲些中国事情再走。”我没法，就坐下道：“市场上的东西贵，商人说是租税太重了。”小孩子道：“你怎么没进协作社，或者职工联合会，你不是教员么？像我们‘集合的供给’便宜得好些，‘消费者’有国家帮着组织，慢慢的就好了，不怕。”我听着笑道：“啊哟，你倒是经济学大家。”他被我说得不好意思，不作声了。那十七八岁的小孩子道：“不错，我问一

---

① 俄语共青团的译音。

问你，白葛达诺夫<sup>①</sup>的《经济学讲义》第十一版出来没有？我们图书馆的办事人糊涂，问他，他总是说还没打听。”我回他，快出来了，——（因为我前一天正在那“莫斯科的工人”——生产合作社印书馆——里买过书，所以知道。）说着，我看时候不早，赶紧回家料理行装。

### 三

我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车。现今不但交通略略恢复，而且从赤塔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赤塔，每礼拜已经能开一次特别快车，有卧位的。沿路车站上都可以打开水买食物，车上亦有饭车，就是三等车也干干净净可以睡得很舒服。只有车上的电灯初修好，往往光线不大十分明亮，有时竟完全熄灭。听说，短票车比较要简陋些。然而想起两年前赴俄的火车铁路，真有天渊之别。却不知道，“最爱和平，素不喜破坏的中国”，何以两年之后，竟至于京汉车三等里的电灯破了也没钱买，京奉车二等里的痰盂都还没有？

从莫斯科到赤塔，睡在车上九天，吃饭就在饭车。常常走过各车，有时听见农家老妇乡下人的谈话。我很记得，有一次，一农家老妇说：“我总不懂得，什么是‘koperativa’（协作社），又是‘Kommunic’到乡下来胡

---

① 今译波格丹诺夫，苏联唯心主义哲学家。



闹……”(Kommunic 是乡下人叫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的误读。)旁坐一位中年乡下人翘着双腿，插嘴道：“你自己不懂的都是胡闹！你不懂，现在懂的人多着呢。”我走过时不禁失笑，老妇瞪着眼看我，那神气真有趣。

走过上乌金斯克时，护照上要盖印，——因为远东共和国与苏维埃俄罗斯虽已宣言合并，然而手续上，因为时不久，还没有完全办妥，所以免不了这一层麻烦。半夜三更，很大的狂风，起来去换票盖印，好不讨厌。走到护照检查处，又站了一小时方才办好。人多，不得不排班等候。许多人挤着在一破车里，——就是护照检查处。有一老人说：“我上次走过，痛快得多。现在这一位一定是新来的，不会办。”又一人道：“我以前办过这事，那用这样麻烦。他自不会想法子，——自己起身到车上走一趟，随时查随时盖印，一忽儿就完了……”我心上想，俄国人真有耐心，到处都是排班等候。秩序总算有的。过了上乌金斯克，赤塔，到满洲里，从此便到中国境了。

## 四

我离俄国，真正有些低徊不舍的感慨，——那一种纯朴自然，新生的内力，活泼泼地向上的气象是有叫人留恋之处，虽然也有不少糊涂颠预的蠢气，却不害其为世界第一新国，——劳农的国家。我不得不一记在俄境内与俄国平民最后一次接触的回想。

这是在西伯利亚小站旁农民家里。那主人就近为护路警兵。我在边境只看见他这样的七八个“大兵”，北京城里传说：“据满洲里某国领馆消息，赤俄派三十万大兵来夺中东路。”我回来看见报上如此说，倒很想到火星上去调查调查，——也许这所谓“满洲里”也不是地球上的这一满洲里呢。闲话休提，言归正传。

我到 he 家里去，是想吃些东西，因为在边境候火车，肚子又饿，身上又冷。一进他木屋的门，真正和暖，——烧着很旺的火炉，随便喝杯茶，吃点面包，看着那兵的妻子做糕饼预备过节呢（俄历耶稣圣诞节）。屋内陈设极简陋，却挂有一张破旧的欧亚大陆地图。他们夫妇俩接待我非常之和气。当时屋中坐着一位客人，看来是那警兵的同事，——都是农家的青年。

主客谈着正高兴呢，招呼我坐下，那主人又接下去谈天，说道：“现在全俄统共不过八十万兵，却并不嫌少，经济事业正要紧呢。欧洲边境有许多小国，波兰呀，埃史笃尼亚<sup>①</sup>呀，理德瓦<sup>②</sup>呀，腊德维<sup>③</sup>呀，这都是生来的‘缓冲地’。他们独力决不来打俄国。法国英国要帮也只好暗帮。列强不能直接来，小国现在也渐渐聪明起来，不让他们玩弄。我们俄国正好休息。……现在海参崴也是我们的了。可惜如今虽然各事都已安定，报纸还不大能到我们这里，不知道近两天时事怎么样了……”

我道原来如此，——人家的军队是学校。

---

① 今译爱沙尼亚。

② 今译立陶宛。

③ 今译拉脱维亚。

一进中国境，最触目的就是到处只见穿着“号衣”的军警；俄国这样的“独裁”“专制”的国家里，街上向来看不大见他的“民警”。哈尔滨下站后我就因在车上时这最触目的东西时时盘问，只得缓一缓，在哈住了三天。直到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方才到京。

火车行进北京城时，远远看着天坛，城楼，中国式的建筑，不禁怦然心动。“我与你们久别了，中国的文化呵！不知道满中国布满了如此之多的军警，是否为着保护你们的？……”

果不其然，过不了六七天，这“最触目的东西”竟大效劳，持枪弄棍的大“保护”其中国文化，在尊严的众议院门口，把一般争人格的青年学生，打得落花流水。可怜，中国“文化之代表”，“高尚纯洁的”学生还尽在明白宣言“只谈教育”呢。

## 第五章 我像饮了 醇酒一样，陶醉着<sup>①</sup>



### 一、爱之囚奴<sup>②</sup>

(1924年1月4日)

我向来不信宗教，然而我知道有宗教的人的心境。我现在每每“祷告”——这是一种奇绝的境界，我有个高高在上的明镜，彻映我的心灵。我昨晚想了一夜：或者这是所谓“幸福”罢？

---

① 见1929年2月26日致杨之华。

② 此节选自作者致王剑虹信的片断，题目为编者所加。王剑虹，瞿秋白的前妻。1924年1月与瞿秋白结婚，同年7月于上海病故。

128 / 瞿秋白自传

(1924年1月5日)

不要闲愁，不要……好生的……只有规律外的放浪是自由快意的；那单纯的放浪任意只能使神智空泛得难受……

生命要享受，一切形式主义要摧折。

(1924年1月8日)

我不知怎的，近来又能很动情的，很真挚的想着我的父亲，想着我已死的母亲，甚至于我六、七岁时看见过的外祖母，我已经又能很悲酸的为他们堕泪。

(1924年1月12日)

我的心碎了。我若毁坏了我的人格，呀！你现在再不念了。你如今懂得我那次对冰之说这话的意思吗？思前想后的种种计较总也不能没有，尤其是我们这样“人”。我又何尝是人呢？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唉！我恨不能插翅飞回吻……。

爱恋未必要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爱恋生成是先天的……单只为那“一把辛醉泪”，那“悒悒奇气来袭我心”的意味也就应当爱了，——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我现在或者可以算得半“人”了。

梦可！梦可！我叫你，你听不见，只能多画几个“!!!!!!”可怜，可怜啊！

(1924年1月13日)

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机

## 第五章 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 / 129

器、楼房啊。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

“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

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他不是自由花魂。

(1924年1月26日)

我内部矛盾的人生观虽然有时使我苦痛，然而假使缺少矛盾中的一方面，我便没有生命：没有“爱”，我便没有生命的内容，没有“事”，我便没有生命的物质。

(1924年1月27日)

我们正像走黑夜的人，过了一程，惊魂定了一点，回顾来路，黑漫漫好不怕人——……那日子多么阴沉愁惨啊！

(1924年1月28日)

恋爱和社会的调和——我不过抽象的说，——本是我一生的根本问题，我想他们本是调和的，我自己不敢信，要问我的“心”，“心”若给我一个承认，我可以壮壮气往这条路上走去。自己的“心”都不肯给我作主，谁又作得主呢？

(1924年2月16日)

这两天虽然没有梦，然而我做事时总是做梦似的——时时刻刻晃着你的影子，言语都……平生最大的“生趣”。没有你，我怎能活？以前没有你，不知道怎样过来的，我真不懂了。将来没有你便又怎样呢？我希望

130 / 瞿秋白自传

我比你先没有——

(1924年1月28日)

我苦得很——我自己不得你的命令，实在不会解决我的人生问题。我自己承认是“爱之囚奴”，“爱之囚奴”！我算完全被征服了！

(1924年7月1日)

梦可：我甚时再能自由？我这次自承无力了。我并不是好胜，故意说我自己不诚挚。我是因为十六年来，自己抑制了我的人性——血液里管着白水；不敢自信：还值得人家的爱。天地间只有一个人，你救了我的人性。我到是今方才得到了一线生命。

(1924年)

那一点虚名累死我了，累的我精神疲乏极了，我只想“静悄悄的”做一个普通人，和你，和你……天天做着些规律的劳动；晚上一灯黝然，摊着诗篇——谁也不知道的诗篇，除了我们几人；——那是多么好啊！

二、三则启事<sup>①</sup>

杨之华<sup>②</sup>  
沈剑农<sup>③</sup> 启事：

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  
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  
杨之华 启事：

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  
恋爱的关系。

沈剑农  
瞿秋白 启事：

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  
朋友的关系。

---

① 刊于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7日、28、29日第一版。

② 瞿秋白的夫人。

③ 杨之华的前夫。



### 三、秋之白华<sup>①</sup>

(1929年2月26日)

之华：

今天接到你二月二十四日的信，这封信算是走得很快了。你的信，是如此之甜蜜，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我知道你同着独伊<sup>②</sup>去看《青鸟》，我心上非常之高兴。《青鸟》是梅德林的剧作（比利时的文学家），俄国剧院做得很好的。我在这里每星期也有两次电影看，有时也有好片子，不过从我来到现在，只有一次影片是好的，其余不过是消磨时间罢了。独伊看了《青鸟》一定是非常高兴，我的之华，你也要高兴的。

之华，我想如果我不延长在此的休息期，我三月八日就可以到莫斯科，如果我还要延长两星期那就要到三月二十边。我如何是好呢？我又想快些快些见着你，又想依你的话多体息几星期。我如何呢？之华，体力是大有关系的。我最近几天觉得人的兴致好些，我要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想着将来的工作计划，想着如何的同你在莫斯科玩耍，如何的帮你读俄文，教你练习汉文。我自己将来想做的工作，我想是越简单越好，以前总是“贪多少做”。

---

① 此节选自作者致杨之华信的片断，题目为编者所加。

② 独伊，即瞿独伊，瞿秋白的女儿。

## 第五章 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 / 133

可是，我的肺病仍然是不大好，最近两天右部的胸膛痛得厉害，医生又叫我用电光照了。

之华，《小说月报》怎么还没有寄来，问问云白<sup>①</sup>看！

之华，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喜欢，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是独伊。梦中的你是如此之亲热……哈哈。

要睡了，要再梦见你。

秋 白

二月二十六日晚

(1929年3月12日)

之华：

昨天接到你的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sup>②</sup>死的消息震惊得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三十元已接到。）

整天的要避开一切人——心中的悲恸似乎不能和周围的笑声相容。面容是呆滞的，孤独的在冷清清的廊上走着。大家的欢笑，对于我都是很可厌的。那厅里送来的歌声，只使我想起：一切人的市侩式的幸福都是可鄙

① 云白，即瞿云白，瞿秋白的弟弟。

② 兆征，即苏兆征，中国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曾领导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一九二八年二月动身赴莫斯科，先后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不久，因积劳成疾，留在苏联治病。一九二九年一月因国内斗争需要抱病回国，二月在上海病逝。瞿秋白曾说过：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治病，这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

的，天下有什么事是可乐的呢？

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如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史太林<sup>①</sup>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的——尤其是八七<sup>②</sup>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可是他的死状，我丝毫也不知道，之华，你写的信里说得太不明白了。他是如何死的呢？

之华，你自己的病究竟怎样？我昨天因为兆征死的消息和念着你的病，一夜没有安眠，乱梦和恶梦颠倒神魂，今天觉得很不好过。

我钱已经寄到了，一准二十一日早晨动身回莫<sup>③</sup>。你快通知云<sup>④</sup>，叫他和□□<sup>⑤</sup>商量，怎样找汽车二十二日早上来接我，在 Бряньск<sup>⑥</sup> 车站——车到的时刻可以去问一问；我这里是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分从 Д ъгов<sup>⑦</sup> 车站开车。之华，你能来接我更好了!!!

之华，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这是多么甜蜜和陶醉。我的爱是日益的增长着，像火山的喷烈，之华，我要吻你，我俩格外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

① 史太林，即斯大林。

② 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③ 莫，指莫斯科。当时瞿秋白在苏联库尔斯克州利哥夫县玛丽诺休养所疗养。

④ 云，指瞿云白，瞿秋白的弟弟。

⑤ 原抄存件此处字迹不清。

⑥ Бряньск 即布良斯克。

⑦ Д ъгов 即利哥夫。

党的老同志凋谢得如此之早啊。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呢!!

秋 白  
三月十二日

(1929年3月18日)

好爱爱：<sup>①</sup>

昨天晚上写了一封信，现在已经觉得又和你离别了不知多少时候了，又想写信。

亲爱爱，再过四天，我俩可以见面了。我是多么高兴！今天这里的天气非常好，青天白云，太阳光耀着，冷风之中已经含着春意，在那里祝贺我俩的叙首呢。我数了一数，你写给我的中俄文信一总有三十封了！我读了又读，只是陶醉在你的爱之中，像醇酒一样的甜蜜，同时，在字里行间我追随着你的忧愁或高兴，我觉得到你的一切一切!! 好爱爱，我吻你。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通用到实际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到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但是发端是不能怕难的。好爱爱，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有趣了！亲爱爱，好爱爱，我吻你，吻你。

你说，决定暂时不用功而注意身体。这是很好，我

---

① 此封信是根据作者手迹排印。

原是时时想着的，时时说的。好爱爱，这不好是灰心，而是要觉得自由自在的。自己勉强固然是必须的，但是不是要自己苦自己。我俩虽已到中年了，可是至少还有二十年的生活呢，不要心急，不好焦灼。我一生就是吃这个苦。我是现在听着爱爱的话，立志要改变我的生活，好爱爱，亲爱爱，你自己也要如此，你要如此!! 你是顶乖的。亲爱爱，我抱你，吻你。

我俩快见面了!!!

你的阿哥

三月十八日。

(1929年7月15日)

之华：

临走的时候，极想你能送我一站，你竟徘徊着。

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朗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的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桅樯，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鞅掌。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

独伊想起我吗？你一定要将地名留下，我在回来之时，要去看她一趟。下年她要能换一个学校，一定是更好了。

## 第五章 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 / 137

你去那里<sup>①</sup>，尽心的准备着工作，见着娘家的人<sup>②</sup>，多么好的机会。我追着就来，一定是可以同着回来，不像现在这样寂寞。你的病怎样？我只是牵记着。

可惜，这次不能写信，你不能写信。<sup>③</sup>我要你弄一本小书，将你要写的话，写在书上，等我回来看！好不好？

秋 白

七月十五

（1924年2月13日）

天气仍旧是如此冷，仍旧是满天的雪影，心里只是觉得空洞、寂寞和无聊，恨不得飞回你的身边。好爱爱，我是如此地想你，说不出话不出来的。

……好爱爱，亲爱爱，我又梦见你两次。

我想，我只是想回莫之后，怎样和你两人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怎样养成健全的身体和精神。

（1929年2月14日）

……你是我生活的组织者。我想起来了，从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我俩从江湾路搬到五来里之后，我便日渐丧失一切组织整理的能力，一直到现在。这是很奇怪的。为甚么，就对于一切事物现在都不能理出一个条理出来，而且心上一丝如此的愿望都没有。

---

① 指1929年8月在海参崴召开的太平洋劳动大会。

② 指参加会议的中国工人代表。

③ 会议规定，为保证安全，各国代表不许同外界通讯。

(1929 年 3 月)

最近半年是甚么时候？是我俩的生命经受到极繁重极艰苦的试验。我的心灵与精力所负担的重任，压迫着我俩的生命，虽然久经磨炼的心灵也不得不发生因疲惫不胜而起呻吟而失常态。

我是在千钧万两的压迫之下。不知是为什么缘故，我心上甚么事都不能认真的想。我的思想是麻木的。我只觉得你是亲人，是我的生命。……然而我如何能救我自己呢！我是如此的颓废！如此的昏沉！

我只觉得精力不够了。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尤其是最近是如此的。世界加在我身上的事务是如此的。我只是慌乱，……。我已是一半废人了。

我念念只想如何的弄好生活的秩序。念念的想成痴想了。

#### 四、小小的蓓蕾<sup>①</sup>

(1929 年)

独伊：

---

① 此节选自作者致瞿独伊信的片断。

## 第五章 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 / 139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么？

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

好伯伯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

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

你要听先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欢喜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伯伯

好独伊，亲独伊！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小独伊：

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我的病快要好，过三个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时要看你，一定来看你。我的小独伊。再见再见。

好爸爸 (Xo Nana)

二月十四日

独伊：



140 / 瞿秋白自传

我画一个你，你在笑，为什么笑呢？因为你想着，你是好爸爸和好妈妈两人生出来的。

（下面是瞿秋白为独伊画的相）

独伊：

你为什么要哭？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好爸爸

（下面是瞿秋白画自己在滑雪）

## 第六章 朋友们



### 一、致胡适

(1923 年 7 月 30 日)

适之先生：

前日寄上两本书（《新青年》及《前锋》），想来已经收到了，……先生暇时，还请赐以批评。

我从烟霞洞与先生别后，留西湖上还有七八日；虽然这是对于“西子”留恋，而家事牵绊亦是一种原因。自从回国之后，东奔西走，“家里”捉不住我，直到最近回到“故乡”，就不了了。一“家”伯叔姑婶兄弟姊妹都引颈而望，好像巢中雏燕似的，殊不知衔泥结草来去飞翔的辛苦。“大家”看着这种“外国回来的人”，不知道当做什么，……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

死。先生以为这并不是仅仅我个人的事，而是现在社会问题中之一吗？——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

到上海也已有十天，单为着琐事忙碌。商务<sup>①</sup>方面，却因先生之嘱，已经答应我：“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贡献于社会的東西可以精密谨慎些。无奈此等入款“远不济近”，又未必够“家”里的用，因此我又就了上海大学<sup>②</sup>的教务，——其实薪俸是极薄的，取其按时可以“伸手”罢了。

虽然如此，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sup>③</sup>。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要谈起的。我们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我以一个青年浅学，又是病体，要担任学术的译著和上大教务两种重任，自己很担心的，请先生常常指教。  
谨祝  
康健精进。

瞿秋白

---

① 指商务印书馆。

② 中国共产党设立的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校。

③ 即俞平伯。

## 二、致鲍罗廷<sup>①</sup>

(1924年4月5日)

亲爱的鲍罗廷同志：

我早就应给你写信，但因忙于各种工作，一直没能写成。

国民党的工作在上海进行得一般。一些事情完成了，还有些事情已经订了计划。上海执行部已经组织了一些地区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底下将组织“民众扫盲学校”。为了这项工作已经动员了一些大学生。这种学校将成为国民党与人民群众进行联系的中心。除了那些将使用地区委员会房屋的学校外，还计划为工人开办一些学校，设在暂时还没有国民党区委的工人住宅区里。工会运动与合作运动将在这样的学校中打下组织基础。所有这一切现在还只是在筹划之中。

不久前在一家纺织厂发生了一场火灾。为此工农部与妇女青年部和其他群众团体一起提供了“劳动保险”的要求，并在《民国日报》上写了一些反对资本家和地方政府的文章。在电车工人与电车公司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工人部派了人去，但事情正在拖延，看来工人们不会取胜。所有这些工作都有“我们的”同志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都有自己的国民党工作委员会。

---

① 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顾问，苏联政府驻广州国民政府代表。

宣言<sup>①</sup>已经重印并且散发到各区和各小区。但在一次执行部会议上许多人攻击廖<sup>②</sup>，说他擅自在宣言上加了几条（这指的是宣言中关于军队的一部分和关于租界及土匪的一些条目）。

在那次会议上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向中央和孙<sup>③</sup>提出质询，要求他们把关于军队的部分从宣言中分出作为另外一个决议，并删去宣言中关于租界与土匪的条目。他们认为，关于租界与土匪的条目非但不是代表大会通过的，甚至没有向代表大会提出过，无论是中央还是孙，都没有权利增加内容。根据党章，孙对代表大会只有“否决权”，所以，假如孙认为关于租界与土匪的条目是必要的，那么，他应把这一点提交下届代表大会，而他增加这一条目是在本届代表大会之后，所以是不合法的。“谁怂恿孙这样做，谁就要在党面前冒败坏他（指孙）的名誉的风险。”——胡汉民是这样说的。关于承认苏俄的问题也引起了误会。

上海报刊一般都说加拉罕<sup>④</sup>不同意从蒙古撤兵，是继续实行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我们的同志在《民国日报》的“书报评论”栏写了反对这种观点的文章。尔后，在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工作的国民党员（我们的同志）发表声明支持承认苏俄。恰好此时一则电讯报道了孙中山给鲍罗廷的答复，孙说，在中国民众和中国的革命党取

---

① 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② 即廖仲恺，国民党左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

③ 即孙中山。

④ 苏联外交家。

得胜利之前，俄国不应与非法的、未得到民众承认的北京政府来往。张继给执行部写信说，孙对承认苏俄问题的立场就是这样的，而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和《民国日报》的“书报评论”则承认北京政府，说北京政府应该承认苏俄。除此以外，张继还写道：在我们的敌人写的关于蒙古问题的文章中也有一些正确之处。

所以，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与《民国日报》“书报评论”的观点同“党的”立场是互相矛盾的。在执行部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时胡汉民陷入了非常为难的境地，他又为我们的同志辩护，又不想指责张继和右翼分子（谢持和茅祖权）。

您与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是否确有这样一封电报？目前上海执行部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国民党应该宣传承认苏维埃俄国，但应该由民众和南方政府，而不是由北京政府来承认，我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错误的。

至于《民国日报》，机器已经定妥，一个月以后，报纸将用新机器印刷。四月一日出了一期关于国民党改组的专刊。决定报纸每周六出一次副刊“书报评论”，由我们的同志编辑（用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的名义）。

您何时到达这里？

您的夫人已经来了。

祝一切顺利。

您的 瞿秋白

（1924年2月12日）

亲爱的鲍同志：

二月七日我才到上海。当天即见到维尔德（Billett）

同志<sup>1</sup>，并将信件交给他了。但是到达上海后我就病了，躺了两天，所以至今还没来得及把所有情况了解到。不过我还是将大会<sup>2</sup>情况报告了共产党中央，中央对大会深表满意。

至于国民党在上海的工作，则一切如故。看来，只要不建立上海执行部，工作就开展不起来。

我到《民国日报》编辑部去过几次。但汪精卫和胡汉民尚未到来，因而许多问题无法解决。我们估计，“改组”的第一期大约三月一日才能出刊。而改组的技术工作已大致就绪。大会材料这几天在《民国日报》上刊载。

需要制订上海大学党的工作的计划，找到教“政治常识”课的教员，还有其他一些事。但我还不能多走动，外出对我是不利的，因为我还怕受风。所以我决定从明天起试试在家里翻译大会的材料，其他需要我在上海各处奔走的工作暂时放一放。

您和汪精卫、胡汉民何时到达？工作正等待您和你们来处理呢。

我尚未能见到您的孩子们，不过我听说他们都很健康，并经常给您写信。

我在五天前就想给您写信了，但因病未动笔。请原谅！

祝好！并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衷心为您的 瞿秋白

---

<sup>1</sup>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sup>2</sup> 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叶<sup>①</sup>和邵<sup>②</sup>告诉我说，我们只有先了解到有多少钱可由我们支配以后，才能去订购印报机器、改组编辑部和聘请新的人员。

向您夫人、K 同志及其他各位俄国同志致意。

(1924 年 5 月 6 日)

鲍罗廷同志：

我又有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因为维经斯基同志<sup>③</sup>来了，在他的参加下，我党中央不断地开会。不久要召开党中央全会，我们期待您的到来。全会上将讨论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很有成效，虽然还不太活跃。我们多次提议组织群众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但部分地由于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基础不够强，部分地因为领导人害怕群众性的行动，我们的提议没有被采纳。不过我们还是争取到开展“一周运动”（从五月一日到九日）。这次运动表现在：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汪精卫等）五月一日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五月四日（学生运动纪念日）组织了纪念大会，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五月九日还将召开一次规模很大的群众集会。还应该争取在这一天（五月九日）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表一篇宣言，阐明国民党纲领的对处政策。如果领导人不同意，我们就不经过他们，自己采取行动（当然，不能授他们以口实

---

① 即叶楚伦，当时任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

② 即邵力子，国民党左派，当时主持《民国日报》，后任总编辑。

③ 当时任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



来责备我们违反纪律)。此外,我们正在《民国日报》上加紧反帝宣传:

一、已出版:

1. “五一”专刊;
2. “五四”专刊;
3. 将出“五九”专刊。

二、正在撰写好几篇反帝国主义的文章:

1. “揭露华盛顿会议”(陈独秀同志);
2. “对《字林西报》一篇文章的回答”,由维经斯基执笔,由我署名;
3. “关税问题”(瞿秋白);
4. “列强侵略行为一览”(恽<sup>①</sup>);
5. “治外法权”(申同志),等等。

《民国日报》稍见“起色”。左派对我们很友善。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时,我们在上海大学组织了一次纪念会,汪精卫在会上发表演说,声称国民党同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云云。

但另一方面,右派似乎在有组织地活动。上海报纸上登载过一个国民党员致国民党中央的几封信,抗议在代表大会<sup>②</sup>上通过的宣言中增加了几个新的段落。这种说法在新闻报道中也出现过,甚至提到了您的名字,说是“鲍罗廷强迫孙中山把这些东西加进去的”。此外,我们收到了广州的报纸,其中有一张报上说,《民国日报》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报纸了,因为它在俄中谈判时“维护

---

① 即恽代英。

② 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俄国人的利益”。还说这是由于瞿秋白参加了编辑部，同时这张报纸把我叫做“俄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执行委员”。

这些都表明，右派正在进行有计划的煽动，不仅是反对我们，而且也反对国民党左派。

新机器已经运进《民国日报》报馆，但还不能立即使用，因为电线还没有装好，不过这只是几天的事情。

购买机器的钱已经收到。但每月的经费（四月份，三千元），因为没有您的命令，还没有发来。廖仲恺给我们写信说，他已经同您谈妥，每月经费今后在上海按时发给，所以编辑部就无需每次向广州查询。编辑部同人期待着您的答复。

您什么时候来这里？

您的 瞿秋白

（1924年6月20日）

鲍罗廷同志：

您临行前同叶<sup>①</sup>谈过，他告诉您，在国民党员内部没有任何分歧。不过正如您所知道的，这纯属“中国式的客套”。事实上，右派早已开始准备公开反共反俄。有个叫周颂西（上海大学教员）的，是区分部书记。有一次他叫学生用英语作文，出的题是“苏俄是国民党的敌人，因为它和北京政府签订了协议”。在会上（还是这个上海大学的区分部会议），共产党员向他提问，他答复道：广州的《民国日报》——关于这个报纸您也曾对我们提

---

① 即叶楚傖。

起过——就是这样写的，该报就在孙中山本人所在地的广州出版，可见孙中山是支持这种看法的。总之，在上海国民党员（右派）中，这种看法很普遍。

您大概还记得，叶曾经问过您，俄中协议中有关宣传的条款是否同国民党的工作有关系。今天，我们在上海报纸上读到，张继和于右任向孙建议，正是根据这一条（协议第六条）同俄国断绝关系。这一切都使我们懂得了，以张断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正在上海和广州进行一定的准备，以便同共产党人决裂。根据报纸消息，孙答复张继说，此问题待您返广州后解决。

关于孙本人实际上持何看法，我党中央需要尽快了解到，陈同志<sup>①</sup>请您告知。

从本月十四日开始，上海丝绸业女工开始罢工。现在已有六千人参加，包括十四个工厂。我们向国民党建议散发传单，支援罢工工人。国民党拒绝了。叶仅仅同意在《民国日报》上刊登我们的一篇文章。

这次罢工是自发的，我们（共产党）过去和这些工人几乎毫无联系。不过，在罢工开始后的第四天，我们和几个女工代表联系上了，组织了一个行动委员会，由党中央领导，这个委员会将领导这次罢工，并帮助女工组织工会。罢工工人提出如下要求：一，将每日工资提高到四角五分（过去是三角八分到四角）；二，将劳动时间缩减到每天十小时（过去是十二小时）；三，承认组织工会权。由于罢工开始时有九人被捕，所以第四点要求是释放被捕工人。目前，获胜的希望还很小，但是女工

---

① 即陈独秀。

们表现得很坚决，我们在这次运动中也许会有所收获。只是由于我们动手晚了些，可能在我们还未把工人组织好以前，资本家就把罢工给破坏了。“新办的”周刊（您和陈同志谈到过它）的概算，党中央已经制订出来。

开办费：

1. 房租和照明	二百美元
2. 购置家具	二百美元
3. 刊登广告	一百美元
4. 其它支出	五十美元
	合计：五百五十美元

固定开支（以月计）：

1. 纸张和印刷费 （每月四期，每期五千份）	二百八十美元
2. 邮资	二十美元
3. 订报纸杂志	六十美元
4. 房租	五十美元
5. 编辑工资（一个主编，两个助手）	一百八十美元
6. 稿酬	一百二十美元
7. 特派记者（驻北京、广州、汉口）	一百八十美元
8. 一般记者	五十美元
9. 职员工资（三人）	一百十五美元
10. 照明	五美元
11. 其它支出	二十美元
	合计：一千零八十美元

收入暂时难以确定，不过，既然此周刊不能刊登广告，所以收入有限。

总之，按上述概算，每月需一千美元。

至于将为我们的各种机关刊物服务的情报室，中央

认为有必要和图书馆一并建立。情报室将翻译（中译外和外译中）各种资料和必要的书籍。中央制订了这个室的概算。

开办费：

1. 房租	一百美元
2. 家具	一百美元
	<hr/>
	合计：二百美元

每月固定支出：

1. 房租	三十美元
2. 翻译人员工资	二百八十美元
	五十美元
3. 购书和办公用品	<hr/>
	合计：三百六十美元

请您对这两个概算作出答复，以便为创办周刊和情报室开始作准备。

您的 瞿秋白

（1924年6月26日）

鲍罗廷同志：

您的信都已收到。然而，信被烧掉了，内容也就不得而知。我们深感不安。如果您不是很快就要到来的话，那就请再写一封信来。

刘清扬问题，党中央已圆满解决。至于派女大学生赴俄问题，关键在于经费，因为她们必须自费前往。可能不超过五个人。

瞿秋白

（1924年）

鲍罗廷同志：

您收到我的第一封信了吗?有人从广州写信给我们,谈到在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上张继和廖仲恺在众所周知的问题上发生争论。同时,根据上海各报的消息,广州出现了一个组织(大概由右派国民党分子组成),它的名称是什么“国家意识宣传组”。它给苏联政府发电报,对俄中协议表示抗议。关于这个组织,您在广州听到什么消息没有?说真的,我们这里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我党中央暗示将提出我方“派别”的合法化问题,说得确切些,就是在国民党内形成左翼派别。不过,需要得到您那儿的情报。

上海女工的罢工昨天结束了,她们取得了很小的胜利:工资提高一分钱,资本家承认工会(被捕工人也获释了)。如果不是有一批工人和一些在他们与官僚们之间联络的“外人”插手并阻碍我们进行宣传,那胜利会大得多。

戴季陶突然返回上海。我们估计他离开广州,是由于共产党人和右派的相互关系问题,但他对这一问题什么也没说,也不愿说。他问我能否和他一起去俄国,说孙中山想派他去俄国,作为党和广东政府的代表。我党中央当然不让我去,不过这是另外一码事。我们只想知道,您对国民党派代表或代表团赴俄问题的意见如何,孙在这个问题上有何打算。

请您复信。

您的 瞿秋白

请向您的夫人致意。

(1924年7月14日)

鲍罗廷同志：

如果不是苏加克（CyraK）同志到北京去，因而使发往广州的信件延误很久，我这些信件早就寄给您了。

我正准备过几天（过一个星期）到广州去，但是根据中央的决定，我必须等待广州即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电报来邀请我去广州并正式通知任命以后才能去。

最近上海匪徒猖獗。帝国主义“市政府”<sup>①</sup>主张厉行体罚，以震慑盗匪。中国舆论表示反对。我们通过自己的机关报刊和《民国日报》进行宣传鼓动。我们还展开反对“上海外事委员”的运动，因为此人拖延俄领事馆向苏联代表办理移交事宜。

国民党在上海的活动沉寂了——戴季陶返故乡去了。党部<sup>②</sup>工作马马虎虎；然而右派在加强准备，蠢蠢欲动；以国民党党员个人名义或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声明反对共产党的信件颇为不少，我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予以反击。

其它种种，我们大概可以而谈了。

您的 瞿秋白

（1924年10月8日）

鲍罗廷同志：

寄上中共中央关于国民革命策略的决议及关于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些问题上您同中共中央之间有某种程度上的原则性分歧。因此中央决

① 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

② 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定：“召请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如果鲍罗廷同志认为这是必需的而且他做得到的话。”中央嘱我将上述决定通知您，请您尽快答复。

《民国日报》必须彻底改造。您是否已经同中派及孙本人谈过？中央已决定自十月中起停止付款。因而报纸可能在十月二十日前就会停办，如果叶自己不能从右派处筹得经费的话。

叶起劲对我们说：“人员可以更换，但是报纸应该保留。”在我来之前，我们在报社工作的一位同志就告诉过叶说，很快就会没有钱了。因此他早就知道，“俄国人”注视着这张报纸，而且对它并不满意。此外，叶心里很明白，共产党人是不喜欢他的。陈同志把邵请来，请他转告叶，如果他同意退出《民国日报》，则经费可以继续拨付，否则陈同志拒绝协助。邵和我把这个意思转告了叶，叶回答说：我即将去广州，如果国民党中央给我规定这样一条办报路线（表示很鲜明的政治含义的），我就无能为力了，只好退出，眼下还请你们多加协助，使我能为报纸多少领到一点钱，否则报馆很快就要关门了。他同时又说：“为什么国民党中央同《民国日报》并无分歧，而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却对该报啧有烦言？”我回答说，国民党中央不久前有过决议，认为报纸的文章不符合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他默然无语。这些我都向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决定请求自十月中（十五日）起停发经费。此外，中央请您尽快在广州解决问题，请提出新编委名单并取得中派的答复。如果说“可以”，就付给经费；如果说“不行”，就永远停止拨付。目前维尔德同志



(Вилъд) 已经不再付款，他和我一起等着您的消息。

上海正在进行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我们将在大学里和许多工人学校里举行集合，纪念辛亥革命。

您的 瞿秋白

随信附上陈独秀同志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国民党的政策》。又及。

(1924年10月21日)

鲍罗廷同志：

大概已经十天没写信了，只是从报纸上了解到广州事变<sup>①</sup>的大概情况：商团军已被解除武装，工人方面牺牲不少，等等。今后情况会怎样呢？……

上海也发生了不小的事件，而且就在广州商人开始罢市的同一天，即十月十日。

在十月十日中国革命纪念日以前，某些国民党右派分子（童理璋和喻育之）受卢永祥指使，准备召开“国民”集会。这个消息传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那里有“我们的人”工作）以后，宣传部制定了行动计划，准备了传单，但是上海执行部书记叶某<sup>②</sup>将此事“束之高阁”，使右派可以为所欲为。

于是反革命派在双十节召开了大会，会上他们殴打了左派国民党人（包括共产党员），原因是：有人发言反

---

① 指广州商团叛乱事件。

② 即叶楚傖。

对一切军阀和一切帝国主义者，有人为这样的发言鼓掌，有人嘲笑了一个称卢永祥为“正义斗士”的发言者。共青团员黄仁——上海大学的学生——受重伤，翌日死亡。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的一位同志作为全国学联的代表发言反对帝国主义，大会主席团成员董理璋和喻育之上去把他抱住，强迫他停止讲话，由于这个信号立刻出现了大批“职业流氓”。他们向所有为发言人鼓掌和后来去援救发言人的人们大打出手。有三个人从七尺高的讲台上被推下来摔伤。警察只逮捕了挨打的人，却把打人的人放跑了。后来几经交涉，被捕者才在几小时以后获释。

于是上海大学国民党区分部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一，请上海执行部将章理璋和喻育之开除出党；二，责令上海大学讲师何世桢——上海右派首领之一，在打手打人时他未采取任何行动帮助左派——作出书面说明，解释他为什么不援救被打人；三，抚恤死者家属。

叶只接受第三点要求，前两项要求是上海执行部开会时接受的。但通过决定后，叶突然声明，他认为有必要把开除董和喻的决定的公布时间推迟一天。但是与会者一致反对，认为他们的叛卖行径证据充分，应该开除出党。于是叶便回家“睡觉”去了，同时却给《民国日报》编辑部送去一个纸条，说他已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打电报要求辞职。这样我们便掌握了《民国日报》，让邵<sup>①</sup>工作到现在。

上海大学那个姓何的讲师纠集了他的几个学生反对

---

<sup>①</sup> 即邵力子。

我，反对一切左派，在我的名字上冠以“上海共产党首领”的称号。校长于右任这次很同情我们，在执行部他也坚决主张开除童、喻二人，所以在大学里，尽管何世桢及其同伙几个英文教员罢教，于右任宣布：如果何和那几个教员（教英语的）继续罢教，他就另请别人来教。这次共产党和共青团各支部工作得很努力，现在仍在作工作。

目前，上海执行部没有一个负责人员，必须立即派廖仲恺或汪精卫来。

《民国日报》新的编委会名单必须尽快呈送孙中山，否则我方在该报的威信将丧失，叶某一回来，该报就会完全成为右派报纸。

您的 瞿秋白

于右任请您以私人方式借给他一万或八千元，作为上海大学经费，因为中央没有按照预算给他资金，他只好个人负债。如没有这些钱，则大学在右派的打击下必将解体。他保证在明年内归还（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又及。

瞿

### 三、致郭质生<sup>①</sup>

(1931年2月7日)

质生兄：

许久不看见你了，时常想念您。我回来了之后，已经过了将近半年，因为病和忙，始终没有功夫写信给你。现在我病得更利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功夫。

我很希望能够和你常通信（通信方法附在下边）。

你现在好么？关于汉文的著作又有些新的么？你夫人和小孩子怎样？恭祝你们幸福。

现在我寄上一本读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这是依照政府公布的拼音方式编的，比我们的方式繁难复杂得多。这是完全的北京方言——因为政府的新方式，把以前注音字母的拼法有些改变：就是ㄌ和ㄣ混合只用ㄣ（ㄣㄣ亦是这样）。把ㄌㄣ废去，只用ㄣㄣ等等。你可以用做参考的材料。我以为普通话仍旧要保存，发展，方言同时要制造拼音方法——让他们“并存”，将来废除汉字之后，中国一定要有一个时期是“多种言语文字的”国家。至于四声的分别拼法，实在是非常之困难，这本书可以做一个例子。

我本想多寄几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半个

---

① 苏联汉学家。

月后，可以有法想：我将要时常寄国语的文学的小说杂志等等给你。

我请求你的事，是要你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Языковедение）的一般书籍，再则，新出的以及旧的（如 Горький А. Толстой<sup>①</sup> 等。再 Романгазета 亦要的<sup>②</sup>）文学，小说，以及杂论。这件事情，我千万的拜托，费神费神。如果你能够常常寄来，那真是不胜“感激之至”了！等候你的回信。

谨致 最好的敬礼

史 继（以后用赖汉哥）

通信方法：

先寄天津：“Mr B. Rachlin, 5 H Rue Henry Bourgeois, Tientsin, China” 函内说明（须用英文）请换用信封，代寄上海：Mr. La Han, Book shop Shankiang Shudien (Beside Chung Hwa Press Co) Fuchow Road. Shanghai

此两地址，请勿告诉任何人，至嘱。

（1931年3月12日）

亲爱的弗谢伏罗德<sup>③</sup>！

一个半月以前写了信给你，一直等待回信，但至今没有收到。也许是地址写错了？你生活得好么？我的妻

① 即高尔基、阿·托尔斯泰。

② 即《小说杂志》。

③ 郭质生俄文名字的音译。

子常常想念你们和你们的孩子。我们这里的生活非常寂寞。尽管中国有过自己的“Renaissance”（“文艺复兴”），但几乎还没有自己的作家和美术家。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的只是马路文学或用上海话来说“Semolae wenhio”<sup>①</sup>因此，再次三跪九叩首<sup>②</sup>地请求你经常寄我一些俄文书籍：小说，短篇小说，新的或是旧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还要各种文艺杂志（哪怕是《小说报》<sup>③</sup>等等也好），以及有关阿拉伯文拉丁化的材料。再则，你能否马上就给我找一找：1. 中国短篇小说（发表在《小说报》上的）；2. 克鲁普斯卡娅<sup>④</sup>的回忆录；3. A. 托尔斯泰的《三姐妹》<sup>⑤</sup>和《一九一八》；4. 几种新期刊。再三地拜托你。

你收到我们的邮件没有？一次——《国语罗马字读本》；另一次——《小说月报》四本。在这封信里，附上刊登在《申报》上的有关成立“中国语言文字学会”报道的摘录。倘若你有兴趣以你本人或某个团体的名义和这个学会联系，那么我就可以通过你提出我们主张的方案，用它来批判南京官方的草案<sup>⑥</sup>。等候你的回信。紧握手。

问候你的夫人，我的妻子问你好。

---

① 四马路文学——作者原注。

② 黑线系原件所有。

③ 即《小说杂志》。

④ 列宁的夫人。

⑤ 即《两姊妹》，系阿·托尔斯泰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⑥ 指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颁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 瞿 秋 白

再：有一封信，请你转寄给我们的女儿，地址另开。  
请你马上寄两三本我著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草案》<sup>①</sup> 给我。又及。

寄信寄书处——直接寄：上海四马路东华里（中华书局隔壁）申江书店转李文芳女士收启（前信所说办法取消）。

---

① 该书 1930 年出版于莫斯科。

## 第七章 最后的日子



### 一、多余的话

(1935年5月17—22日)

“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

####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一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 秋 白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

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

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当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想望着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

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罢，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所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得

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得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刚满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算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

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最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病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智昏瞶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炼啊！

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甫还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米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翻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



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分开的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至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的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久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我想，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只有拒绝用脑的一个办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

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结束了罢。

##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

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过一道，作为预备。其他，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折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一九三〇），那是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

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是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的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幼稚的论著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虽然在国际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智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觉得反而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智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的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

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有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Stop。

###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更进一步的关口,自党的或者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武汉分共之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一九二七),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

然，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则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的；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的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念，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

有发觉这些观点的严重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的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的任务之中，最重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之间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抑制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之后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的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



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保持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觉得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的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工作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可以这样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员。我呢，像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研究——到这时候才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可以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光阴。一

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却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罢。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一些，说“奋斗”是实在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

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使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但是也会改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些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智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那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智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会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连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还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面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为甚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会总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它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板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像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了几个代

数难题似的，虽则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智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智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候，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是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那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

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言语”，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用力。书是乱七八糟看了一些，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这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一个“读者”。

讲到我只有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如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本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 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的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做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因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做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

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

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的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弱，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平，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院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的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于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得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终于是闭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sup>①</sup>，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

① 《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今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副标题为《四十年》；《鲁定》，今译《罗亭》；《安娜·卡里宁娜》，今译《安娜·卡列尼娜》。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二

## 记忆中的日期

——附 录

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	生于常州
一九〇二	入私塾
一九〇五	入常州冠英小学
一九〇八冬	初等小学毕业
一九〇九春	入常州中学
一九一五夏	因贫辍学
一九一六 二月	母亲死
二月	赴无锡南郊某小学任校长
	是年父亲赴济南，弟妹分散
八月	辞无锡教职返常州
十二月	抵汉口考武昌外国语专修学校
一九一七 四月	在北京应普通文官考试未取
九月	入俄文专修馆
一九一九 一月	与耿济之、瞿世英等组织《新社会》杂志
五月	任俄专学生会代表
一九二〇 八月	应北京《晨报》聘起程赴俄任通信员

## 第七章 最后的日子 / 193

一九二一	一月	方抵莫斯科
	五月	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
	九月	任东大翻译始正式入党
一九二三	一月底	返国抵北平
	七月	参加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九月	返沪任上海大学教职
		是年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四	一月	与王剑虹结婚
	一月	赴粤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七月	剑虹死，赴粤
	十一月七日	与杨之华结婚于沪
	一九二五 一月	参加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被举为中委
一九二七	二月	写批评彭述之的小册子
	三月	赴武汉
	四月	参加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仍任中委
	七月	（宣言退出国民党）赴庐山
	八月七日	参加“八七”紧急会议后实际主持政治局
	一九二八 四月三十日	离沪出国
一九二八	六月	参加共产党六次大会仍任中委
		留莫为中国共产党代表
	一九三〇 六月	撤销驻莫代表职
一九三〇	七月	起程返国仍在政治局工作
	九月	参加共产党三中全会

一九三一	一月七日	参加共产党四中全会被开除政治局委员之职请病假
一九三二	秋	病危几死
一九三四	二月五日	抵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员
一九三五	二月十一日	离瑞金
	二月二十三	抵福建汀州之水口被钟绍葵团俘
	二十六	入上杭县监
	五月九日	解到汀州三十六师师部

## 二、“供词”<sup>①</sup>

(1935年5月13日)

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例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

---

① 此为瞿秋白在长汀狱中所写的“供词”（摘录）。

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

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的收集粮食（有借农民的谷子，有农民自己节省来捐助的谷子，有按时交纳土地税的谷子）也完成了。

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切城市和圩场，乡村中的生活就一天的苦起来，因为有油的地方运不出，没油的地方买不到，……等等。生活一般的说，是很苦的，并没有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立刻创造“地上的天堂”。这区域原来就是很贫瘠的，何况要应付这样严重的战争和封锁，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呵！

自然，革命和战争难免杀人，这种肃反的工作做得“过火”，或是错误，就会引起一种民众的恐慌和反感。可是，在我到苏区的这一年中，早已没有这种现象。……正是共产党中央迅速纠正了他们，……在中央的决定之



中，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多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小孩子都要杀”的事情。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也绝对不是杀尽地主的意思。……我在苏区没有亲眼见着“杀得满地是尸首”的现象，也许我的“见闻不太广”。

到了苏区，使我更加感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党，同以前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如李立三）领导的时候比较起来，大不同了，工人干部也多了，工作方式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等等的能力也强多了。

总之，在政策方面，我虽然不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不担负着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责任，可是，以我在苏区一年的感觉而论，觉得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没有什么错误。

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我是不写的。我不会随声附和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 三、狱中诗词（7首）

#### 狱中题照<sup>①</sup>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  
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  
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 浣溪沙

廿载浮沉万事空，  
年华似水水流东，  
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  
江城辜负落花风，

---

① 此系作者1935年于福建汀州狱中赠给军医陈炎冰照片上的题词。题目为原编者所加。

黄昏已近夕阳红。

### 卜 算 子

寂寞此人间，  
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  
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 梦 回

山城细雨作春寒，  
料峭孤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寂后，  
偏留绮思绕云山。

### 无题：

斩断尘缘尽六根，  
自家且了自家身。  
欲知治国平天下，  
原有英雄大圣人。

## 第七章 最后的日子 / 199

## 忆内（集唐）：

夜思千重恋旧游，  
他生未卜此生休。  
行人莫问当年事，  
海燕飞时独倚楼。

## 偶成（集唐）：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天、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天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天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 四、致郭沫若

沫若：

多年没有通音问了。三四年来只在报纸杂志上偶然得知你的消息，记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闻纸上曾经说起

西园寺公去看你，还登载了你和你孩子的照相。新闻记者的好奇是往往有点出奇的，其实还不是为着“哄动”观众。可怜的我们，有点像马戏院里野兽。最近，你也一定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新闻，甚至我的小影，想来彼此有点同感吧？

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我停止了一切种种斗争，在这等着“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足足有四年半了——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虽然是因为“积积成疾”病得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已有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的衰退甚至于渐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我早就“猜到了”我自己毕竟不是一个“战士”，无论在那一战线上。

这期间看见了你的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像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也终于禁不起了。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

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

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文学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社会科学的论著现在已经不用我操心了）。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

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廿八，汀州狱中，

## 五、未成稿目录（民二十四年夏汀州狱中）<sup>①</sup>

《读者言》：1. “五凤姐”。2. 张飞与李逵。3. 安公子。4. 野叟曝言主义。5. “阿Q”。6. “阿Q”以后。7. 酒瓶问题。8. “不成话”。9. 古汉文。10. 翻译。

《痕迹》：1. 环溪。2. 大红名片。3. 父亲的画。4. 娘娘。5. 宁姐（以上《家乡》）。6. 黄先生。7. 出卖真理（以上《北平》）。8. “俄乡”。9. 郭质生（以上《第一次赴俄》）。10. 丁玲和他。11. “生命的伴侣”。12. 独伊。13. 误会（以上《上海》）。14. 蓝布袍子。15. 庐山（以

---

① 此为秋白同志拟写的作品目录，从题目看，涉及他一生各个时期的大事和重要人物。

上《武汉》)。16. 忆太雷(以上《一九二七年年底》)。18. “老爷”。19. 忆景白。20. 面包问题。21. 夜工(以上《第二次赴俄》)。22. 油干火尽时。23. “做戏”(以上《退养时期》)。24. 那松林的“河岸”。25. 真君潭(雪峰)。26. 只管唱, 不管认。27. 淡淡的象(以上《苏区》)。28. 逃! 29. 饿的研究。30. 不懂的(以上《上杭》)。31. 得其放心矣(《汀州》)。

(按: 原抄件无 17。)

# 附录



## 一、忆秋白<sup>①</sup>

—

我和秋白是在上海大学认识的。

一九二三年年底，我去报考上海大学。考试的地址在庆云路庆云里。我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走进一座破旧的老式的里弄房子，只见男男女女的学生挤得满满的。我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年轻和藹的姑娘——她就是张琴秋同志。在这些学生当中，后

---

<sup>①</sup> 作者杨之华，原载《红旗飘飘》第八集。



来有不少都成为我们亲密的同志和战友。

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到来了。从此开始了紧张的政治斗争的生活。上海大学共分三个系：社会学系、中文系和英文学系。我在社会学系学习。我很喜欢这个新环境，这里面的一些人给予我不可磨灭的印象。邓中夏同志是我们的总务长，他的头发很黑，眉毛浓而长，眉心很宽。当他抬起头来看人的时候，两眼闪闪有光。他精神饱满，做事机智果断，使学校的生活紧张而有秩序。他常常喜欢讲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故事给我们听。他是我们敬爱的一位有魄力、有毅力的革命者。

在教师中间，有轻松愉快的张太雷同志，他教我们政治课；有循规蹈矩的蔡和森同志，他讲私有财产和家族制度之起源。恽代英和萧楚女同志讲话富有煽动性，对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并且善诙谐，常常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新同学都爱听他们讲课。

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学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萧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当时秋白上课的情况：“在庆云路上海大学旧校址上课时，人都挤满了。房子陈旧，人多了，楼房震动，似乎要塌倒下来，但是人们还是静静的听，一直到下课为止。”……后来上海大学从庆云路搬到西摩路，最大的课堂在敦厚里。

当课堂里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

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和空谈。同学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同学们都很珍重地记下笔记，万一有人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缺了课，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能安心睡觉。

同学们都说秋白讲得好，内容丰富极了。有的说他有天才，有的说他很用功，也有的人根本不去想是什么理由。当时我也不懂，后来才知道了，秋白是怎样对待工作。他热爱他的工作，为党培养新生力量。

那时，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够他忙了，又加上上海大学这一副不轻的担子。在生活上，他偏又碰到了不幸，他的妻子王剑虹病重了。他们夫妇俩感情是很好的，王剑虹在病重的时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边，不要离开她。秋白也很愿意多照顾她。一回到家里，就坐在她的床边，陪伴着她。在他的长方形书桌上，常常整齐地放着很多参考书，他就在那里埋头编讲义，准备教材或为党报写文章。从王剑虹病重到去世，我们只看出他似乎有些心事重重，与平时不同。但他从没有漏过会或者缺过课，并且仍然讲得那么丰富、生动。这时，我们对于秋白也更加了解了，但是，秋白的身世，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秋白生于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江苏常州市人。他的父亲信道教，长期失业，流浪山东。他的母亲是一个多子女的母亲，在一个破落户的大家庭里，贫困和苦难折磨了她一生，于一九一五年二月间吃虎骨酒和火柴自尽。人们这样责骂她：“把丈夫逼走了，把祖母搬死了，不给儿子中学毕业。”其实丈夫出去找职业，久年疯瘫的祖母搬杭州，和秋白离中学毕业仅半年就去无锡国民小学当校长，这都是因为一家七八口吃尽卖光、典质无物，不这样做就不能再维持生活的缘故。秋白的智慧早被他的母亲发现，她也最爱秋白。她擅诗词，爱文艺，对秋白的教育很注意，亲自讲授诗词；为了秋白进学校便利，她不顾族规，搬住祠堂。秋白有天才，但他的天才与他的母亲是不可分离的。秋白也是最爱和最能体贴他的母亲的。当他一谈到他的母亲的自尽，就沉默很久，回忆当时情景：“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此时饥寒无人管，落得灵前爱子身。”母亲死后，秋白陪灵半年，稀粥难咽，孤苦极了。

秋白自小就用功，张太雷同志是秋白的同学，他常向我们说起秋白在小学、中学都是个优等生。他们当年对时事很关心。辛亥革命时，鼓动同学、练习刀枪，对革命满怀信心。但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反动分子篡夺了，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恶行为，使他们深为痛恨。秋白十四岁那年的双十节，他的故乡——常州县城各学校机关都挂红灯庆祝辛亥革命；而秋白却提了写着“国丧”二字的灯笼。这个故事证明秋白从小就爱国，从小就有见解，有勇气。一九一六年，他的舅母当了当头借给秋白川资到汉口，进武昌外国语学校，后又随堂兄纯白到北京，进

俄文专修馆。热爱祖国的秋白，就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和约的运动中，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下，卷入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集合的示威游行。由于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当时就被推选为俄专出席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当第二次请愿时，全体代表三十余人被捕，秋白也在里面，但在全国学生的要求下获释了。这时候的秋白，正式参加了李大钊同志领导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在北大图书馆，在青年会或在秋白的住所秘密集会，学习和讨论问题。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六日，秋白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离开北京，到苏联去了。这个时期秋白一方面报导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帮助中国同志的学习。一九二二年二月，经张太雷同志介绍，秋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 二

我认识了秋白以后，觉得他和邓中夏、张太雷等同志不同。邓中夏和张太雷等同志精神愉快活泼，学生们很容易接近他们，可以常常和他们谈谈笑笑。而秋白却是严肃沉静。在讲台上，他滔滔不绝，把问题讲得很透彻；在会议上他的口才像快刀利刃，能说服人。但在平时，他不肯多讲一句废话。有人说，秋白是“骄傲的”、“冷酷的”。

不久，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对他的初次印象。

在上海大学，我和其他进步同学一样，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当时还是国共合作的时期，我被分配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工作，办公地址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在那里，我认识了向警予同志，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工作。有一天，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大学支部转给我一张上级的通知，说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一些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指定我去谈谈。那时，向警予同志因事离开上海了，所以只得我去。我深怕自己讲不好，怀着不安的心情到鲍罗廷家去。

在鲍罗廷家中，出乎意外地遇见了秋白，他是来为我做翻译的。一见了他，我觉得有了帮助，心情开始平静下来。秋白以流利的俄语和鲍罗廷夫妇谈着，他们向他提出许多问题，他翻译给我听，并且教我说：“你先把这些问题记下，想一想。”大家都以同志的态度随便座谈，我的拘束也逐渐消失了，后来愈说愈有劲，秋白满意地笑了，把我的话翻译给他们听。接着，他又把鲍罗廷夫人向我介绍苏联妇女生活情况翻译给我听，唯恐我听不懂，又加以详细地解释，使我初步了解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生活的真实情况。

当时懂俄文的人还不多，秋白还给其他许多同志当翻译。这工作在他说来是一件“小”工作，但他从不轻视这类“小”工作，每次都很认真地去。从这次工作接触后，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不但不骄傲，而是很谦虚；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热情。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地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一

九二四年五月五日马克思诞生纪念日，秋白在上海大学的纪念会上，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他与任弼时同志还在大会上热烈地高唱《国际歌》，那种革命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台下的同学们。

在学校里，秋白是一位很有威信的导师，也是党的负责人之一，同学们都愿意把自己的要求、困难或不幸的事情跟秋白谈，取得他的帮助和指导，秋白也经常主动地找学生们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工作以及生活方面的情况。

有一天，秋白对我说：“你要求入党的申请书，我和支部的同志都看过了，我要向警予同志与你面谈，因为我最近很忙，但我也想和你谈一次。”

我又高兴又害怕地说：“我有资格加入共产党吗？你能介绍我入党吗？我知道我的水平很低，对马列主义的理论更生疏，有时你讲的社会科学哲学问题，我听不懂，这是实在的话。”

秋白说：“你是青年团员，已经是党的积极分子，只要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把理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一定能进步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只有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才能领会。书是要读的，但不能脱离实际。你要是读书听课有困难，可以提出来问我，或是问其他同志。向警予同志是最关心你的，她跟我谈过你的情况。”

最后，秋白约我在一个星期日到向警予同志家里谈入党问题。

的确，警予同志是很关心我的。警予同志不是上大的教师，也不是上大的学生，那时候她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是一位很有学问、有本领、有毅力，热爱革命

事业的女政治家。她不讲究穿，不讲究吃，是只知道埋头苦干，以身作则的好共产党员。她不但口才好，文章也写得好，甚至连敌人都得承认她有才干。我和她除了一起工作以外，她还常到我的宿舍里来，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谈工作，谈工人、妇女、学生的各种情况，不断地帮助我，把我当作培养的对象。我很佩服她，尊敬她，希望自己能学她的榜样，作一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勤务员。

星期日上午八时半，我在法租界蒲石路下了电车。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天气，春风温暖了我的心，充满了愉快的感情。我到警予同志家里去过不止一次了，但这一次却格外兴奋和激动。

那时，党的机关没有正规的办公室，蔡和森和向警予同志的家就成为党的活动场所。我从后门进入楼下一个厢房间，很高兴地看到和森和警予同志都在家。和森同志因气管发炎躺在床上看报，警予同志坐在一旁，不高的身材，穿着朴素的短布衫、黑裙子，态度诚恳大方。我很快地告诉她：“秋白约我来谈入党问题。”她站起来说：“早应该这样做。”她开朗地笑了，额上飞舞着一对秀丽的眉毛，雪白整齐的牙齿，从薄薄的嘴唇里露出来了。

这时，秋白走进来了。他很关心和森同志的病况。然后，警予要我谈谈丝厂里罢工的情形。我在旁边坐下，告诉他们说，我到几个罢工工人家里去，他们把我带到“公会”办公室去了。那里很讲究，门外挂着“上海丝厂同业公会”的招牌，会客室里的长桌子上，还铺着白色桌布，桌上摆着很漂亮的茶壶茶碗。后来进来一个胖胖

的约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绸衣服，与工人的褴褛模样恰成明显的对照。工人们见了她，都站了起来，称呼她“穆会长”。这个穆子英是上海滩上的女流氓，显然是资本家雇佣的工贼。而这个“公会”也不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最后，我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今天首要的问题是工人应该有自己的组织。

秋白接着说：“你们的工作应从底下做起，钻到群众里面去，少与这些资本家的走狗打交道；同时要把工贼们的阴谋诡计在群众面前及时揭露，使群众不相信他们，而相信工人群众自己的力量。”

警予同志说：“今天来说，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基础，在妇女们既没有文化，又不懂政治的时候，只好用社会上惯用的结拜姊妹、交朋友的方式进行工作，然后逐步建立工会组织。”

和森同志也指示我们要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并且向我讲了西欧资本家如何以欺骗手段利用工贼来缓和工人的斗争。

当谈到我的人党问题时，秋白对和森同志说：“你身体不好，多休息。”和森同志站起来，他是个高个子，比较瘦。他沉重地呼吸着，走到门口，躺在躺椅上继续看报去了。警予同志那发亮的眼睛在注视着我。秋白抽着香烟，诚恳地说：“我和警予同志都愿意听听你入党的动机。”

我叙述了个人的遭遇，党和团对我的培养、教育，以及我对党的认识和献身党的决心。警予同志是知道我在生活上的挫折的。秋白听完我的话，冷静地分析了我的思想认识，并且解释和阐明了列宁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政



党——共产党的定义。最后，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真理！你要求加入共产党是完全正确的。我愿意介绍你入党。”

警予同志培养我已有半年了，虽然在入党表上没有写着她是介绍人，但实际上她也是我入党的促进者、有力的帮助人。当她听到秋白同志的这几句话，忽然活泼起来，紧紧地拥抱了我。

### 三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天气好极了。清晨，一些同志和我邀秋白到半淞园去散步，打算玩一会儿，再去参加上午十时在天后宫召开的群众大会。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大家一同上了电车。在电车上碰到上海大学的一位同学，他悄悄地通知我们：租界当局勾结国民党右派、无政府主义派，收买了地痞流氓，准备捣乱今天的大会。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当即要秋白回家去，由我们先去看看动静，再打电话告诉他。秋白同意了，下车回家工作去了。

大会刚开始，台下一阵混乱，一声呼啸，只见流氓们跳上台动手打主席团了。上海大学学生会早准备了一批人保护主席团，但仍被有武力的流氓们打伤了好多人，伤势最重的是黄仁同志，我们急忙把受伤的人抢救下来，黄仁同志已经神智不清，失去了知觉了。我们雇了汽车，把受伤者送到宝隆医院里。这时我们又得到消息：反动当局要恐怖手段逮捕共产党员，秋白的处境也很危险。

晚上，支部派我到医院里看黄仁同志，医生告诉我，

他的生命已经无可挽救了。

过了午夜十二时，夜深人静，一间小小的病室里，只有我和黄仁同志两人，他躺在白被下面，一动也不动，我不断替他擦去从鼻孔里，从嘴角里流出来的鲜血，正在这时，突然，秋白出现了。

“他怎样了？”秋白一进门，就急切地问。

我把医生的话告诉了他。

他俯下身来，摸摸黄仁同志的额角，小心地揭开被子，察看受伤的身体，轻轻地呼唤着黄仁同志的名字。但黄仁同志仍然阖着眼，似乎沉沉睡熟，不能答应了。

秋白把两手插在大衣袋里，站直身子，沉思着。最后，他答应我天一亮就把棺木、寿衣送来，他就走了。

黄仁同志的死，使国民党右派和无政府主义派大为高兴，而这时，上海英法巡捕房已下令通缉秋白同志，并且搜查了他的住所慕尔鸣路彬兴里和西摩路上海大学。当时秋白已避难在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同志的家里。巡捕房没有捉到秋白，便把他的《向导》等报刊，和他在苏联节省了自己的白糖换来的俄文书籍搜去，付之一炬。那天巡捕房还带走了在上海大学图书馆值班的学生李炳祥。包探问李炳祥：“瞿秋白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我在书报流通社工作，可不知道瞿秋白是谁，更不知他在哪里。”

秋白的秘密住所是在北四川路底兴业里一号的三层楼的阁楼上，我是经常去和他取得联系的人之一。当我报告说，他的家和学校被搜查，书报被烧毁的消息时，在他的脸上，我看不出一丝慌张的神色，他轻轻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冷静地在桌子周围来回地走着。最后，

他停来说：“书烧了，但是进步的思想是毁灭不了的！”

#### 四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我与秋白结婚了。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美满的。

我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与以前的丈夫有一个女儿，那便是独伊。我的离婚，受到当时人们封建思想的反对，他们把我的孩子当作私有物，不允许我看见我的女儿。我在上海时常想到女儿，不知她生活过得怎样，长的多高了。我渴望着看到她，秋白很能理解这种母亲的心情，他同情我，安慰我，并且在一九二五年的春天，帮助我抽出一个空，回乡下去看孩子。

到达家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独自一人走到过去公婆家里。我过去的公公知道了我的来意，突然沉下脸来，冷酷地说：“我不能让你看她。”并且不再理我了。我痛苦地走出了他的书房，在厨房门口，碰见了他的大姨太太。我们过去关系很好，她听说了我的苦处，便说：“别作声，我带你去。”我们悄悄地穿过几个厅院，大姨太太推开了一间侧屋，在暗淡的油灯光下，我看见了心爱的女儿，她正在玩玩具。我抑制了心中的狂喜，轻轻走到孩子面前，她玩的正是我从上海买回去的玩具呵！孩子天真地对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她那两颗黑黑的眼睛，不住地看着，又拿手上的玩具给我看：“这是妈妈买来的。”

“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

“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

一个在上海死掉了！”

我掉下了眼泪。是那些人欺骗我的女儿，说我死了，但是天真无邪的孩子，看见了我仍然认识我是她的妈妈。幼小的心灵，弄不清这回事，把他想象成两个妈妈了。

我亲了她，但是不得不很快地离开了她。

在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夜里，秋白曾经不安地到火车站来接我，但是没有接到。又过了一天，我才回到了上海，他从我的神色中，已经知道这一次去，并不是很顺利的。秋白懂得母亲心灵上所感到的一切，他比谁都了解我，他想尽一切来安慰我，他把《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讲解给我听。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

不久，又写了一首长诗给我，痛斥了黑暗的旧社会，并且表示：孩子有着光明的前途，我一定爱护她，一定会比她自己的生父更负责任的培养她，教育她，使她将来在社会上发挥她的力量。我感到秋白是如此细腻深刻地了解我，我为他这种无私的爱和高尚的人格所感动，也相信他的话会实现的。

每当我想到我的女儿关在那阴森的风子里，过着完全不适合儿童身心健康的寂寞的生活，我的心就痛得皱缩起来。我一定要孩子回到我的身边，秋白很同意。我们又抽了一个时间，两个人一起回到我的家乡。在我母亲家里，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派人把孩子偷出来，然后

抱回上海。

那天，秋白和我站在一座山上等着。等了好长时间，才看到孩子出来了，大姨太太和照护孩子的人跟随在后边。我高兴地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的两条小胳膊也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正在这时，突然奔来两个大汉，一阵风似地把孩子抢走了。他们走的那么快，谁都追赶不上。我们眼巴巴地望着被抢走的孩子，孩子在大汉的手里挣扎着，哭喊着妈妈。我止不住哭起来了。

我和秋白冷冷清清地从河边走着，一路上默默无语，我第一次也只有这一次看到秋白流下了眼泪……。

## 五

回到上海以后，我不知为什么在工作中增加了干劲和勇气。而秋白由于被敌人所通缉，已经不能公开地到上海大学教课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

我们住的房间很窄，摆了些不可少的家具：床、桌、椅之外，就只有很小的一块空地了。秋白时常就在这一小块空地上打着圈子踱步，或者坐在椅子上深深地吸着烟，有时，他拿起笔来，出神地咬着笔端。这种神情，我已经见惯了，知道这是他正在苦苦思索问题的时候，也就不去惊动他。而他呢？在这样的时候，全神贯注在写作之中，四周的景色、声音已经影响不到他了。秋白写文章的习惯是不打草稿的，在思想成熟后，提笔就写，一动手写，就像瀑布一样地直泻下来，其势不可挡，是那样迅速和猛烈，非一口气把文章写完不可。《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就是在一天一夜内产生的。

那时候，党以上海大学为基础，在上海各区开办了好些工人夜校。这些工人夜校大部分设在有党的支部或国民党左派活动分子的大学、中学内，课室是现成的，教员是义务的。我执行党的指示，也参加了工作。秋白是很关心工人夜校的，他对于工人有着浓厚的感情，常常要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我和上大的同学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是不能解答工人群众提出的问题，就去请教秋白。他虽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时候，也一定停下来答复问题，并且有时指定书本，和帮助收集材料，教给我们有系统有计划地编课本解答工人的问题。

二月初，我们接到上海地委的紧急通知，要我们派人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起来罢工。学校支部派邓中夏、刘华、郭伯和和我等几个人到了潭子湾工人俱乐部，和李立三同志一起工作。我有机会参加工人运动，秋白很是高兴，他最喜欢我穿起工人服装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他说：“我们的爱情就建筑在这里。”每天晚上，他都在等着我回到家里，听我讲述一天的工作情况。刘华同志原来是中华书局的学徒，原名刘剑华，考入上海大学后，还是半工半读。他常做抄写油印工作，生活很艰苦。秋白经常找他谈话，帮助他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关心他的生活，常常要我送些钱给刘华同志用。有一次刘华同志感冒了，还要我买了白松糖浆给他吃。并且经常告诉我：“他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

二月罢工从二月九日持续到月底，由小沙渡的内外棉十一个厂蔓延到同兴、日华及杨树浦的大康等纱厂，罢工人数共四万人左右，我第一次看见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无论在组织纠察队，或者

交代具体任务时，工人们那种爽快、不讲价钱、坚决服从工会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秋白，他说：“你才知道工人阶级中有无数的天才吗？苏联掌握政权的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正在迅速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他接着又说：“的确，工人学习起来比知识分子进步快的多，在斗争中他们是最坚强的。”

这时，日本资本家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关闭工厂，停发工资；日本海军陆战队上岸了，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对马号”开回了上海。小沙渡中国警察奉令武装解散工人的游行队伍，鸣枪轰散工人集会。大批的中国军警和租界巡捕武装围攻手无寸铁的民众，逮捕和拷打工人。敌人的残酷的镇压，使二月罢工没有得到胜利就复工了。

二月罢工失败后，我们在潭子湾召开了工人大会，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工人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十分愤怒。大会正开得轰轰烈烈，突然有大批军警和马队向会场冲来。邓中夏同志一看情况不对，急忙做手势叫正在台上讲话的李立三同志下来。立三同志立刻混杂在群众中，避开了警察。但却有二三十个工人被捕走了。中夏和立三同志躲避在附近一个工人的家里，等警察走了以后，就出来组织工人商量对策。当时工人情绪激昂愤怒，纷纷提出包围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虽然明知道这样做会有不利，但不能拒绝工人的要求。中夏同志提议派代表去，大家一致同意了。在讨论代表人选的时候，立三同志要求去，中夏同志认为认识立三同志的人很多，作为代表不妥当，白色恐怖又很严重，中夏决定自己和工人代表们一起去。果然不出所料，

到了警察局，中夏同志和工人代表们被捕了。

我把这件不幸的消息告诉秋白，他十分焦急不安，在我们住的客堂前楼小小的一角地方踱来踱去，那天晚上通宵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一早，他就叫我化装成家庭妇女，到外面去探听消息。在大街上一家茶馆的门前，我和看热闹的人站在一起，看到一队警察，押着工人代表们走过来了。他们排成一队，带着手铐。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中夏同志，他勇敢而镇定地走着，脸上还浮着从容的微笑，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大无畏的英雄气魄。

这次中夏同志和工人代表们被捕，在群众正义的压力下，不久就被迫释放了。直到这时，日夜焦虑的秋白才放下了心。

“五卅”运动爆发了，秋白接受了党的指示：创办《热血日报》。

《热血日报》社的地址在宝山路某里的一个客堂里。设备很简陋，中间放一张白木长桌，四周摆着几条长板凳。六月四日，《热血日报》创刊号出版了。秋白全力投入这项工作，热爱这项工作，“热血日报”四个字就是他亲笔写的。工人群众提出了很多问题，秋白就在他主编的《热血日报》上每天回答他们的问题。当时天气很热，房间又小，他忙着写社论，编辑新闻，并且亲自编排、校对，直到付印出版。到了晚上，他要听取记者们的汇报，组织他们写稿，还一定要我汇报工人群众的情绪，白天还要向干部们作报告。他的身体非常坏，但他不肯休息，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天明。每当发现了重大的问题，他要亲自找工人谈话，校对材料，然后才把新闻发出去。他



的工作是那样紧张，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兴奋过。他吃饭很快，我们往往在吃饭时相互见面。他说：“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有效得多。”这句话他逢人就说。我也告诉他：“我参加工作，也比在课堂上进步快了。”

有一次，秋白到工人住区去，看见有一个工人在看《商报》，他向秋白诉苦说：“没有适合工人看的报纸，现在的报纸都看不懂。”因此，秋白在编《热血日报》时，文字力求通俗，使工人能够看得懂，喜欢读。《热血日报》的文章篇幅不长，通俗有力，有它特殊的风格，旗帜鲜明，对敌人的批驳毫不留情。

《热血日报》出了二十四期，就被反动当局封闭了。但是，《热血日报》已经在工人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秋白除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还重视在工人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和团员。他常对我说：“我们党内，工人出身的党员太少了，现在面临这样伟大的运动，再不发展，到什么时候发展呢？”他又具体地指导我：“你在工人中要深入地了解他们，具体选择发展党的对象。怎样才是党的对象呢？不要以为能说会讲的就好，马上就和你接近的人就不错，不要看形式，要看他的品质，仔细地观察他是否为大家的利益着想，斗争中是否坚决。要特别注意老工人和技术工人，他们是全厂的钥匙。”

## 六

一九二六年春天，我接到中央同志的委托，要我强迫秋白同志进医院休息，因为他吐血，不顾自己的身体，

带病坚持工作，已经继续两个多月了。当我把中央的命令告诉他的时候，他笑了，深切地感激同志们对他的关心。他对我说：“很想有一个较安静的地方来实现我的心愿——针对当前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问题编译几本值得参考的丛书。”他高兴地拿起一只小提箱，把需要用的参考书、文具等等放在里面。

党为了他的安全，特请了一个可靠的医生，设法在宝隆医院里找了一间单人病房。秋白进了医院之后，我几乎每天去看他一次。在头两个星期中，他完全按照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不起来。但他很想了解社会思想现状，开了一张书单子，要我到四马路上的书摊、书铺里到处寻找。我把他需要的书买来，他一个晚上就读完了。后来，我几乎隔一天上一回书铺或书摊，四马路的小书店成为我很熟悉的场所了。

到了第三个星期，当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仿佛在家里一样，弯着腰坐在椅子上，兴致勃勃地一页一页的写起来了。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还把自己订好的工作计划给我看，对我说：“中国共产党员连我在内，对列宁主义的著作读得太少了，要研究中国当前的革命问题，非读几本书不可。我想将俄国革命运动史分成四部分编译出来……这些都可作为中国革命之参考，非常重要的参考。”

他抚摸着俄文原著，用坚决的口吻说：“如果客观环境允许的话，我必定在最短期间完成这个心愿。”

我看他说的那么高兴，也很赞助他：“这个计划对我们这些知识贫乏的青年有莫大的帮助，我一定尽可能帮助你完成这个计划。”这时，我想起我家有一个善良的对

秋白像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的董妈，就对他说：“不仅我帮助你，还有好董妈很愿意为你尽力的，她善于料理我们的家务，又会节约，熟悉你的生活习惯。”

秋白幸福地微笑了：“对，我们的好董妈常在小菜场上买一束价钱便宜的花，插在花瓶里，或买几个铜板的茴香豆、豆腐干，用一只碟子装着放在我的桌边上，晚上她还削一些荸荠、甘蔗给我吃呢！她确实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也应该很好地关怀她。”

接着，我又劝他：“你的计划回到家里再说。你现在的任务是治疗你的病，同志们不允许你不关心自己的身体。”

秋白凝视着窗外，双手撑在桌子上，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我和彭述之等对革命政策上有不同的观点，我想编译这部俄国革命运动史，对于党内干部会起些帮助作用。农民问题已摆在面前了，因此我先编译这一部分。”秋白在党内的思想斗争中，始终是采取说服人的有效方法来帮助同志。他走到床边，揭开一块白竹布，从小提箱内拿出他在一个星期内写的很整齐的复写成两份的薄纸手稿，把其中的一份交给我带回家。这时，他又恢复了轻松愉快的心情，手指着复写稿笑着说：“这是医治我和我们同志最上等的贵重药品呀！”

从此以后，我每天去医院，都带回他的产品。带回他的手稿是我最愉快的事，也是一桩使我很担心的事情。他写作的速度是使人难以想象的，虽然是带病工作，在两三个星期内已将俄国革命运动史的第一部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编译了三分之二。

秋白从医院里回来，不出所料，更重要的工作打断

了他的计划，只好把编译工作搁下了。八月间，秋白到了广州，在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秋白在讲《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中，指出当时革命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秋白说：“在事实上，谁能代表工农利益，谁能给工农以政权，那末谁就能够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压迫地主，打倒地主势力，才能获得农民群众，革命的基础才能巩固，才能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力。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秋白还在百忙之中，挤时间继续编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终于印成小册子出版了。其余几部分，因为一直忙于其他重要工作，而没有能够完成计划，这是秋白所遗憾的一件事情。

## 七

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上海工人第二次暴动失败了。

那天晚上，秋白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袍子，告诉我今天晚上要开一个中央和区委的联席会议，听听区委同志关于暴动情况的报告。

在这个会议上，大家听了身材魁梧、性格活泼的罗亦农同志和沉静、稳重的赵世炎同志的报告，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研究了工人群众的情况，大家的意见是由总

工会发出复工命令，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那天晚上，秋白睡得很迟，第二天写好了一个给中央的书面意见书——《对上海二月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给特别会议讨论。会议上对暴动问题讨论的很热烈，决定从广东调来两位同志，调周恩来同志加强军事上的指导，调陈延年同志加强江浙区党委的领导。

上海像一座巨大的火山，就要爆发了。英勇的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为了对资产阶级的策略问题，对工人力量的估计问题，对上海当时政权的组织问题等等，秋白与陈独秀、彭述之有分歧的意见，和白就在一两个星期中，整理出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当时我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每天晚上回去读他一天里完成的手稿。这些手稿对我的思想、工作有很大的启发，使我认识到阻碍工人运动的原因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我看完手稿以后，他总喜欢问问我工人运动的情况；有时候他约罗亦农、侯绍裘同志在一起谈谈。他的这本小册子，对中国当时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秋白写完这本小册子以后，便奉中央命令，离开上海，到武汉去了。我不断地写信告诉他上海的情形，秋白来信要我谨慎地工作：“革命前途远大，但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

果然，蒋介石利用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篡夺了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开始了“四·一二”大屠杀。那天晚上，我接到从中央转来的一个从武汉拍来的电报：“秋白病垂危，立即动身到汉。”并且收到一张长江轮船的船票。我只得提着小提箱，告别了上海，告别了战斗的工

人阶级。

到了汉口我按照指定的地点，找到门牌号码，走进一座楼房。里面人很多，他们帮我把行李搬到楼上一间厢房里，告诉我：“这是秋白同志住的房间，他出去开会，中午回来。”说完，他们不等我说话，很快就走了。我心里直纳闷，既然可以开会，应该身体很好呀！

突然，熟悉的脚步声传入我的耳朵，秋白提着皮包上楼来了。他没有病，看起来比在上海活泼多了。我带着高兴的口气责备他：“为什么给我‘病垂危’的电报？公私灾祸一齐来到，从四月十一号一直到现在压得我透不出气来。”

秋白没等我说完，就说：“这是组织上关心你的安全才出这个主意。”

党对我父亲般的爱护，立刻转变了我的情绪，我深为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而感到惭愧。

秋白脱下长衫，挂在衣架上说：“我们离别一个月的过程中，革命进展比一年还多。”他以极迅速的动作，从抽屉里取出几本文件：“你冷静下来，不要被革命高潮冲昏头脑。”他拿着毛泽东同志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小册子对我说：“人人应该读几次，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忽然，他又以一种不愉快的语气说：“我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党报——日报，你看，这样的好材料，却不准宣传，真岂有此理！如果自己有党报，该宣传的还是要宣传。这样重要的事情，至今还不能解决。”

我感觉到，他似乎对什么人不满。后来我才知道，秋白责备的人就是坐镇中央宣传部的彭述之。原来，秋白到武汉之前，毛泽东同志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的小册子，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部分，便被彭述之等机会主义者停止登载。秋白到了武汉之后，很重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与彭述之进行了斗争，他亲自加上序言，以党的名义出版了单行本。

秋白最后说：“你好好研究这几本小册子，这是我在武汉与你见面的礼物。”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武昌小学的礼堂内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穿着长衫的陈独秀做报告时，代表们很注意地听着，希望他对过去的错误有所检讨，对当前的局势进行明确地分析，然而他们失望了。会议休息的时候，罗亦农走到秋白的面前，咧开嘴吐出“糟糕”两字，秋白抽着烟，长久地沉默着。

下午开会的时候，每个代表的座位上发了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代表们都在翻着小册子，在第二页中间写着“第三国际还是第○国际？”下面写着“孟塞维克主义”，看见这几个字，代表们笑咪咪的，也有人当场出声地笑起来。这是身穿灰布长衫，戴一副白丝边近视眼镜的恽代英同志。代英同志一边笑，一边用手帕擦着鼻子，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而陈独秀则很不满意，彭述之附和着说：“这是见了鬼。”“见鬼”，这是彭述之的口头禅，他在主席台上一口咬定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等于似有似无的鬼，……”秋白在散会时说：“彭述之承认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只和‘鬼’联合，而不要和人——工农联盟，把革命的领导权双手供奉给‘鬼’，这真是见了‘鬼’！”

秋白与机会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尤其是中国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问题，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与机会主义分子与托派彭述之的斗争是十分坚决的，他说：“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

## 八

一九二八年，秋白要和我到苏联去，我们想把女儿独伊一同带到苏联，组织上批准了。到了苏联，秋白和我忙于工作，便把独伊送进了幼儿园，每逢周末去看她。

秋白知道独伊爱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秋白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

后来独伊调到另外一个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是在离莫斯科较远的一个小城市即依凡城。我们去看她，要坐一夜火车。星期六晚上我们就睡在火车里过夜，并带着星期日吃的食物。在车厢里，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的父母。

早晨，我们走到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们排了队出来，唱歌欢迎父母，接着又表演节目给父母看。父母带来的食品玩具都放在一起，大家一起吃一起玩。然后由父母分别带领自己的孩子出幼儿园，秋白和我带着独伊到附近的森林中去。这是我们最幸福最愉快的一天，我们充分享受了天伦之乐。在这一天中，秋白是高兴的，活泼的，使他忘却了工作的紧张与疲劳，他和孩子痛快地尽



情地玩着。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秋白画图和折纸给孩子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车里，他自己拉着雪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我叫起来：“妈妈，我跌一跤不哭，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秋白一听这话，放开了手，哈哈大笑。孩子也很高兴，拍手大笑。笑声震荡在天空中，似乎四周的一切也都为我们的欢乐而喜气洋溢。

我见秋白这样爱护独伊，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秋白无论在我和独伊或其他人面前，总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从小没有感到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当秋白因病住在列宁疗养院时，还经常给独伊写信：

独伊：

我画一个你，你在笑。为什么笑呢？

因为你想着：

你是好爸爸和姆妈两人生出来的。

（画独伊牵着一只兔子）

小独伊：

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我的病快要好；过三个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时要来看你，一定来看你。我的小独伊。再见，再见。

好爸爸

秋白还写过这样一首诗：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花？  
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有一天，来了一位苏联同志，他是中文博士，是一九二一年秋白来苏联时的朋友。他给秋白送来两个抄本，说是秋白过去留在他家的研究拉丁字母的笔记本。从此，秋白经常和林伯渠、吴玉章同志组成自愿集合的小组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写成了《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秋白在列宁疗养院时，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适用于实际工作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更有趣了……。”

在疗养院，秋白的精神受到了一次重大的震动，苏兆征同志在国内死了。

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起到兆征同志离开苏联前，秋白

与兆征同志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兆征同志对待工作非常严肃，一丝不苟，每在斗争重要的关键，环境越恶劣，他的工作越坚强，同志间合作的越好。兆征同志在莫斯科患肚痛病，秋白曾劝他割了盲肠以后休息一个月再回国，可是兆征同志鉴于国内革命正处在艰难的条件下，十分需要他回国工作，终于回到了上海，不久病发，来不及急救而死了。秋白在给我的信中说：“昨天接到你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撼的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三十元已收到。）”

“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为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斯大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我党的老同志，凋谢的如此之早呵，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呢！！”

此后，秋白常常带着责备自己的口气说：“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

秋白从疗养院回到莫斯科，工作更加繁重了，身体也更坏了。有时候，他睡到半夜，从床上跳到窗前，从他的口里不断流出口水。我在这样情况下，非常着急。但张国焘明知秋白的病情，却坚决不愿分担党分配给他的工作。并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行宗派活动。有一次，全体学生在大礼堂开会，张国焘竟公然支持个别破坏分子，主张采用游行请愿方式对待苏联共产党。当时秋白也在主席台上，他看穿了张国焘和坏分子的阴谋，在这

紧张的关头，他挺身而出，对大家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反对张国焘的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采用这种方式是犯原则性错误的。我们不能这样做。”绝大多数学生是好同志，他们拥护秋白的意见，礼堂里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在那天晚上，秋白和中夏、和森等同志，与张国焘在小型代表团会议上展开了一场剧烈的斗争。

从国内上海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彭湃同志和杨殷等四位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了！秋白的健康情况很坏，他感觉到“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但由于从这件不幸消息中所产生的对敌仇恨，他仍在深夜写了《纪念彭湃同志》的文章：“上海来的电报，告诉我们，有四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枪毙，这是使我们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是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迟的发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后啊！……”秋白叙述了彭湃同志战斗的一生，和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最后写道：“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

“中国的反革命——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现在正对着中国工农的领袖的尸体，欢呼祝贺呢！可是，你们这些反革命的统治阶级，你们且慢高兴，你们是灭绝不了我们的彭湃同志、杨殷同志的。你们杀掉我们一个彭湃、一个杨殷，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会在自己的斗争中去栽培出无数的彭湃，无数的杨殷来送你们的终！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

在纪念彭湃同志的小册子里，除却秋白写的纪念文以外，还附着彭湃同志一九二四年海丰农民运动的著作，

他对这个著作和对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著作有着同样高的评价。他要求旅苏同学多读这样的著作，学习毛泽东同志和彭湃同志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并称他们是当时群众运动最好的模范和领袖。

## 九

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秋白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秋白在被打击之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从这时到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

秋白与鲁迅共同认为：“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就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在险恶的风浪中结成了亲密的革命的友谊。鲁迅敢于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与秋白来往，这决不是普通的个人感情，而是阶级的友爱。由于鲁迅的关怀和帮助，秋白在被通缉的上海没有被捕，在逃难时不受饥饿。鲁迅亲自替秋白找房子，送书籍文具，最令秋白感动和喜欢的，就是从鲁迅那里获得外国文的文艺作品。其中有些是曹靖华同志要鲁迅转秋白的。《海上述林》译文的原著，是鲁迅送他的礼物。鲁迅自己的作品，也给予秋白极大的安慰，但由于反动的国民党的压迫，使秋白连看书的自由都没有，往往使他最宝贵的书来不及从敌人破获的住所中拿出来，一批又一批的失去。

有一次，我和秋白坐了黄包车，在夜里两点钟逃到鲁迅家，因为车夫的速度有快慢，一个拉到他家的前门，

一个拉到他家的后门，以至同时敲着他家的前后门。进屋后我们深恐惊动了鲁迅，感觉非常不安。但是鲁迅安然地接待我们，又一次替我们找房子，又一次送书和笔给我们。秋白的文艺作品，都是在逃难时候产生的，这一次同样给了秋白一个写作的机会。秋白告诉我，这次要完成一个任务，他要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他一连三天，白天装生病，在床上看完鲁迅杂感，第四天晚上开始执笔写，一连几个晚上写成了。鲁迅看了很满意，从他沉默的眼光和轻松的微笑里，露出了他在检讨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诚意接受秋白对他的批评和鼓励，忘记了香烟头烧着他的手指。

秋白和鲁迅在一起，往往感觉夜太短。深刻的友谊的交谈，从政治到文艺，从实际到理论，从希腊到莫斯科，轻松，愉快，活泼。天亮了，彼此交换阅读写成的短文。他们对敌人沉着的作战，使秋白忘记了逃难的紧张环境。秋白对鲁迅的评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增强了革命文艺战线的力量。秋白所以对鲁迅能够作出那样恰当的评论，除了他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明晰的马列主义观点和高深的文艺修养外，还由于他与鲁迅有着极为亲密的阶级友谊，真正知己的关系和相互批评的革命精神。鲁迅曾给秋白一副亲笔写的立轴，上面写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在这个时期中，秋白与茅盾的来往也是比较密切的。有一天，茅盾来到我们家里，与秋白谈《子夜》的初稿，秋白很高兴地结合大革命时候的实际的群众运动，两湖农民斗争情况，畅谈他对《子夜》的意见。他们还没有谈完，我们的住宅因别的机关遭到破坏而受牵连，茅盾

就把秋白带到自己家里，同住了一个时期。

秋白就在这短短几年中，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威胁下，在地下的流浪生活中，把自己的心血放进新文学中去。秋白这时期文学上的作品大多收集在后来由鲁迅编成的《海上述林》及其它的文集中。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大众文艺的理论和实践，苏联文学的介绍和翻译，以及他自己的创作。

## 十

一九三三年秋冬之间，秋白和我从上海北四川路底东照里的一个亭子间搬到新闻路一个前楼，又从这里搬到俄国公寓，又从俄国公寓搬到上海英租界某里的一个前楼，秋白在这样搬来搬去十分不安静的条件下，仍旧能坚持每天十小时以上的译著工作。党刊上的一些政治论文和《瞿秋白文集》内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以及普希金的《茨冈》等，就在这一时期内写作或翻译的。他一向不肯放松时间，他热爱工作已成为自己的习惯。

一天晚上，有一位同志来到我家，对秋白说：“中央有电报来要你去中央苏区。”秋白毫不迟疑地回答：“想去很久了。”他沉静地点燃了手上的烟斗，问：“之华可以同去吗？”那位同志迟疑了一会，回答说：“我可以把这意见反映给组织。”第二天，那位同志又来了，一谈到我的问题时，那位同志这样回答：“之华去苏区的问题，要等有人代替她的工作才能走，请你先走吧！”

这样决定之后，秋白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整

理他自己三年来在文学方面的译著，而我在工余时间，为他准备去苏区的行装。当时我担任组织部的秘书工作。有时他看见我工作忙，就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帮助我。

在将要动身去苏区的前几天，他有这样一种不可遏止的愿望和要求：“我要和鲁迅茅盾告别。”他对在艰苦环境中并肩作战的友人怀着无限深厚的亲切感情，这种感情是我所了解并能深刻地体会到的，我就这样嘱咐他：“路上小心些，今晚去，明晚回来。”他听了我的回答高兴极了，在他的眼睛里突然放出了愉快的光芒。

第二天晚上，他回来了。他走起路来总是轻轻地，使人不容易听出他的脚步声。当我听到开大门的声音时，心就平静下来。看到他满脸笑容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年轻了许多，我也和他一样高兴。他对我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茅盾和鲁迅身体都好，海婴也没有病。鲁迅和许先生睡了一夜地板，把床让给了我。”他带着微笑，表现了他的满意和抱愧。顿了一顿，又说：“感谢你，亲爱的。”这是他在不自由的地下生活里，一旦能出去一下，回家来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不多一会，他由愉快逐渐地进入沉思，不断地吸着烟，烟斗头上时而发出滋滋的声音，烟雾一股股地在灯光下浮动。他平日是不爱多说话的，这时好像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我体会到他内心离别的感情，就打断了他的沉思：“我替你买了一个杯子，还有你需要用的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他就很满意地接了过去，收藏起来了，这是他平常写文章时候最喜欢用的本子。

在别离前一天，我参加了整天的会议，会场就在楼下，上楼也很方便，每当休息的时候，仿佛他等着要见



我，而我也一样要见他。在我们的房里除卧铺书桌椅子以外，没有多的东西，已经整理好的一只衣箱摆在房间角落里。他的书桌向来都是非常整齐的，今天虽然多了些书和正在整理的稿子，但依然很有条理。他叹着说：“可惜《茨冈》尚未译完，来不及完成了。”他拿起稿子又放下，自言自语地说：“随身带去又不可能。”过了一会他又说：“我最遗憾的是一九三一年住在紫霞路六十八号时写成的驳斥叶青谬论的稿子被遗失了，这部稿子有七、八万字，化的心血确不少，失去后再也找不回来，实在太可惜。”

我的工作是在白天，他的工作往往在深夜。在静悄悄的夜里，他弯着腰低着头伏在书桌上辛勤地工作，已成了他多少年来的习惯。但这一夜却与往常不一样，我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也不断地见到他绕着我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安静的夜并不能安静他的心。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看见我醒了，悄悄地走过来，低下头，指着书桌上的一迭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又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生活。我发现他一直为分别后我的生活耽心，为我的安全耽心，我就像小孩子似地轻松地对他说：“不要紧的，过去离别几次不是都重见了么？这次当然也一样！”他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工作就好了！”我说：“组织已经答复我们，等找到代替我工作的人，我就可以走了，我们会很快地见面的。”他突然握住我的手

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他愈说愈兴奋了，在他的脸上充满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他很坚决地对我说：“我一旦被捕，受到审判的时候，就这样回答他们：‘你们不配审判我，我要审判你们！’”他的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感情，无形中给予我一种不可摧毁的内在力量。

这一天的晚饭比较丰富，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各出一元钱，叫了个菊花锅，买了几个苹果，大家很愉快地给他送行。夜十一点他离开了寓所，我送他出门，他尚未走到里弄口，又在白雪纷飞的路灯底下回到我的眼前：

“之华，我走了！……”

“再见，我们一定能重见！”我很自信地回答他。

我又送了他一段路，一直看他的影子消失在黑魑魑的大街尽头，我才回到自己的房间，看见了他的整齐的书桌，和书桌上的笔墨铜尺。很触目的是他替我作好的半年读书计划，和准备我读的一迭整齐的书，其中有一本斯大林同志著的、他自己翻译的《列宁主义问题》。我抬头看着房间的周围，墙上挂着他穿过的一件破单衣。这一切东西很自然使我感觉到，似乎他已离开了我，也似乎他还没有离开我。当我脱了鞋子上床时，看不到那个弯着腰低着头伏在案上辛勤写作的秋白，才明白他确实离开了……。

过了半个月，接到他托人带给我的一张小条子，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 十一

一九三四年底，一个大雪纷飞的黑夜，因为鲁迅有病，我跑去看他。我从大陆新村的后门进去，走上熟悉的楼梯，在二楼的房间里，我看见鲁迅坐在火盆边烤火，他的头发、胡子很长，脸削瘦的厉害，眼睛深陷了进去。他的清瘦和脸上阴郁的气色使我吃惊。我坐在火盆旁边，问他身体好一些了没有？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问我：“听说秋白在苏区病死了，这个消息确实否？”我告诉他，我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恐怕不会吧。他要求我：“把消息打听清楚后告诉我。”他又关切地嘱咐我：“你自己也应多加小心。”后来，我写信给他，告诉他秋白并没有牺牲。

从这以后，机关被破获的越来越多，苏区的交通也断了，困难更多了。为了鲁迅的安全，我决不再去看他，到了第二年一月，我的住宅也被搜查了，在上海的机关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被破坏，有一位住在机关的老太太把我从搜查过的机关中接了出来。在她的亲戚家碰到了杜延庆同志，他要急救一位同志出医院（因为机关破坏被牵连到医院）但没有钱，我就写信给鲁迅，从他那里取来五十元，帮助了一位同志就没有被捕。我和杜延庆等商量为了隐蔽自己，并在工人群众中建立党的组织，我和杜延庆同志在群众的帮助下，都参加了生产，我投考英商班达蛋厂去作工。不久，我知道鲁迅在找我，叫我赶快去拿信。我因为自己去他家不妥当，托了一位工人代我去取回来信。信是从福建寄给鲁迅的，大概的意思：

“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二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作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释放我。”信尾署名是“林其祥”。这里秋白暗示他当时的入狱情况和口供。

秋白被捕了！怎样才能搭救秋白？怎样才能多知道他的情况，再和他见面？我一面工作，一面想尽办法找铺保。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杜延庆也和我同样地奔忙着，设法找铺保。终于，我找到牧师秦化人，他说他有一个开旅馆的朋友，答应为秋白作保。在这时，周建人先生又拿了秋白给他的一封信给我看，信中写他在上杭被捕，在狱中衣单薄，夜间很冷，食物又少，受冻受饿，管监狱的告诉他：如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可以保释。看了这封信，我亲手给他做了两条裤子，鲁迅又一次送来了五十元给秋白用，我把这钱连同铺保一起从邮局寄去了。

第二天，报上以巨大篇幅登载了秋白被捕的消息。我一看报，知道秋白不能活了，马上派人去看鲁迅先生。那人回来告诉我，鲁迅木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头也抬不起来了。后来周建人先生来看我，说鲁迅转告我一个消息：当秋白被捕后，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中央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究竟要不要杀死秋白，蔡元培提出来像秋白这样有天才的人，在中国不可多得，主张不要杀他，但

戴季陶等国民党反动分子坚决要杀害秋白。

过了几天，有一个人跑到我母亲家里，说秋白有信给我哥哥和我，我哥哥不在上海，这两封信，他一封也不肯交出来，只说秋白“自首”了。我妹妹跑来找我，我心里已经明白了，对她说：“秋白决不会自首，那是个坏蛋。你不能再到我这里来。”并告诉她，如有可能，最好把两封信骗下来。

第二天，我妹妹拿来秋白给我哥哥的信，信上写着：“我的事想你们在报上已看到了，我要和你们永别了。之华是我生平唯一的知己，或者她也被捕，我知道你们是不会知道她的下落的。但我要留最后一封信给她，想你们也没有办法转给她，那么，就请你们投寄给叶圣陶先生作为写小说的材料吧！望你们保重。”

秋白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那个坏蛋始终不肯交出来，并无耻地欺骗我母亲说：“秋白自首了，他要我亲手交给她，这封信不能由你们转交。”他拿着那封很长的信，在我母亲眼前晃了晃。

我相信秋白，正像秋白相信党一样。我记起秋白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我们常常谈到被捕和死的问题。秋白说：“我们的不自由是为了群众的自由，我们的死是为了群众的生。”“被捕在革命中是难免的，反真理的人不配审判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到那个时候真理要审判反真理的敌人！”秋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决不会背叛他的信仰的，虽然我渴望看到秋白给我最后的一封信，但是，我不能上敌人的当，终于拒绝去取秋白这封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信。

## 十二

秋白和我们永别了。为了真理，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后来，在延安，在晋绥，在太行，在晋察冀，直到进了北京，遇到了许多过去和秋白在一起的老同志，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些秋白在苏区以及被捕牺牲的情形。

秋白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后，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那时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同志对我说：“秋白同志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维埃大学直接负责人是我，但他关心政治教育的每一课程，和每一次学习讨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十分愉快。”

真的，有不少同志告诉我，秋白在苏区是很愉快的。当时中央各部门相距三、五里至六、七里路，相当分散，秋白学会了骑马，经常穿着我做的一套衣裤，戴着亲手制的绒线帽，扎起裤角，骑一匹黑马奔驰，同志们见了都很欣喜，说：“秋白同志年轻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多么活跃！”他非常诙谐健谈，使人感到亲切，同志们都喜欢到他那儿去。他住的房间，用床隔着作两间，一半算是办公室，一半算是卧室，有时他发着烧，还坐在床上，滔滔不绝的谈问题，有的同志说：“想不到那么严肃的秋白同志，竟这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当然，生活在自己的政权下，踏着自己的土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心情怎能不变呢？

秋白的生活和大家一样，是很艰苦的。敌人对苏区的“围剿”和封锁，苏区的粮食和日用必需品是很少的。为了支援前线，后方的油盐少得很。徐特立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粮食是按人分配，每人十四两到一斤四两米，为克服困难，每个党员和群众都自动节省粮食。我是一日十四两米，秋白同志吃多少我不知道，只知道节约委员会批评教育部节约的‘过火’。有一天我到教育部去了，他留我吃饭，说某同志送给他几两盐，请我吃一些有盐的菜。”邓颖超同志很关心秋白，送几个鸡蛋或几张糖饼给他吃，而他总是拿出来请客。

在长征前，秋白以为自己和大家一样，会参加长征的，他整理好自己的行李。但组织上决定他留下来，在后方隐蔽工作。为了和老同志话别，秋白请了李富春、蔡畅、刘少文、傅连璋等同志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大家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又没有说出来。沉默中，秋白举起一只酒杯，向大家说：“这酒杯是之华在白区临别时给我的。”秋白的神色很黯然，默默地与同志们握手告别了。

长征出发时，徐特立同志经过沙洲坝，去看秋白。时间很匆促，两人没有多谈。秋白预见着长征有许多困难，便把自己的好马和强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同志了。徐特立同志说：“当时我们都以为红军出来不久必仍回苏区，我和秋白同志在此永别是我意料不到的。”

因为负伤而留在医院里的陈毅同志，第二天碰到了秋白，问他为什么不走。陈毅同志爱护秋白，愿意把自己的马给他，劝他赶紧追上去，跟着队伍出发。秋白告诉他组织上决定自己留在后方。秋白说：“我服从组织的

命令。”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秋白和邓子恢、何叔衡等同志，由几十名武装保护离开了瑞金，化装成老百姓，来到福建省委所在地。到了这里，他们才知道还要到汀杭中心县委，然后，子恢同志去永定县，而秋白将经潮汕前往上海。走了四、五天，至水口五里桥小径牛庄岭附近，天下雨了，一行人便到一个老乡家里去休息。这时，忽听得两声枪响，有人出去探望，被民团发现了。秋白等立刻离开老乡家里，过羊角溪上山，到了山顶。这时，伪保安第十团团团长钟绍葵已派了四连武装部队围住了山。秋白对子恢同志说：“为着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是光荣的。”后来，子恢同志提议突围，由何叔衡同志先混下山，子恢同志最后下山。何叔衡同志在乱枪下被打死了。秋白因不能走路，被敌人捉住了。子恢同志是本地人，熟悉本地情况，逃出了险境。

秋白被捕后，没有暴露他的真面目。第二天，他被带上手铐脚镣，送到上杭县匪部监禁一月余。鲁迅和周建人先生得到他的信，大概就在这时写的。这时他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

匪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这时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说秋白已被匪三十六师逮捕，要他即时把讯核情况上报。（据说，从秋白离开苏区时，就有托匪向蒋介石告密。）宋希濂这时还没有发现秋白，就决定各团把俘虏的姓名，俘虏地点以及相貌特征分别详细造册，送到师部。敌人从表册上看到“林其祥”是江苏人，四十岁左右，军医，人单瘦，谈吐文雅，以行迹可疑被捕，由于听说“林其祥”在苏区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过，便将他送到福建长



汀匪三十六师师部。

据说秋白被解到长汀后，曾被敌人讯问用刑多次，都没有暴露。后来，匪徒发觉在被囚押的人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陈姓青年，曾在中央苏区人民教育委员会当过收发，因而想出一条诡计，设法使陈姓青年与秋白骤然相遇，以观察他们的表情，辨别到底是不是秋白。

这天，匪徒把秋白带到一间房子里，又秘密使人把陈姓青年带来。陈姓青年迈出门坎，突然看见了秋白，脚步骤然停住，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匪徒奸猾地说：“原来你们彼此都认识么？”秋白马上从椅子上立起来，哈哈笑着说：“这算是演了一幕很滑稽的戏！”随又说：“我的事你们都知道了，不必再问。”

蒋介石命令他的匪徒，千方百计引诱秋白，劝秋白投降，写“反省书”。秋白坚决地拒绝了匪徒们一切威逼利诱。他说：“我为了党、为了人民，应把革命坚持到底。”再来劝他时，他就岸然回答：“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在这期间，秋白写了许多诗词和一本《多余的话》，都被匪徒们拿走了。有一个敌人的军医请秋白在他于狱中所拍的照片上题词，秋白写道：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瞿 秋 白

一九三五年五月摄于汀州狱中

这几句话，表现秋白有高度乐观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只要对革命有利益，个人生死完全可以置之度外，永远地忠实于党的事业。

敌人用尽了一切手段，丝毫不能摇撼秋白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蒋匪下令：“劝降不成，就地枪决。”当匪徒们拿出蒋匪的电报给秋白看时，秋白只淡然一笑：“为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并说：“一个革命党人很难得一个休息的机会；被捕监禁，不过是暂时的休息，‘死’才是给他一个安静的长期的休息。我们革命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听了，也不禁脸红耳赤，肃然起敬。

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秋白依然笑容满面，一如平日。第二天——六月十八日，匪徒们在长汀公园设了一席菜饭，请秋白午餐。秋白吃罢饭，引吭高唱《国际歌》和《红军之歌》。然后，他慢慢步至刑场，神色不变。临刑前的一刹那，监刑的一个国民党员笑问秋白：“如果杀尽了共产党人，革命便可成功了。”秋白笑着说：“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人，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说完，秋白走到一块草坪上，坐下来，点头微笑，对刽子手们说：“此地很好。”

枪声响了。

下午，秋白被埋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盘龙岗。

（此文是在业余时间随想随写的，很不成熟。在文字上，南新宙和周晔两同志也出了一部分劳动，我在这里特致谢意。——作者）

## 二、怀念父亲<sup>①</sup>

我父亲瞿秋白烈士就义的时候，我才十四岁，而分别的时候，只有九岁；他和母亲回国去工作，把我留在莫斯科。因此，父亲的形象，留在我记忆中的，虽有一些片段还很清晰，许多却已经是很模糊了。父亲的事迹，我是后来从母亲的叙述中才比较详细地知道的。但在听的当时，往往并不能理解它的意义。只是在我自己成年之后，特别是当我亲自经历了那十年间的风风雨雨之后，我对父亲才更加理解了一些，也更加爱他了。

我刚刚能记事时，正值大革命时期，我们家住在上海，和茅盾伯伯相邻。当时我父亲正为革命奔走于上海、广州、武汉之间，我母亲也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就把我送到幼儿园去，和茅盾伯伯的女儿沈霞同在一个幼儿园。爸爸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和沈霞。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希望我将来能成为一个新中国有用的人，后来，母亲给我看过我小时候父亲写给我的一首诗：

小小的落蕊，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

① 作者瞿独伊，原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难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今天，每当读它的时候，我却感觉到了一颗炽热的慈父的心在跳动，鼓舞着我为祖国而更加努力工作。

我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绘画、篆刻、音乐、戏曲、写作和翻译，门门都能来。我记得在母亲房间里的墙壁上悬挂过一帧父亲画的水墨山水画。父亲还把他和母亲两人的名字合刻成一方印章：“秋之白华”，以此象征他们两人的深厚爱情。说起音乐，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我们的儿童院设在莫斯科效外沙皇时代的一座地主庄园里，四周是茂密的丛林，风景很优美。那一天，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杆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木筏顺流而下，微风轻轻地吹动着我们的衣服，忽然，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快乐的歌声，在河上飞翔，我们就在歌声中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父亲、母亲是十分疼爱我的，但他们更爱伟大的祖国。为了祖国的光明，为了革命工作需要，爸爸、妈妈将我单独留在国际儿童院，委托鲍罗廷夫妇照顾我（他们两位对留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非常关怀）。爸爸、妈妈回国后，我和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多半是通过曹靖华同志转寄的。通信中，父亲对我的每一点进步都

感到高兴，而且总忘不了鼓励我。一次，父亲给我寄来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建造这样的大飞艇”。

父亲回国以后的情形，我都是后来从母亲口中听说的。她说得多，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他对待自己受到王明一伙打击后的态度；一是他和鲁迅的交往。

一九三一年初，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把我父亲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王明写的那本《为中共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多处攻击我父亲——维它同志。父亲在党刊《斗争》上发表了若干不符合王明一伙观点的文章，他们就诬蔑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从而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并且重新提起父亲在“八七”会议之后犯的错误。父亲并不计较他们这种态度，而是诚恳地再次检查和分析了自己的这一错误。会后，一些同志为他抱不平，父亲就对他们说：要正确对待这样的事。他说，自己这样做，是希望大家对他过去的错误看得更加清楚，以便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那时，宗派主义分子不但这样打击我父亲，而且把我母亲的工作也撤销了。当父亲觉察到母亲的委屈情绪和要求工作的心情时，就宽慰和鼓励她说：“革命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多得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学会独立工作，要自觉地、主动地寻找合适的工作去做。”他引导母

亲读书、学习俄文，鼓励她翻译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鼓励她把所熟悉的工人斗争生活写成短篇小说。母亲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发表在丁玲同志主编的《北斗》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上的《豆腐阿姐》。发表之前，就经过父亲仔仔细细修改过。被鲁迅编入《一天的工作》中的绥拉菲摩维支的两个短篇，《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译者署名是母亲的笔名“文尹”，那也是父亲一字一句把手教她翻译的，母亲每译出一段，父亲就给她改一段。后来这译文收入了《瞿秋白文集》，算是父亲的译文，我以为这也是可以的。

父亲不只是鼓励母亲这样，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他找着了最适合的工作来做。他把文艺（创作和翻译）用来作为自己的武器，用这武器得心应手地为革命而斗争。从他一九三一年初受到王明一伙排斥的时候算起，到一九三三年末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去为止，他写作和翻译了多少东西啊！收在《瞿秋白文集》中的那些最重要的文学论文和杂文，那些最重要的翻译作品，几乎都是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完成的。可以说，他受到王明一伙打击的这段时间，正是他在文艺方面创造力量旺盛的时间。不只是写得多，而且，这时候他写的每一篇文章，无不洋溢着高昂的革命激情。比如以“乱弹”为总名发表在《北斗》杂志上的一组杂文，他愤怒地揭露、抨击和嘲笑了国民党反动派，同时，他以火一般的热情，歌颂革命的战士和革命的入民。就拿《“匪徒”》这一篇来说吧，对于那些正在和前来“围剿”的反动军队浴血苦战的中国工农红军，那些被反动分子诬称为“匪徒”的人，父亲在这篇文章中称他们为“真正彻底的、群众的新英

雄”，指出：“他们只不过是拿着了武器的工农。”蒋介石要为他进行反革命内战找一个借口，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欺骗性口号。父亲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这种论调，他说：“中国的绅商说：这些‘匪徒’是在破坏反日战争的后方！这是多么无耻。中国的绅商根本就没有反日的战争，日本资产阶级派到满洲和上海的军队，恰好是替中国绅商巩固后方的，因为中国绅商的前线是在‘剿匪’的那一边。如果不然的话，为什么半年以来没有一个兵派到山海关以外去？为什么上海的战争要强迫停止？为什么一切动员的军队和运输的军火正在不断的向着所谓‘匪区’前进？！”对于革命和反革命这一场生死搏斗的结局，父亲满怀信心地作了这样的预言：“只有他们——这些所谓‘匪徒’，能够打败帝国主义，能够解放中国，能够创造真正几万万民众自己的中国！他们英勇的战斗已经很久了，他们的最后的胜利是有保障的。”在他写了这篇文章还不到二十年，他的这个预言就完全应验了。当时，有哪一个读者能够感觉到：这些杂文的作者，当时在党内正受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在他发表的所有文章中，人们看不到一句牢骚，一句委屈情绪的流露。党是公正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我的父亲的时候，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着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高度评价了他这几年来在文化方面所进行的工作。

在这几年里，父亲在文化方面所做的“许多有益的工作”，都是和鲁迅合作进行的。我没有见到过鲁迅，可是从母亲的多次谈话中，他的形象鲜明地刻在我的记忆

中。母亲对我说过，当机关遭到破坏的时候，她同父亲怎样逃到鲁迅家来避难，不论是白天跑去，或是半夜跑去，鲁迅一家都热情接待。我父亲对鲁迅先生也充满了尊重和敬佩的深情，在他未同鲁迅见面之前，在读了鲁迅送给他的刚出版的《毁灭》译本之后，就写了一封信给鲁迅，信中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和自己商量一样。”他们在文化战线上并肩战斗，合作进行了许多工作。母亲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九三三年二月，爱尔兰作家萧伯纳到上海，鲁迅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他几个领导人一起会见了，回家之后，和我父亲兴奋地谈起会见的情形，谈起当时报纸刊物上关于萧的种种言论。在谈论中鲁迅忽然提议把当时报刊上的这些言论剪辑成本，给萧的这次旅行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倒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鲁迅的提议马上得到了我父亲的赞同。说干就干，于是就由他们两人对材料进行圈选，由我母亲和许广平同志两人剪贴，很快就编成《萧伯纳在上海》这本小册子。我父亲写的《王道诗话》、《苦闷的答复》、《曲的解放》等等十多篇杂文，都是由鲁迅请人抄过，用鲁迅自己所用的笔名，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作品一样投寄给《申报》的《自由谈》等处发表，后来又把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南腔北调集》中。当时反击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几个大战役，例如和“新月派”的论战，和“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战，和“第三种人”的论战，我父亲和鲁迅都是作文互相呼应的。例如，鲁迅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我父亲就写了《狗样的英



雄》；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等等文章，我父亲就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他们的步调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和“左联”其他革命作家的步调完全一致的。我要重复一句话：这些文章的作者，一个在文化战线上坚定勇敢地和敌人战斗的战士，哪一个读者能够想象到他当时在党内正受到打击，正被诬称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呢！这些深刻、尖锐、泼辣、鲜明的战斗的文章，不但真正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不会去写它，即使是革命者，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遭到的错误打击，如果有委屈情绪，不满，消沉，也是写不出来的呀。

作为我父亲和鲁迅交谊最重要的纪念的，是他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和他为这本《选集》写的那篇很长的序言。母亲说过，那是一九三三年四月间在上海北四川路底东照里十二号的亭子间里写的。这亭子间就在鲁迅的家附近，是鲁迅为我的父母亲安排的一处避难所。为了避开敌人的追逐和邻居的怀疑，我父亲白天就装病，躺在床上仔细地阅读鲁迅的作品，到夜深人静，才起来伏在一张小方桌上一口气地赶着写，一连写了几个晚上才写完。鲁迅很满意这篇《序言》。例如，我父亲说，当年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批判，并不是“攻击个人的文章”，他所批判的，是“社会上的某种典型”。鲁迅以为，以前就没有谁这样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副对联确是表达了鲁迅对我父亲的感情。在我的父亲和母亲这一方面，同样总是深深地怀念着鲁迅。我听冯雪峰同志说过，我父亲在中央苏区，还常常和他谈起鲁迅来。至于我的母亲，更是常常向我表示对

鲁迅的怀念。直到最后她被“四人帮”关押并且病魔缠身时，她还做了一首怀念鲁迅的诗。因她没有纸笔，不能写下来，她怕忘记，还每天早上背诵着。妈妈给我朗诵过这首诗，我也想帮她记录下来，但是我去探望的时候旁边总有人监视，加之我要抓紧时间帮她洗头，洗脚，也来不及记录。我至今都觉得这是一件极可惋惜的事。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一切都被颠倒了。我父亲的墓也被砸了。关于他和鲁迅的关系，出现了许多十分离奇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我父亲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歪曲了鲁迅，“四人帮”的一些应声虫甚至提出：要搞好鲁迅研究，首先必须批判这篇序言，“肃清其流毒”。说这话的人也没有想一想鲁迅本人是怎样看待这篇序言的。一九三六年捷克译者希望找一篇论文，概括地介绍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鲁迅首先就想到推荐我父亲写的这篇序言去。一种说法是说，鲁迅写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是“批判”我父亲的。说这话的人正好把事情弄反了，这篇文章倒是鲁迅和我父亲交换过意见才写出来的。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中说的“从公意做过文章”，就是说的这件事。当鲁迅的这篇文章遭到一些人攻击的时候，我父亲马上写了《鬼脸的辩护》和《慈善家的妈妈》这两篇杂文来保卫鲁迅的观点，保卫他自己和鲁迅两人共同的观点，指出：鲁迅的这篇文章“是完全正确的”，“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还有一种说法，说鲁迅不同意把我父亲的创作編集出版，是因为对他的创作“有所保留”，不愿使他的文章传布出去。这个说法更完全与事实不符。听母亲说，鲁迅曾经同她商量过整理出版我父亲

遗稿的事。当时，我母亲提出：父亲的创作比翻译更重要，希望先编印他的创作集。鲁迅提出：创作集收集材料比较困难，加以募集的经费也不多，周转不过来，不如先把译文编印出来，卖得一些钱以后再编印创作集。遗憾的是《海上述林》的编校工作，都是鲁迅支撑着病体独力完成的，他还没有能够看到下卷的出版就去世了，当然也就没有可能按照原定计划在完成《海上述林》之后再去编印创作集了。这怎么能够说是“有所保留”？倘若真是“有所保留”，不愿使之传布的话，那么，为什么又要把我父亲写的《王道诗话》等等杂文编入自己的文集中去呢？更有甚者，有些“研究鲁迅”和“批判”父亲的文章，把鲁迅和父亲的革命友谊歪曲成“被欺骗者与欺骗者”的关系，在那些年里，我看到过好些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但我总是坚信，一切诬蔑不实之辞，一切奇谈怪论，终究总有被推倒的一日。我感到愉快的是：党和人民终于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年轻的时候，我读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保尔·柯察金的一段名言，感到深深的激动。这些天里，我反复翻读父亲的文集，我在其中读到了这样的一段：

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我的父亲把自己生命溶化到大众的里面去了，人民也必将永远怀念着他。

### 三、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sup>①</sup>

#### ——回忆与随想

#### 王剑虹

我首先要介绍的是瞿秋白的第一个爱人王剑虹。

一九一八年夏天，我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学习的时候，王剑虹已经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那时她的名字叫王淑璠。我们的教室、自修室相邻，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她好像非常严肃，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我呢，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气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双智慧、犀利、坚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学吧。果然，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学校的同学行动起来时，王剑虹就成了全校的领头人物了。她似乎只是参与学生会工作的一个积极分子。但在辩论会上，特别是有校长、教员参加的一些辩论会上，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辟透的言论，常常激起全体

① 丁玲作于1980年1月2日

同学的热情。她的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把一些持保守思想、极力要稳住学潮、深怕发生越轨行为的老校长和教员们问得瞠目结舌，不知如何说，如何作是好了。这个时期，她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后来，我也跟在许多同学的后边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游行、开讲演会、教夜校的课，但我们两人仍没有说过话，我总觉得她是一个浑身有刺的人。她对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也许觉得我也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人吧。

这年暑假过后，我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后来又转岳云男子中学学习。在这两年半中，我已经把她忘记了。

一九二一年寒假，我回到常德，同我母亲住在舅舅家时，王剑虹同她的堂姑王醒予来看我母亲和我了。她们的姐姐都曾经是我母亲的学生，她们代表她们的姐姐来看我母亲，同时来动员我去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原来，王剑虹是从上海回来的，她在上海参加了妇女工作，认得李达同志的爱人王会悟等许多人，还在上海出版的《妇女声》上写过文章。她热忱于社会主义，热忱于妇女解放，热忱于求知。她原是一个口才流利、很会宣传鼓动的人，而我当时正对岳云中学又感到失望，对人生的道路感到徬徨，所以我一下便决定终止在湖南的学业，同她冒险到一个熟人没有的上海去寻找真理，去开辟人生大道。

从这时起，我们就成了挚友。我对她的个性也才有更深的认识。她是坚强的，热烈的。她非常需要感情，但外表却总是冷若冰霜。她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女儿。我

虽然从小就没有父亲，家境贫寒，但我却有一个极为坚毅而又洒脱的母亲，我从小就习惯从痛苦中解脱自己，保持我特有的乐观。……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我们碰到许多人，观察过许多人，我们自我斗争，但我们对当时的平民女校总感到不满，我们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狱。当我们把钱用光，我们可以去纱厂当女工、当家庭教师，或者当佣人、当卖花人，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

一九二三年夏天，我们两人到南京来了。我们过着极度俭朴的生活。如果能买两角钱一尺布作衣服的话，也只肯买一角钱一尺的布。我们没有买过鱼肉，也没有尝过冰淇淋，去哪里都是徒步，把省下的钱全买了书。我们生活得很有兴趣，很有生气。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说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这年，他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我们在这里，便跑来看我们，还雇了一辆马车，请我们去游灵谷寺。这个较远的风景区我们还未曾去过咧。跟着，第二个熟人也来了，是施复亮（那时叫施存统）。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最早把我们的朋

友王一知（那时叫月泉）找去作了爱人的，他告诉我们他和一知的生活，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这些自然引起了我们一些旧情，在平静的生活中吹起一片微波。后来，他们带了一个新朋友来，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就是后来曾领导过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取代了机会主义的陈独秀，后来又被称为盲动主义的瞿秋白；就是做了许多文艺工作，在文艺战线有过卓越贡献，同鲁迅建立过深厚友谊的瞿秋白；就是那个在国民党牢狱中从容就义的瞿秋白；就是那个因写过《多余的话》被“四人帮”诬为叛徒、掘坟扬灰的瞿秋白。

不久，他们又来过一次。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我们听，这非常对我们的胃口。过去在平民女校时，也请另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讲过苏联情况，两个讲师大不一样，一个像瞎子摸象，一个像熟练的厨师剥笋。当他知道我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我们就像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似地都听迷了。

他对我们这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对我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听着、赞赏着。他鼓励我们随他们去上海，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我们怀疑这可能又是第二个平民女子学校，是培养共产党员的讲习班，但又不能认真地办。他们几个人都耐心解释，说这学校要宣传马克思主义，要培养年轻的党员，但并不

勉强学生入党。这是一个正式学校，我们参加文学系可以学到一些文学基础知识，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学上有修养的人，可以学到一点社会主义。又说这个学校原是国民党办的，于右任当校长，共产党在学校里只负责社会科学系，负责人就是他和邓中夏同志。他保证我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施存统也帮助劝说，最后我们决定了。他们走后不几天，我们就到上海去了。这时瞿秋白同志大约刚回国不久。

##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这时设在中国地界极为偏僻的青云路上。一幢幢旧的、不结实的弄堂房子，究竟有多大，我在那里住了半年也弄不清楚，并不是由于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不值得你去注意。我和王剑虹住在一幢一楼一底的一间小亭子间里，楼上楼下住着一些这个系那个系的花枝招展的上海女学生。她们看不惯我们，我们也看不惯她们，碰面时偶尔点点头，根本没有来往。只有一个极为漂亮的被称为校花的女生吸引我找她谈过一次话，可惜我们一点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她问我有没有爱人，抱不抱独身主义。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也不打算去想。她以为我是傻子，就不同我再谈下去了。

我们文学系似乎比较正规，教员不大缺课，同学们也一本正经地上课。我喜欢沈雁冰先生（茅盾）讲的《奥德赛》、《伊利亚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极为离奇又极为美丽的故事。我从这些故事里产生过许多幻想，我去翻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地理，把它们拿来和我们自己



民族的远古的故事来比较。我还读过沈先生在《小说月报》上翻译的欧洲小说。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但是不会接近学生。他从来不讲课外的闲话，也不询问学生的功课。所以我以为不打扰他最好。早先在平民女校教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的英译本时，他也是这样。我同他较熟，后来我主编《北斗》时，常就教于他，向他要稿子。所以，他描写我过去是一个比较沉默的学生，那是对的。就是现在，当我感到我是在一个比我高大、不能平等谈话的人的面前，即便是我佩服的人时，我也常是沉默的。

王剑虹则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在深度的近视眼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确沉醉在那些“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既深情又蕴蓄的词句之中，他的神情并不使人生厌，而是感染人的。剑虹原来就喜欢旧诗旧词，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所以她乐意听他的课，尽管她对俞先生的白话诗毫无兴趣。

田汉是讲西洋诗的，讲惠特曼、渥兹华斯，他可能是一个戏剧家，但讲课却不太内行。

其他的教员，陈望道讲古文，邵力子讲《易经》。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不十分懂，就不说它了。

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面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

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科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

冬天的一天傍晚，我们同住在间壁的施存统夫妇和瞿秋白一道去附近的宋教仁公园散步赏月。宋教仁是老同盟会的，湖南人，辛亥革命后牺牲了的。我在公园里玩得很高兴，而且忽略了比较沉默或者有点忧郁的瞿秋白。后来施存统提议回家，我们就回来了，而施存统同瞿秋白却离开我们没有告别就从另一条道走了。这些小事在我脑子里是不会起什么影响的。

第二天秋白没有来我们这里，第三天我在施存统家遇见他，他很不自然，随即就走了。施存统问我：“你不觉得秋白有些变化吗？”我摇摇头。他又说：“我问过他，他说他确实堕入恋爱里边了。问他爱谁，他怎么也不说，只说你猜猜。”我知道施先生是老实人，就逗他：“他会爱谁？是不是爱上你的老婆了？一知是很惹人爱的，你小心点。”他翻起诧异的眼光看我，我笑着就跑了。

我对于存统的话是相信的。可能秋白爱上一个他的

“德瓦利斯”，一个什么女士了。我把我听到的和我所想到的全告诉剑虹，剑虹回答我的却是一片沉默。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寂寞了。

过了两天，剑虹对我说，住在谢持家的（谢持是一个老国民党员）她的父亲要回四川，她要去看他，打算随他一道回四川。她说，她非常怀念她度过了童年时代的四川酉阳。我要她对我把话讲清楚，她只苦笑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她甩开我就走了。

这是我们两年来的挚友生活中的一种变态。我完全不理解，我生她的气，我躺在床上苦苦思磨，这是为什么呢？两年来，我们之间从不秘密我们的思想，我们总是互相同情，互相鼓励的。她怎么能对我这样呢？她到底有了什么变化呢？唉！我这个傻瓜，怎么就毫无感觉呢？……

我正烦躁的时候，听到一双皮鞋声慢慢地从室外的楼梯上响了上来，无须我分辨，这是秋白的脚步声，不过比往常慢点，带点踌躇。而我呢，一下感到有一个机会可以发泄我几个钟头来的怒火了。我站起来，猛地把门拉开，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立刻就又把门猛然关住了。他的一副惊愕而带点傻气的样子留在我的脑际，我高兴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得意地听着一双沉重的皮鞋声慢慢地远去。为什么我要这样恶作剧，这完全是无意识和无知的顽皮。

我无聊地躺在床上，等着剑虹回来。我并不想找什么，却偶然翻开垫被，真是使我大吃一惊，垫被底下放着一张布纹信纸，纸上密密地写了一行行长短诗句。自

然，从笔迹、从行文，我一下就可以认出来是剑虹写的诗。她平日写诗都给我看，都放在抽屉里的，为什么这首诗却藏在垫被底下呢？我急急地拿来看，一行行一节节啊！我懂了，我全懂了。她是变了，她对我有隐瞒，她在热烈地爱着秋白。她是一个深刻的人，她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死她，她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的。我懂得她，我不生她的气了，我只为她难受。我把这诗揣在怀里，完全为着想帮助她、救援她，惶惶不安地在小亭子间里踱着。至于他们该不该恋爱，会不会恋爱，他们之间能否和谐，能否融洽，能否幸福，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在我的脑子里没有生出一点点怀疑。剑虹啊！你快回来呀！我一定要为你做点事情。

她回来了，告诉我已经决定跟她父亲回四川，她父亲同意，可能一个星期左右就要成行了。她不征询我的意见，也不同我讲几句分离前应该讲的话，只是沉默着。我观察她，同她一道吃了晚饭。我说我去施存统家玩玩，丢下她就走了。

秋白的住地离学校不远，我老早就知道，只是没有去过。到那里时，发现街道并不宽，却是一排比较西式的楼房。我从前门进去，看见秋白正在楼下客堂间同他们的房东——一对表亲夫妇在吃饭。他看到我，立即站起来招呼，他的弟弟瞿云白赶紧走在前面引路，把我带到楼上一间比较精致的房间里，这正是秋白的住房。我并不认识他弟弟，他自我介绍，让我坐在秋白书桌前的一把椅子上，给我倒上一杯茶。我正审视房间的陈设时，秋白上楼来了，态度仍同平素一样，好像下午由我突然

发出来的那场风暴根本没有一样。这间房以我的生活水平来看，的确是讲究的：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三架装满精装的外文书籍的书橱，中间夹杂得有几擦线装书。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宝；一盏笼着粉红色纱罩的台灯，把这些零碎的小玩艺儿加了一层温柔的微光。

秋白站在书桌对面，用有兴趣的、探索的目光，亲切地望着我，试探着说道：“你们还是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么，你一个人来的吗？”

他弟弟不知什么时候走开了。我无声地、轻轻地把剑虹的诗慎重地交给了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诗，读了许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我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是没有母亲的吗？”秋白曾经详细地同我们讲过他的家庭，特别是他母亲吞火柴头自尽的事，我们听时都很难过。“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

他握了一下我的手，说道：“我谢谢你。”

等我回到宿舍的时候，一切都如我想象的，气氛非常温柔和谐，满桌子散乱着他们写的字，看来他们是用笔谈话的。他要走了，我从桌子前的墙上取下剑虹的一张全身像，送给了秋白。他把像揣在怀里，望了我们两人一眼，就迈出我们的小门，下楼走了。

事情就是这样。自然，我们以后常去他家玩，而俄文却没有继续读下去了。她已经不需要读俄文，而我也

没有兴趣坚持下去了。

## 慕尔鸣路

寒假的时候，我们搬到学校新址（西摩路）附近的慕尔鸣路。这里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施存统住在楼下统厢房，中间客堂间作餐厅。楼上正房住的是瞿云白，统厢房放着秋白的几架书，秋白和剑虹住在统厢房后面的一间小房里，我住在过街楼上的小房里。我们这幢房子是临大街的。厨房上边亭子间里住的是娘姨阿董。阿董原来就在秋白家帮工，这时，就为我们这一大家人做饭，收拾房子，为秋白夫妇、他弟弟和我洗衣服。施存统家也雇了一个阿姨，带小孩，作杂事。

这屋里九口之家的生活、吃饭等，全由秋白的弟弟云白当家。我按学校的膳宿标准每月交给他十元。剑虹也是这样，别的事我们全不管，这自然是秋白的主张，是秋白为着同剑虹的恋爱生活所考虑的精心的安排。

因为是寒假，秋白出门较少；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穿着一件舒适的、黑绸的旧丝棉袍，据说是他做官的祖父的遗物。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也写过一首给我，说我是安琪儿，赤子之心，大概是表示感谢我对他们恋爱的帮助。剑虹也天天写诗，一本又一本。他们还一起读诗，中国历代的名家诗词，都爱不释手。他们每天讲的就是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渔洋、郑板桥……。秋白还会刻图章，他把他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的精致的小石块上。剑虹原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基

础就较好，但如此的爱好，却是因了秋白的培养与熏陶。

剑虹比我大两岁，书比我念的多。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她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尽管我们表面有些傲气，但我们是喜群的，甚至有时也能迁就的。现在，我不能不随着他们吹吹箫、唱几句昆曲（这都是秋白教的），但心田却不能不离开他们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我向往着广阔的世界，我怀念起另外的旧友。我常常有一些新的计划，而这些计划却只秘藏在心头。我眼望着逝去的时日而深感惆怅。

秋白在学校的工作不少，后来又加上翻译工作，他给鲍罗廷当翻译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见他安排得很好。他西装笔挺，一身整洁，精神抖擞，进出来往，他从不把客人引上楼来，也从不同我们（至少是我吧）谈他的工作，谈他的朋友，谈他的同志。他这时显得精力旺盛，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剑虹谈诗、写诗。有时为了赶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点几支烟，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我读过他写的稿纸，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动。

我不知道他怎样支配时间的，好像他还很有闲空。他们两人好多次到我那小小的过街楼上来坐谈。因为只有我这间屋里有一个烧煤油的烤火炉，比较暖和一些。这个炉子是云白买给秋白和剑虹的，他们一定要放在我屋子里。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电灯关了，只留下这些闪烁的微明的晃动的花的

光圈，屋子里气氛也美极了。他的谈锋很健，常常幽默地谈些当时文坛的轶事。他好像同沈雁冰、郑振铎都熟识。他喜欢徐志摩的诗。他对创造社的天才家们似乎只有对郁达夫还感到一点点兴趣。我那时对这些人、事、文章以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争论，是没有发言权的。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地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那时秋白同志的议论广泛，我还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见的要点，只觉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种意见之上的。

有一次，我问他我将来究竟学什么好，干什么好，现在应该怎么搞，秋白毫不思考地昂首答道：“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嘿，就是这样……”他的话当时给我无穷的信心，给我很大的力量。我相信了他的话，决定了自己的主张。他希望我，希望剑虹都走文学的路，都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这是他自己向往的而又不容易实现的。他是自始至终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气质，他的爱好都是文学的。他说他自己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我认为不是，他的政治经历原可以充实提高他的文学才能的。只要天假以年，秋白不是过早地离开我们，他定是大有成就的，他对党的事业将有更大的贡献。

这年春天，他去过一趟广州。他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还常夹得有诗。

暑假将到的时候，我提出要回湖南看望母亲，而且我已经同在北京的周敦祐、王佩琼等约好，看望母亲以



后，就直接去北京，到学习空气浓厚的北京学府去继续读书。这是她们对我的希望，也是我自己的新的梦想。上海大学也好，慕尔鸣路也好，都使我厌倦了。我要飞，我要飞向北京，离开这个狭小的圈子，离开两年多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以前不愿离开的挚友王剑虹。我们之间，原来总是一致的，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分歧，但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而这不是我理想的。我提出这个意见后，他们没有理由反对，他们同意了，然而，却都沉默了，都像有无限的思绪。

我走时，他们没有送我，连房门也不出，死一样的空气留在我的身后。阿董买了一篓水果，云白送我到船上。这时已是深夜，水一样的凉风在静静的马路上飘漾，我的心也随风流荡：“上海的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结束了。我要奔回故乡，我要飞向北方。好友啊！我珍贵的剑虹，我今弃你而去，你将随你的所爱，你将沉沦在爱情之中，你将随秋白走向何方呢？……”

## 暑 假

长江滚滚向东，我的船迎着浪头，驶向上游。我倚遍船栏，回首四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长途跋涉，我既傲然自得，也不免因回首往事而满怀惆怅。十九年的韶华，五年来多变的学院生活，我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我只朦胧地体会到人生的艰辛，感受到心灵的创伤。我是无所成就的，我怎能对得起我那英雄的、深情的母亲对我的殷切厚望啊！

在母亲身旁是可以忘怀一切的。我尽情享受我难得

的那一点点幸福。母亲的学校放假了，老师、学生都回家了，只有我们母女留在空廓的校舍里。我在幽静的、无所思虑的闲暇之中度着暑假。

一天，我收到剑虹的来信，说她病了。这不出我的意料，因为她早就说她有时感到不适，她自己并不重视，也没有引起秋白、我或旁人的注意。我知道她病的消息之后，还只以为她因为没有我在身边才对病有了些敏感的缘故，我虽不安，但总以为过几天就会好的。只是秋白却在她的信后附写了如下的话，大意是这样：“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

我对他这些话是不理解的，因此，我对秋白好像也不理解了。预感到什么不幸呢？预感到什么可怕的不幸而哭了呢？有什么不祥之兆呢？不过我究竟年轻，这事并没有放在心上，很快就把它忘了。我正思虑着做新的准备，怎么说服我的母亲，使她同我一样憧憬着到古都去的种种好处。母亲对我是相信的，但她也有各种顾虑。

又过了半个月的样子，忽然收到剑虹堂妹从上海来电：“虹姊病危，盼速来沪！”

这真像梦一样，我能相信吗？而且，为什么是她的堂妹来电呢？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千般思虑，万般踌躇，我决定重返上海。我母亲是非常爱怜剑虹的，急忙为我筹措路费，整理行装，我只得离开我刚刚领略到温暖的家，而又匆匆忙忙独自奔上惶惶不安的旅途。

我到上海以后，时间虽只相隔一月多，慕尔鸣路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人去楼空”。我既看不到剑虹——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也见不到秋白，他去广州

参加什么会去了。剑虹的两个堂妹，只以泪脸相迎；瞿云白什么都讲不出个道理来，默默地望着我。难道是天杀了剑虹吗？是谁夺去了她的如花的生命？

秋白用了一块白绸巾包着剑虹的一张照片，就是他们定情之后，我从墙上取下来送给秋白的那张。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这是因为平常叫剑虹常常只叫“虹”，秋白曾笑说应该是“魂”，而秋白叫剑虹总是叫“梦可”。“梦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诗的意思是说我送给了他我的“魂儿”，而他的心现在却死去了，他难过，他对不起剑虹，对不起他的心，也对不起我……

我看了这张照片和这首诗，心情复杂极了，我有一种近乎小孩的简单感情。我找他们的诗稿，一本也没有了；云白什么也不知道，是剑虹焚烧了呢，还是秋白秘藏了呢？为什么不把剑虹病死的经过，不把剑虹临终时的感情告诉我？就用那么一首短诗作为你们半年多来的爱情的总结吗？慕尔鸣路我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我是如泉的泪水，洒在四川会馆，把沉痛的心留在那凄凉的棺柩上。我像一个受了伤的人，同剑虹的堂妹们一同坐海船到北京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给秋白，尽管他留了一个通信地址，还说希望我写信给他。我心想：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虽然她是死于肺病，但她的肺病从哪儿来，不正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吗？……

## 谜似的一束信

新的生活总是可爱的。在北京除了旧友王佩琮（女师大的学生）、周敦祐（北大旁听生）外，我还认识了新友谭慕愚（现在叫谭惕吾，那时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曹孟君（我们同住在辟才胡同的一个补习学校里）。我们相处得很投机，我成了友谊的骄子。有时我都不理解她们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此外，我还有不少喜欢我或我喜欢的人，或者只是相亲近的一般朋友。那时，表面上，我是在补习数、理、化，实际我在满饮友谊之酒。我常常同这个人在北大公主楼（在马神庙）的庭院中的月下，一坐大半天，畅谈人生；有时又同那个人在朦朦胧胧的夜色中漫步陶然亭边的坟地，从那些旧石碑文中寻找诗句。我徜徉于自由生活，只有不时收到的秋白来信才偶尔扰乱我的愉悦的时光。这中间我大约收到过十来封秋白的信。这些信像谜一样，我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在这些信中，总是要提到剑虹，说对不起她。他什么地方对不起她呢？他几乎每封信都责骂自己，后来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只有天上的“梦可”才有资格批评他。那么，他是在挨批评了，是什么人在批评他，批评他什么呢？这些信从来没有直爽地讲出他心里的话，他只把我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我大约回过几次信，淡淡地谈一点有关剑虹的事，谈剑虹的真挚的感情，谈她的文学上的天才，谈她的可惜的早殇，谈她给我的影响，谈我对她的怀念。我恍惚地知道，此刻我所谈的，

并非他所想的，但他现在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所苦呢？他到底为什么要那么深地嫌厌自己，责骂自己呢？我不理解，也不求深解，只是用带点茫茫然的心情回了他几封信。

是冬天了，一天傍晚，我走回学校，门房拦住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人等了半天，足有两个钟头，坐在我这里等你，说要你去看他，地址都写在信上了吧！”我打开信，啊！原来是秋白。他带来了一些欢喜和满腔希望，这回他可以把剑虹的一切，死前的一切都告诉我了。我匆匆忙忙吃了晚饭，便坐车赶到前门的一家旅馆。可是他不在，只有他弟弟云白在屋里，在翻阅他哥哥的一些什物，在有趣地寻找什么，后来，他找到了，他高兴地拿给我看。原来是一张女人的照片。这女人我认识，她是今年春天来上海大学，同张琴秋同时入学的。剑虹早就认识她，是在我到上海之前，她们一同参加妇女活动中认识的。她长得很美，与张琴秋同来过慕尔鸣路，在施存统家里，在我们楼下见到过的。这就是杨之华同志，就是一直爱护着秋白的，他的爱人，他的同志，他的战友，他的妻子。一见这张照片我便完全明白了，我没有兴趣打听剑虹的情况了，不等秋白回来，我就同云白告辞回学校了。

我的感情很激动，为了剑虹的爱情，为了剑虹的死，为了我失去了剑虹，为了我同剑虹的友谊，我对秋白不免有许多怨气，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诉了谭惕吾，她用冷静的态度回答我，告诉我这不值得难受，她要我把这一切都抛向东洋大海，抛向昆仑山的那边。她讲得很有道理，她对世情看得真透彻，我听了她的，但我却连她

也一同疏远了。我不喜欢这种透彻，我不喜欢过于理智。谭惕吾一直也不理解我对她友谊疏远的原因。甚至几十年后我也顽固地坚持这种态度，我个人常常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情支配着，我再没有去前门旅舍，秋白也没有再来看我。我们同在北京城，反而好像不相识者一样。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收到一封从上海发来的杨之华给秋白的信，要我转交。我本来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我一早仍去找到了夏之栩同志。夏之栩是党员，也在我那个补习学校，她可能知道秋白的行踪。她果然把我带到当时苏联大使馆的一幢宿舍里。我们走进去时，里边正有二十多人在开会，秋白一见我就走了出来，我把信交给他，他一言不发。他陪我到他的住处，我们一同吃了饭，他问我的同学，问我的朋友们，问我对北京的感受，就是一句也不谈到王剑虹，一句也不谈杨之华。他告诉我他明早就返上海，云白正为他准备行装。我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静静地观察他。他对杨之华的来信一点也不表示惊慌，这是因为他一定有把握。他为什么不谈到剑虹呢？他大约认为谈不谈我都不相信他了。那么，那些信，他都忘记了么？他为什么一句也不解释呢？我不愿同他再谈剑虹了。剑虹在他已成为过去了！去年这时，他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如今，过眼云烟，他到底有没有感触？有什么感触？我很想了解，想从他的行动中来了解，但很失望。晚上，他约我一同去看戏，说是梅兰芳的老师陈德霖的戏。我从来没有进过戏院，那时戏院是男女分坐，我坐在这边的包厢，他们兄弟坐在对面包厢，但我们都没有看戏。我实在忍耐不住这种闷葫芦，我不了解他，我讨厌戏院的嘈杂，我写了一个字条托茶

房递过去，站起身就不辞而别，独自回学校了。从此我们没有联系，但这一束信我一直保存着做为我研究一个人的材料。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时，我曾把这些信同其他的许多东西放在我的朋友王会悟那里。同年我被捕后，雪峰、适夷把这些东西转存在他们的朋友谢澹如家。全国解放以后，谢先生把这些东西归还了我。我真是感谢他，但这一束信，却没有了。这些信的署名是秋白，而在那时，如果在谁那里发现瞿秋白这几个字是可以被杀头的。我懂得这种情况，就没有问。这一束用五色布纹纸写的工工整整秀秀气气的书信，是一束非常有价值的材料。里边也许没有宏言说论，但可以看出一个伟大人物性格上的、心理上的矛盾状态。这束信没有了，多么可惜的一束信啊！

## 韦 护

我写的中篇小说《韦护》是一九二九年末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韦护是秋白的一个别名。他是不是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章我不知道。他曾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我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

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我要写剑

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因为她没有失恋，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自然，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忆，可以做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

一九三〇年，胡也频参加党在上海召开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碰到了秋白。秋白托他带一封信给我。字仍是写得那样的工工整整秀秀气气，对我关切很深。信末署名赫然两个字“韦护”。可惜他一句也没有谈到对书的意见。他很可能不满意《韦护》，不认为《韦护》写得好，但他却用了“韦护”这个名字。难道他对这本书还寄有深情吗？尽管书中人物写得不好、不像，但却留有他同剑虹一段生活的遗迹。尽管他们的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也难忘的。他在他们俩个最醉心的文学之中的酬唱，怎么能从他脑子中划出去？他是酷爱文学的，在这里他曾经任情滋长，尽兴发挥，只要他仍眷恋文学，他就会想起剑虹，剑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话）；而他对他后来毕生从事的政治生活，却认为是凡间人世，是见义勇为，是牺牲自己为人民，因为他是韦护，是韦陀菩萨。

这次我没有回他的信，也无法回他的信，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处境，我更无从知道。但在阳历年前的某一个夜晚，秋白和他的弟弟云白到吕班路我家里来了。来得很突然，不是事先约好的。他们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至



今我也记不起来。这突然的来访使我们非常兴奋，也使我们狼狈。那时我们穷得想泡一杯茶招待他们也不可能，家里没有茶叶，临时去买又来不及了。他总带点抑郁，笑着对我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他说这些话，我没有感到一丝嘲笑，或是假意的恭维。他看了我的孩子，问有没有名字。我说，我母亲替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祖麟。他便笑着说：“应该叫韦护，这是你又一伟大作品。”我心里正有点怀疑，他果真喜欢《韦护》吗？而秋白却感慨万分地朗诵道：“田园将芜胡不归！”我一听，我的心情也沉落下来了。我理解他的心境，他不是爱《韦护》，而是爱文学。他想到他最心爱的东西，他想到多年来对于文学的荒疏。那么，他是不是对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厌倦了呢？后来，许久了，当我知道一点他那时的困难处境时，我就更为他难过。我想，一个复杂的人，总会有所偏，也总会有所失。在我们这样变化激剧的时代里，个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那时我没有说什么，他则仍然带点忧郁的神情，悄然离开了我们这个虽穷却是充满了幸福的家。他走后，留下一缕惆怅在我心头。我想，他也许会想到王剑虹吧，他若有所怀念，却也只能埋在心头，同他热爱的文学一样，成为他相思的东西了吧。

### 金黄色的生活

一九三一年，我独自住在环龙路的一家三楼上。我无牵无挂，成天伏案书写。远处虽有城市的噪声传来，但室内只有自己叹息的回音，连一点有生命的小虫似乎也

全都绝迹了。这不是我的理想，我不能长此离群索居，我想并且要求到江西苏区去。但后来，还是决定我留在上海，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我第一次听从组织的分配，兴致勃勃地四出组稿，准备出版。这时雪峰同志常常给我带来鲁迅和秋白的稿件，我对秋白的生活才又略有所知。这时秋白匿住在中国地带上海旧城里的谢澹如家。这地址，只有雪峰一人知道，他常去看他，给他带去一些应用的东西。为了解除秋白的孤寂，雪峰偶尔带着他，趁着夜晚，悄悄去北四川路鲁迅家里。后来，他还在鲁迅家里住了几天。再后来，雪峰在鲁迅家的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秋白搬了过去，晚上常常去鲁迅家里畅谈。他那时开始为《北斗》写“乱弹”，用司马今的笔名，从第一期起，在《北斗》上连载。“乱弹”内容涉及很广，对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等，都加以讽刺，给予打击。后来又翻译了很多稿件，包括卢那卡尔斯的《解放了的董吉歌德》。特别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写的评“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等的论文，词意严正，文笔锋利。秋白还大力提倡大众文学，非常重视那些在街头书摊上的连环图画、说唱本本等。他带头用上海方言写了大众诗《东洋人出兵》，这在中国文学运动史上是创举。在他的影响下，左联的很多同志也大胆尝试，周文同志把《铁流》与《毁灭》改写为通俗本，周文后来到了延安，主持《边区群众报》，仍旧坚持大众化工作。

秋白还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他论述的范围很广，世界的，苏联的，中国的。他的脑子如同一个行进着的车轴，日复一日地在文学问题上不

停地旋转，而常常发出新论、创见。为了普及革命文化，秋白还用了很多时间研究我国文字拉丁化问题。

以前，我读过《海上述林》，最近我又翻阅了《瞿秋白文集》。他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家啊！他早在苏联的时候，一直是那么不倦地写呀，译呀。而三十年代初，他寄住在谢澹如家，躲在北四川路的小室里，虽肺病缠身，但仍是日以继夜地埋头于纸笔之中，他既不忘情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又要应付当时党内外发生的许多严重复杂的问题，他写的比一个专业作家还多得多啊！

他同鲁迅的友谊是光辉的、战斗的、崇高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友谊。他们互相启发，互相砥励。他们在文学上是知己，在政治斗争上也是知己。他为鲁迅的杂文集作序，对鲁迅的杂文，对鲁迅几十年的斗争，最早作了全面的、崇高的评价。他赞誉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是鲁迅的好友，但他在与世诀别的时候，还说自己“一生中没有什么朋友”，以维护鲁迅的安全。鲁迅也在自己病危之际，为他整理旧稿，出版《海上述林》。这都是我们文坛上可歌可泣的、少有的动人佳话。秋白这一时期的工作成绩是惊人的，他矢志文学的宿愿在这时实现了。我想，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称心的时代，是黄金时代。

可惜，这个时代不长。一九三四年初，他就不得不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去了。他到了苏区，主管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他尽可能去接近农民，了解农民的生活。这在他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秋白过去是没有条件接近农民的。这正是秋白有意识地要弥补自己的知识

分子的缺点,有心去实践艰苦的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他在苏区还继续努力推行文艺大众化。后来,如果他能跟随红军主力一起长征,能够与红军主力一起到达陕北,则他的一生,我们党的文艺工作,一定都将是另一番景象。这些想象在我脑子中不知萦回过多少次,只是太使人痛心了,他因病留在苏区,终遭国民党俘获杀害了。

在这个期间,我在鲁迅家里遇见秋白一次,之华同志也在座。一年来,我生活中的突变,使我的许多细腻的感情都变得麻木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完全只是一个冷静的编辑同一个多才的作家的谈话。我一点也没有注意他除此之外的任何表情,他似乎也只是在我提供的话题范围之内同我交谈。我对他的生活,似乎是漠不关心的。他对我的遭遇应该有所同情,但他也噤若寒蝉,不愿触动我一丝伤痛的琴弦。

但世界上常常有那么凑巧的事: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我要求参加共产党,很快被批准了。可能是三月间,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入党仪式。同时入党的有叶以群、田汉、刘风斯等。主持仪式的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而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的、赫然使我惊讶的却是瞿秋白。我们全体围坐在圆桌周围,表面上是饮酒作乐,而实际是在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我们每个人叙述个人入党的志愿。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说的主要意思是,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潘梓年、瞿秋白都讲了话,只是一般的鼓励。

### 《多余的话》

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洛甫同志同我谈到，有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伪造的。我便从中宣部的图书室借来一本杂志，上面除这篇文章外，还有一篇描述他就义的情景。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过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也婉转得多。因为那时他工作经历还不多，那时的感触也只是他矛盾的开始，他无非是心有所感而无处倾吐，就暂时把我这个无害于他的天真的、据他说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作为一个可以听听他的感慨的对象而忘情地剖析自己，尽管是迂回婉转，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但还不像后来的《多余的话》那样无情地剖析自己，那样大胆地急切地向人民、向后代毫无保留地谴责自己。我读着这篇文章非常难过，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那时的坦荡胸怀。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但我决不会想到后来“四人帮”竟因此对他大肆诬蔑，斥他为叛徒，以至挖坟掘墓、暴骨扬灰。他生前死后的这种悲惨遭遇，实在令人愤慨、痛心！

最近，我又重读了《多余的话》，并且读了《历史研

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陈铁健同志写的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这篇文章对秋白一生的功绩、对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细的分析 and 恰当的评价，比较全面，也很公正。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当今这个世界是不够健全的，一个革命者，想做点好事，总会碰到许多阻逆和困难。革命者要熬得过、斗得赢这些妖魔横逆是不容易的，各人的遭遇和思想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秋白在文学与政治上的矛盾，本来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矛盾的心境，在实际上是很难得到理解、同情或支持的。其实，秋白对政治是极端热情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他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都比较有兴趣。”“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秋白临终，还坚定明确地表示：“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他毕生从事政治斗争，就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了政治活动，他不顾他的病重垂危的爱人王剑虹。在“八七”会议时，他勇敢地挑起了领导整个革命的重担。他批评自己的思想深处是愿意调和的，但他与彭述之、陈独秀做着坚决的路线斗争。他有自知之明，他是不愿当领袖的，

连诸葛亮都不想做，但在革命最困难的严重关头，他毅然走上党的最高的领导岗位。这完全是见义勇为，是他自称的韦护的象征。这哪里是像他自己讲的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自己又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哪里是像他自己讲的“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我认为秋白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奋力冲上前去，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问题，乃是一个大勇者。在《多余的话》的最后，他说因为自己是多年（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五年）的肺结核病人，他愿意把自己的“躯壳”“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当他这样表示的时候，在他就义的前夕，在死囚牢里他像解剖自己患肺病的躯壳一样，他已经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利刃，在平静中理智地、细致地、深深地剖析着自己的灵魂，挖掘自己的矛盾，分析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对于知识分子革命者和一般革命者至今都有重大的教益。他说：“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他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地、尽心地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一个大勇者吗？！我们看见过去有的人在生前尽量为自己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打击别人，歪曲历史，很少有像秋白这样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的。

在“八七”会议以后，秋白同志在估计革命形势上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说得非常清楚，是极为正确的。我想，在那样复杂、激剧变化的时代，以秋白从事革命的经历，犯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换了另外一个人，恐怕也是这样。何况那些错误都是当时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的，是大家的意见，不过因为他是总书记，他应该负主要责任而已。

但是，事隔两年，人隔万里，在王明路线的迫害下，竟要把立三路线的责任放在秋白身上，甚至把正确地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的六届三中全会也指责为秋白又犯了调和路线错误，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他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秋白写《多余的话》时，仍是王明路线统治的时候，他在敌人面前是不能暴露党内实情、批评党内生活的，他只能顺着中央，责备自己，这样在检查中出现的一些过头话，是可以理解的。

正由于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不够健全，一个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就被揪着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过左的作法，即使不是秋白，不是这样一个多感的文人，也是容易使人寒心的。特别是当攻击者处在有权、有势、有帮、有派、棍棒齐下的时候，你怎能不回首自伤，感慨万端地说：“田园将芜胡不归”？而到自己将离世而去的时候，又怎会不叹息是“历史的误会”呢？

古语说：“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这句话是有缺点的。“慷慨成仁”也不易，也需要勇敢，无所惧怕，而“从容就义”更难。秋白同志的《多余的话》的情绪是低沉的，但后来他的牺牲是壮烈的。秋白明明知道自



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不是以年、月计算了，但仍然心怀坦白，举起小刀自我解剖，他自己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又当法官，严格地审判自己。他为了什么？他不过是自己当做一个完全的布尔塞维克来要求自己，并以此来品评自己的一生。这正是一个真正的布尔塞维克的品质，怎么能诬之为叛徒呢？革命者本来不是神，不可能没有缺点，不可能不犯错误，倘能正视自己，挖掘自己，不是比那些装腔作势欺骗人民，给自己搽脂抹粉的人的品格更高尚得多么？

秋白在他有生之年，在短短的时间里，写了许多重要文章；他却说自己是“半吊子文人”，也是一种夸大，是不真实的。但秋白一时的心情还是带有一些灰暗，矛盾是每个革命者都会遇到的，每个人都应该随时随地警惕自己，改造自己，战胜一切消极因素。特别是在极端困苦之下，对人生，对革命，要保持旺盛的朝气。

秋白的一生是战斗的，而且战斗得很艰苦，在我们这个不够健全的世界里，他熏染着还来不及完全脱去的一丝淡淡的、孤独的、苍茫的心情是极可同情的。他说了一些同时代有同感的人们的话，他比较突出、比较典型的，他的《多余的话》是可以令人深思的。但也有些遗憾，它不是很鼓舞人的。大约我跟着党走的时间较长，在下边生活较久，尝到的滋味较多，更重要的是我后来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他大不相同，所以，我总还是愿意鼓舞人，使人前进，使人向上，即使有伤，也要使人感到热烘，感到人世的可爱，而对这可爱的美好的人世要投身进去，但不是惜别。我以为秋白的一生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他没有能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

## 飞蛾扑火

秋白曾在什么地方写过，或是他对我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诚然，他指的是我在二二年去上海平民女校寻求真理之火，然而飞开了；二三年我转入上海大学寻求文学真谛，二四年又飞开了；三〇年我参加左联，三一年我主编《北斗》，三二年入党，飞蛾又飞来扑火。是的，我就是这样离不开火。他还不知道，后来，三三年我已几濒于死，但仍然飞向保安；五十年代我被划为右派，六十年代又被打成反革命，但仍是振翅飞翔。直到七十年代末，在党的正确路线下，终于得到解放，使我仍然飞向了党的怀抱。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秋白同志，我的整个生涯是否能安慰死去的你和曾是你的心，在你临就义前还郑重留了一笔的剑虹呢？

## 四、宋希濂谈瞿秋白<sup>①</sup>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时，宋希濂是国民党第36师中将师长，驻扎长汀，秋白烈士就是由宋部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

---

<sup>①</sup> 作者汪东林，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5年9月16日、23日。

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决的。

“文革”前夕，有关瞿秋白“变节”之事先由上边传出。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全国政协常委、原《大公报》社长），在一次会议间隙悄悄告我，这个消息是可靠的，并提出宋希濂是直接当事人，建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从了解史料出发，可个别与宋接触一下，探个究竟。在王芸生的提示下，几天后我利用一次会议前的半小时，以闲谈的口气询问宋是否知道传闻瞿秋白历史上“变节”之事，他听后停顿了一会，才说他也听了，因为上边已经派人向他调查了解过一次。他的回答引起我的兴趣，便追问道：“宋委员（宋于1965年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与溥仪、杜聿明、范汉杰、王耀武等同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仍兼任文史专员），我个人对历史人物感兴趣，如果方便，您是否能多说几句，只谈当时您所知道的情况，可不涉及今天。”宋希濂笑了，又停顿了一会才答复说：

“问题就是今天新提出来的，怎么能一点不与今天发生联系？不过，我所知道的事，在里边时（指1959年宋被特赦前在狱中改造时）我就讲过并写过材料了。我记忆中总的印象，瞿秋白是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是一名有信仰的共产党员，但我同时有直接的感觉他是个文化人，一个气质素质都具备且心胸坦然的文化人。他在牺牲前，写过一篇经别人提起我才记起的题为《多余的话》的长文，我肯定看过这篇文章，感觉是这篇文章更加深了他是典型文化人的印象。他的‘变质’如果指的思想，我不敢说，因为他文化人的气质的确更浓于共产党人的形象。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

他，手下人多次审问过他，南京国民党组织部还专门派人来审讯过他，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当时我看过的，并不是国民党后来编造的。前些日子上边组织派人向我调查了解，给我看了这篇《多余的话》，这篇文章，内容，语气，文采，都同我记忆中相符，但我不敢保证发表时是否被编者动手修改过（因宋其时看的是杂志上刊登的）。三十年时光过去了，我不可能什么都记得很清楚，但我说的这个总概貌不会错。”

我在几天后再约宋希濂先生长谈。谈话的地点在政协机关。准确的时间应是1966年7月。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向宋希濂提出要求时，他还表示犹豫，说机关运动已经开始，现在谈这些往事不大方便。但我执意要求，深感兴趣，想听他说说往事，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您能先谈谈瞿秋白一开始被捕的情况吗？”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过境地带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年2—3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像梳头发一样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因兵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有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指挥的36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36师指挥在福建保安第14团截获。我因在战事中负伤住医院治疗，暂离36师师部（师部设在福

建长汀县城内)。4月下旬,我在医院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108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14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自称林琪祥,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师参谋长去保安第14团的次日,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并未提审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也立即离开医院,赶返36师师部。”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三十六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16年(1927)我在武汉见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

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

宋希濂接着说：“当时我听完军法处长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遇，另辟间室’八个字，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不久，政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不少有“觉悟”者，早已与宋希濂、杜聿明等无形中划清了界限，轻则“敬而远之”，重则“怒目而视”，但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决定再登门拜访。宋希濂的住所是在东城东四南端的一条小胡同里，我是骑自行车去的，进院后即快步直达他的家里，心态是很不想让别人碰见。巧的是只有宋希濂一个人在家伏案写材料，对我的破门而入颇感意外，但欢迎之态可掬。他立即沏茶并敬烟。因我还未开戒，只得又是他自抽而由我点火。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

“你可能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又由陈赓大将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的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其时我在苏州养伤，陈赓在武汉，从此政治上我同他分道扬镳，由同乡、同学、同志而变为敌对两方。这话说来太长，我点一下这段经历，是想说明在1935年4月下旬，当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的一次成功，对共产党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对蒋介石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记忆——还是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我就从最早引我走革命、爱国之路的熊老师那里读过一篇又一篇瞿秋白写的访问苏联的文章，后来到广州进黄埔又读过瞿秋白的不少文章，听过他的报告。那时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尚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1927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

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儿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倒直爽地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我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36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我）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



手下的人已对他作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带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请您谈得越细越好。”我打断宋的话，要求他。

正在这时，门突然推开，进来的是邻居唐生明，我同宋的谈话自然被打断了。

我绝没有想到，这一打断，在经过10年“文革”几起几落之后，笔者才有可能再度登门拜访宋希濂。那时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境，语音爽朗，侃侃而谈。我问得很多、很细，谈论得很长、很实。尽管其时中央并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一开头宋希濂就欣慰地对我说：

“就在几天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

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个下午。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

宋希濂向我作了介绍：

当年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了设在长汀中学里的36师师长办公室，贴身勤务兵送上茶水，退出，屋子里只剩下宋希濂与瞿秋白。

“请用茶。”宋希濂笑脸相迎，说：“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作认真的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

也多余的吧。”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

“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烦地说。

“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宋希濂顺水推舟。

“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

“我看先不要封口为好，随便谈，说到哪儿算哪儿，好吗？”宋希濂口气缓和下来。

“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瞿秋白忽然以攻为守。

“听便。”宋希濂满不在乎地点头。

“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瞿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倦意的目光忽然发亮。

“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宋希濂直爽地回答，停顿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

民的真理?”

“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归顺蒋介石?”

“打开天窗说亮话,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宋希濂也答复干脆,并为审问顺利直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

“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问你,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那时你在什么地方?”宋希濂一时搞不清瞿秋白问话的用意,没有马上答复。但他一想到这里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那好。”瞿秋白又喝了口茶,紧接着说:“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通观世界政治潮流,对比各种主义、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还有

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颤！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更是历来各种反共分子都在弹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

瞿秋白滔滔不绝，脸色绯红，起身要走。宋希濂心中恼火，却装出若无其事的神色，手指头习惯地弹着桌面，缓而冷地说：

“请坐下，不必激动！瞿先生，你说完了，我还没讲呢！”

“好吧，我洗耳恭听！”

“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宋希濂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的语音，接着又说：“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十六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着对宋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但

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宋希濂无言以对。从此，宋希濂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种审问谈话。

自宋希濂直接审问之后，对瞿秋白狱中生活优待如常。宋以下，36师司令部凡能与瞿秋白接触的官兵，都私下向瞿索要题字和印章，瞿一律求者不拒，予以满足；唯独各种形式的审问、谈话毫无进展。过了一段时间，宋希濂向南京方面汇报：审讯没有突破。紧接着，南京直接派人到长汀提审瞿秋白，反复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宋希濂这时倒放宽了心：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此，宋希濂估计，瞿秋白有可能押送南京处置。出乎他意料的是，至6月16日，突然接到由顶头上司蒋鼎文转发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宋希濂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宋希濂拿着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然后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陈军医召来，先让他们传阅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命令：

“委员长作出这个决定，有着重要的考虑。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我作如下安排：第一，明天（17日）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18日）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遗物。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严密警戒，三天内全体人员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军医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18日中午，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刑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汉岭下，拍照后备棺木埋葬。你们有什么意见补充？”

“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陈军医没有作出反应。

次日中午，参谋长随陈军医走进瞿秋白的房间，瞿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瞿秋白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说：

“请坐，稍等片刻。”

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这才站了起来。说：

“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

“不要客气，瞿先生，随便喝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瞿秋白对坐。

瞿秋白一坐下，发觉陈军医脸色不好，一言不发，立即联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将要发生。参谋长提起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待双方都有几分酒意，参谋长才张口说：

“瞿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

“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

“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尽力为之。”

瞿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道：

“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

参谋长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参谋长沉着气，面无表情，惶然失神的陈军医（陈是瞿秋白在狱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军官）结结巴巴地说：

“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么事要办的，尽管说。”

“我一切准备就绪。”瞿秋白响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长文《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

“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瞿先生放心。”参谋长当场答复。

谈话就此结束。

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陈军医却彻夜未眠。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



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阅，吟读，思索，然后提笔书写起来——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书写至此，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

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见阳光洒满院落，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宋希濂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去过。

瞿秋白不可能想到，这时的宋希濂，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

昨天下午，参谋长向宋希濂汇报时提到，说午间酒

后瞿秋白曾说，你们的宋长官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想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敢大驾光临否？宋当即打断参谋长的话，冷冰冰地说：

“优待他是为了软化他，化敌为友。委员长已决定处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还成什么体统？”

但是，今日上午宋希濂在办公室听到下边院中的传令声，却情不自禁地挑起窗帘望上一眼。

10 时正，军法处长传令出发。

瞿秋白昂首走出 36 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高歌俄语、华语“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这时候，阳光铺路，风停树静，只有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汀上空回荡……

进了戒备森严、无一游客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瞿秋白请两位处长对饮，被拒绝了；又找陈军医，说没有来。瞿秋白一摆手，迈步走向八角亭。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风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兵士，他视同送殓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杆。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

“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

“此地正好，开枪吧！”

哨声落，枪声起。时年 36 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长空倾诉，山川哭泣，中华大地将永远铭记这可歌可泣的一幕……

## 后 记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瞿秋白一生只活了短短的 36 个春秋。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用他的言和行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而且能够达到一个怎样高的境界。

我非常敬仰秋白，秋白的作品和高尚的人品曾给我以滋养和很深的影响。所以，此次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一套“名人自传”丛书，决定把《瞿秋白自传》一书的编辑工作交给我时，使我深感荣幸和高兴。于是，我顾不得一次国际会后病倒住院，而是抓住治病的间隙时间，搜集、阅读、编选有关材料。

秋白有着绝世的才华，他给我们留下了 500 多万字的有关政治理论和文学艺术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丰富著述，可是他恰恰没有写过一篇自传。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和责编郭济访、章俊弟同志的具体指导，我将秋白有关家世、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自述材料，加以选择、鉴

别，大致按时间顺序进行归类，分章分节编排，以便读者可以较清晰地看到秋白伟大一生的大致轨迹。鉴于秋白写自己的文字毕竟太少，我又选了几篇最熟悉秋白的人所写的回忆文章，作为“附录”，这是了解秋白的极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所选材料基本上都是公开发表过的，主要版本是依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1—7卷（第8卷尚未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6卷，少数也有选自其他一些出版物。

需要说明的是：

1. 本书第一至三章，是根据《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进行了节选，重新编排，有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2. 《多余的话》，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国民政府档案手抄本排印，对个别的人名与错别字作了校订。《多余的话》至今没有发现原件，对其真伪问题，国内学术界已基本上取得共识。即从该文的内容与文风特点来看，确系秋白所写。该文与同一时期致郭沫若的信（该信手迹已公开发表过）有许多共同之处；非常熟悉秋白的丁玲也极其相信《多余的话》确系秋白所写（参阅本书所附丁玲文章：《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可提供的论据很多，在此不可能一一细述了。由于原件至今没有发现，文中有的地方是否可能被篡改过，尚不能断定。我认为，这篇文章是秋白在生命临终前最为坦诚的话，内涵极其丰富，这是了解秋白不可不读的极为重要的材料，所以决定收入。

3. 《供词》是转引自陈铁健的《瞿秋白传》，现在我们无法看到全文，但仅从摘引的这四段文字看，秋白在

所谓“供词”里，热情地歌颂了中央苏区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秋白在生死关头所表现的一个革命者的坚定立场。在此，要向陈铁健同志顺致谢意。

4. 致王剑虹与杨之华的信。书中有三封致王剑虹的和四封致杨之华的信，都已见诸于公开出版的书刊。但还有若干片断，此次是首次公开发表，这是取之文革中的《讨瞿战报》。对这些片断的信，我细心地阅读，审慎地加以鉴别，我认为是出自秋白的手笔。我们还可以将信的某些片断与已公开发表的文字加以核对，来证实这一点。如1929年3月秋白给杨之华信的片断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在杨之华发表的《忆秋白》一文中写道：“秋白的健康情况很坏，他感觉到‘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后者的引文不正是来自秋白给她的信么？又如，1929年2月13日秋白给杨之华信的片断中的爱称，与1929年3月18日信中的称谓是一样的，后者此次是根据原信手迹排印的，它证实了前面的片断是真实的。《讨瞿战报》当时斩头去尾地发表这些信的片断，是为了给秋白抹黑，对他进行诬蔑。而我们今天以秋白给他最亲爱的人的信中，却看到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极其丰富、极其美丽的感情世界，更加感到这是一个真实的、可爱可敬的人。我现在无法搜集到这些信的全文，我以为即使发表一些片断对了解秋白也是很有益的。

在这本书的编选过程中，我的好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编辑组成员张小鼎同志，在百忙中多次给我写信，对我的编选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秋白的亲属

瞿勃同志提供了大部分照片。对他们热情关怀与帮助谨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我当时正在病中，朱晓进、王一心、吴秀亮、凌永康等同志帮我查借、核对了一些资料，在此也一并致谢！

这本书编选的目的，显然不是供学术研究之用，而是为了向更广大的读者群众宣传秋白，因而，我觉得也就更有意义。在这一神圣的工作中，我能贡献一点微小的力量，至为欣慰。同时，在这一工作过程中，我再一次地从秋白精神中受到启迪，以净化自己，提升自己。

## 梦 花

1996年7月于南京南秀村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瞿秋白自传  
作者 =  
页数 = 3 0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